

從紅色憧憬到田野現實 —

王海 (Thomas Heberer) 與德國中國研究的轉型

洪雅筠 著

2013 年 1 月出版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背景.....	8
第四節 文獻回顧.....	15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17
第六節 研究限制.....	18
第七節 章節安排.....	18
第二章 德國漢學之歷史脈絡.....	21
前 言.....	21
第一節 17~18 世紀漢學啓蒙時期.....	21
第一項 引發中國熱的媒介.....	23
第二項 傳教士的角色.....	23
第三項 傳教士與漢學.....	26
第二節 19~20 世紀初殖民主義漢學時期.....	29
第一項 德國漢學基礎之奠定.....	30
第二項 實用漢學的出現.....	31
第三項 漢學研究方法之推進與學術專業性之建立....	33
第三節 二次大戰~戰後國家分裂漢學大分流時期.....	36
第一項 民主德國的漢學研究.....	38
第二項 聯邦德國的漢學研究.....	42

第四節 現代漢學時期	46
第一項 當代中國學學者	46
第二項 當代中國學之研究機構	48
小 結	52
第三章 當代中國學時期－王海（Thomas Heberer） 之背景與思想養成	55
前 言	55
第一節 王海之成長背景與學習歷程	56
第一項 學習過程中之轉捩點	57
第二項 王海的博士論文與影響王海建構思想過程中的 重要學者	59
第三項 1968 年學運之因素	62
第四項 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王海	64
第二節 王海的中國經驗	66
第一項 中國初體驗	67
第二項 專業上之經驗	69
第三項 課題研究上之實踐	71
第四項 踏入少數民族世界	72
第三節 研究議程之產生	75
第一項 王海在中國學上之研究方法	75
第二項 「關係」為方法	80
第三項 研究資金來源	81
第四項 與德國官方之關係	82

小 結.....	83
第四章 王海的中國意象.....	85
前 言.....	85
第一節 轉變中國—作為原動力之企業家.....	86
第一項 有限的逾矩行為—私有化進程.....	87
第二項 轉型動力—企業家之作用與特色.....	90
第三項 眾擎易舉—作為戰略群體之企業家.....	93
第二節 透視中國—少數民族作為工具.....	95
第一項 同化與自治—少數民族在改革進程中所面臨 之挑戰.....	96
第二項 改革開放—文化傳統之復興與貢獻.....	100
第三項 傳統觀念之轉變—彝族企業家與族群認同....	102
第三節 擺脫西方框架—王海眼中的中國公民社會之 建設.....	109
第一項 建設公民社會進程之開端—「改革」.....	110
第二項 公民權之實踐—政治參與.....	112
第三項 維持政權合法性—建設中國公民社會.....	115
小 結.....	118
第五章 結 論.....	121
參考文獻.....	129
附錄：王海訪談逐字稿.....	141

表目錄

表 2-1：各研究機構之研究重點	40
表 3-1：王海成長紀事	5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文主要目的有兩項，首先探討漢學在德國之發展，說明漢學（Sinologie）與中國學（Chinawissenschaft）分界之由來。其次，將重心置於德國中國學之發展，以王海為研究對象，做為研究德國中國學轉型之一種表現，介紹其對少數民族研究之背景脈絡與影響，了解其所主張之中國學研究不能僅以客觀第三者的觀點觀察，應從中國內部觀察中國，特別是在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少數民族部分，如此才能更加了解中國。最後，並探討王海所標示的轉型對中國研究有何知識上的意義。

在 20 世紀中期以前，關於中國的研究，仍是依據早期中國帝國時期菁英之著作，作為文學與文獻研究以及國家歷史與社會研究的傳統漢學（Sinologie）是其中主流。直至 1960 年代後，傳統漢學與中國學研究開始有明顯的分界，號稱「歷史的現代化主義者」（Historical Modernizer）影響了學者對新中國與古典中國的研究。¹ 這些歷史現代化主義者，開始採用新的研究途徑研

¹ 請見 Zurndorfer, Harriet T, 2003. "Beyond Sinolog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JESHO*, vol. 46. no. 3. pp. 355-356.

究中國，他們的中國研究結合了經濟與社會歷史，於此同時，這批學者還以這類型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出版品。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漢學研究逐漸出現了轉變。²

這些轉變最主要是受到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所提出的中國研究的新範式所影響。費正清建立了一個當代中國研究議程，屬於這類型的研究計畫通常結合語言訓練以及著重 19 與 20 世紀的歷史研究，並特別強調其商業與政治制度。這種研究議程稱為費正清途徑，而此途徑一度或為漢學的新範式。³ 爾後，此新範式便主導著整個國際關於中國學之研究，建立了一種新範式霸權。

在德國，儘管其漢學研究起步較英、美、法國為晚，但是在二次大戰後，卻有迅速成長之趨勢。由德國幾個在漢學系上具代表性之大學系所課程之設計，得知德國的漢學研究亦是沿襲此新範式。⁴ 儘管如此，德國的漢學研究仍就努力試圖建立一套具德國特色的研究範式，並且在中國學領域中發揮其影響力。

在中國學研究上，早期由於政治因素，導致欲研究當代中國的西德學者難以進入中國作實地研究。許多資料都僅能被動地接受來自中國官方的發布，但此類官方文件在當時的環境下又多具

² Ibid.

³ Ibid, p. 356.

⁴ 漢學系中又可分為傳統漢學檢索日期：2009 研究與中國學研究兩類。請見 Universität Hamburg, “Asien-Afrika Institut”, 線上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aai.uni-hamburg.de/china/Studieren.html> 和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Institut für Sinologie”, 線上檢索日期：2009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courses/ma_sinologie/。

宣傳色彩，可靠性相對較低，早期西德的中國學研究因而困難重重。

Thomas Heberer（王海，以下皆稱王海）身爲一位西德的中國學學者，則是較早能夠進入中國，並實地體驗中國生活。⁵ 他的研究不僅著墨於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方面，有別於其他德國的中國學者，他對於中國的少數民族研究尤爲精進，不只是單純拘束在文獻上的分析，亦進入當地作深入的田野調查，且給予讀者提供更爲詳細的數據證明。當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環境也較爲窘迫，更遑論當時西部少數民族居住區域環境之困窘。他的研究精神，對於德國當時的中國學者是較爲少見的。

在王海的中國研究裡，少數民族是不容忽視一項議題，特別是在擁有官訂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中國之中，中國如何調和各民族，而各個民族在改革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貢獻，都有其特殊值得探討之處。王海有鑑於此，在他的研究中，以「中國中心觀」之研究角度，擺脫殖民地史的框架，以中國爲出發點，探討其內部自身的變化。⁶ 以他最爲著名的一本名爲《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與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書中，他深入當地研究彝族企業家在其社會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及他們對於當地以及中國整體在經濟開放改革進程中之影響。此外，他了解許多少數民族區域之

⁵ Thomas Heberer 於 1977~1981 年就在北京出版社擔任編輯與翻譯。請見 Universität Duisburg Essen, “Prof. Thomas Heberer’s biographical data”, 線上檢索日期：2009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uni-due.de/oap01/Team_heb_en.shtml。

⁶ 請見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1989。《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稻鄉出版社，頁 19-20。

經濟成果是由漢人所造就，因此，爲了真正了解少數民族區域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然後進而影響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之關係，他還深入當地調查少數民族的就業情形與職業分佈，提供其研究更爲充分之證據。王海的研究使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少數民族之角色獲得重視，而少數民族的發展亦是維繫中國內部安定的一項重要因素。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德國漢學之研究較其他國家來的特別的是，德國之國家歷史經歷了國家分裂與國家統一。在分裂時期中，其漢學研究亦呈現兩種不同面貌與方式。民主德國（東德）的漢學研究比起聯邦德國（西德）較早「現代化」，西德直到 1968 年學運之後才逐漸地邁入現代化。這兩者在時間上的落差，亦導致研究成果有所不同。在德國統一後，漢學研究中的中國學研究更爲興盛，並且儼然與傳統漢學研究有了明顯之區隔。

過去德國的漢學研究是以語言學與中國古典文化學爲主，迄今在漢學研究上卻逐漸忽略中國文化，僅重視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中國學研究的光芒幾乎掩蓋了傳統漢學研究，因此許多學者便開始憂心並且呼籲：「應該同樣重視中國文化與歷史，才能真正了解中國。」⁷ 今後德國漢學研究發展之歷史脈絡影響，以

⁷ 請見德國之聲中文網。「百年德國漢學 探討昨天和明天。」線上檢索日期：2009 年 7 月 11 日。網址：<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dwworld/20090606/0922330063.html>。

及現在德國漢學研究其傳統漢學與中國學之間的爭論，導致漢學研究之趨勢將會是如何？是就此分道揚鑣？抑或是兩者融合並發揚光大？在本文將作概括性的分析探討。

另一方面，從學運以降到柏林圍牆倒塌的這一段歷史，再到後冷戰與全球化的降臨，其間延續著某一種對西方當代歷史的自我反省，因而又形成要擺脫費正清觀點的研究動機。因此，學者們意識到，雖然現代化的中國研究是以中國的現實做為研究對象，然而，當我們論及「現代化」之時，自我儼然存在一種優越感，而西方對中國之看法普遍如此。王海試圖脫離這種「西方中心」觀點，改以「中國中心」認識中國、審視中國與研究中國。作為德國中國研究轉型的重要見證人。王海之所以值得介紹，就在於他的研究旨趣是擺脫了漢學與費正清觀點最極端的一種可能，亦即從主流漢文化以外的陌生的中國，建立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認識。

王海在《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與制度變遷的承載者》一書中提到，要維繫中國內少數民族與中國中央之間關係並非一件容易之事，特別在中國這個擁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國家之中。在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在外來文化與武力的衝擊下消失了（南美印加文化），有些則是分裂成多個國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然而，中國卻成功的抵住了在歷史進程中的衝擊，中國積極推動公民意識，藉由「國家公民」身分的賦予來維繫不同民族文化地區對國家的認同，從而維持國家統一，使國家不會因為不同宗教、族群及意識形態的分歧導致國家分裂。⁸ 但是，國家發展會因為

⁸ 請見托馬斯 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1-2。

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平衡的態勢，處在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族群發展程度相對低於核心地區。因此，推動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其與其他地區之經濟能均衡發展，是多族群國家經濟整合的前提條件。在政治認同、行政體制、文化傳統及經濟發展這四個面向的整合，是維繫國家完整性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的進程中，區域發展呈現極度不平衡的狀態，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因此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了均衡發展，制訂了西部大開發計畫，在投資等方面轉向西部少數民族地區。⁹ 然而，這個計畫在中央各項政策和尤其對經濟發展推動方面起了多大作用？對當地民眾、企業家產生多少影響？當地少數民族企業家群體是否能因此成長起來？這些涉及了中國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彼此如何看待的問題，因而更貼近一種在地的生活需要與統治需要，距離傳統漢學或費正清觀點益加顯得遙遠。

王海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族群動員方面，一般很少關注中國少數民族，有關少數民族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遷之間的張力調查研究有限，因此他提出三個基本問題作為此少數民族研究的出發點：在彝族社會中，新企業家在社會和社會結構變遷中是什麼角色？彝族民族企業家群體的發展及其對社會動員和族群性的影響是什麼？在經濟和社會變遷之後社會組織（家支、分支）和經濟思維的作用有哪些變化？¹⁰

⁹ Ibid, p. 3.

¹⁰ Ibid, p. 5.

他的少數民族研究通常以個體與總體間的關係與相互影響做為其分析對象，如企業家便處於經濟和社會的角色之間，即同時視企業家為個體和民族企業家，藉以了解經濟和社會變化過程，企業家個人的社會關係以及通過他們所促成的社會整體關係變化。其次，企業家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做為市場領域的行動者，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族群的成員。這種雙重角色不僅具有個體的流動性，亦具備族群的流動性，對於瞭解彝族社會的社會結構變遷過程有很大的幫助。¹¹ 王海的少數民族研究目的主要關注企業家階層的發展，對彝族社會、社會組織群體及其意識造成的社會後果。¹² 王海的研究多著重於單一群體對總體的影響，就像少數民族企業家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與制度變遷的承載者）、私營企業家的功能與對中國的影響（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他的研究朝向三個面向的研究調查：¹³

一、理論面向

以現有關於族群企業家群體的理論來解釋。重點探究經濟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此外還研究了民族企業家和族群身份認同、族群性之間的關連。

¹¹ Ibid, p. 6.

¹² Ibid, p. 8.

¹³ Ibid, p. 10.

二、比較面向

比較涼州漢族與彝族企業在的經濟思維、社會行爲等差異，只有通過比較，才能對族群性和族群認同的複雜性做出有意義的表述。

三、實用研究面向

爲在發展中的彝族企業家提出建議。

在何種背景脈絡中王海形成了他的研究方式？王海之研究對德國中國學轉型又產生何種含意？皆是本文最終要省思的課題。

第三節 研究背景

德國的漢學研究可追溯至 17 世紀，當時許多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如湯若望、魏繼普等人。他們不僅將西方知識帶進中國，亦向歐洲傳播東方文明，¹⁴ 引起歐洲人對東方文明的興趣。但是對於漢學之研究，並未因此而得到發展。學術意義的漢學研究應是始於 19 世紀，即爲因應帝國主義利益之需求而設立的柏林東方語言學院。在 19 世紀的漢學是以語言學與哲學爲主，主要爲外交官提供中文培訓。這時期德國的漢學研究，還不被視爲一項獨立的學科，僅能算是東方學和普通語言學的一項分支。¹⁵ 直到

¹⁴ 請見曹景文，2003。「德國中國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四卷第 1 期，頁 20。

¹⁵ 請見魏思齊，2006。「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況」，**世界漢學**，第 1 期，頁 37-40。

20 世紀初，漢堡的殖民研究所設立後，才產生第一位漢學教授，於是德國漢學研究建立了學術專業性。¹⁶ 於殖民研究所之後，柏林大學在 1912 年創立了第一個漢學系。十年後，萊比錫、法蘭克福等大學陸續成立漢學系，漢學在德國學術界有了普及化之趨勢。

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提到，在 20 世紀 20 年代時期的德國漢學研究有四種趨勢：一、研究興趣在於語言而非文化。二、研究中國與西方之間交流關係史，研究重點在於中國鄰邦與鄰近民族。三、隨著德國殖民主義而產生的現實需要與現實利害關係，使得中國地理學及當代問題占有重要部份。四、儒家思想對西方漢學之影響與控制。¹⁷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933-1945)，德國在北京成立「德國研究所」(後於 1935 年正式更名為中德學會)，成立之目的乃為促進中德間學術及文化之交流。起初，其成員仍遵循著此項原則，提供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對當時漢學研究之貢獻，仍是不可抹滅的。但是，此機構資金主要仍來自於德國外交部，後期的學術研究難以保持其中立性，甚至成為了德國政府的宣傳工具。¹⁸

另一方面，由於政治與種族問題，在戰爭期間有一批優秀的漢學家不得不選擇離開德國，使漢學研究領域損失許多人才，儘管

¹⁶ 請見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3-12。

¹⁷ 載於魏思齊，2006。「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況」，《世界漢學》，第 1 期，頁 40。

¹⁸ 請見托馬斯·詹森 (Thomas Jansen)，2005。「對北京中德學會在 1933-1945 年間所從事工作的幾點說明與質疑」，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190。

戰後，也未見這些人才再回到德國。¹⁹ 因此，在二戰期間的漢學研究，可說是破壞大於貢獻。德國漢學發展相較於英、法，雖然因此而起步晚，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終於也開始有了成果。

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分裂成民主德國（東德）與聯邦德國（西德），在此兩者中之漢學研究也有所差異。先是傳統漢學（Sinologie）與中國學（Chinawissenschaft）有了明顯的分流。²⁰ 在民主德國，漢學研究著重於當代中國研究，故其間的中國學研究若與其他地區漢學專業相比，民主德國的中國學專業與政治的關係是更為密切的。費路（Roland Felber）認為，東德的「當代中國研究可理解為和當代中國歷史、社會、經濟、思想和政治直接相關的研究與觀察。」因此，政治事件可說是影響東德中國學研究之重要因素。由於當時東德的意識形態與中共相同，東德自 50 年代起和中共有密切的交往，加上一批自中共留學歸來的畢業生，掌握當代與新中國的現況，奠定了對當代中國進行科學研究的人員基礎。但是東德並沒有因此大舉轉向現代中國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學研究仍處於中心地位，然後慢慢地逐漸轉向近代中國（1840~1949）之研究，如研究太平天國、孫中山思想等等。²¹

¹⁹ Ibid, pp. 176-185.

²⁰ 傳統的漢學定義，來自於過去德國諸大學所設立之漢學系，以研究中國文獻、語言、歷史為主。而中國學之定義，是以研究當代中國之政治、經濟、法律等更具有實際性的研究領域。請見李雪濤，2007。「德國漢學史的分期問題及文獻舉隅」，**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頁 116-117。

²¹ 請見費路，2005。「民主德國的當代中國研究」，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289-290。

直到 60 年代後期，東德才開始盛行當代中國學研究。根據費路的歸納，隨之而來的東德當代中國學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²²

一、60~70 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爆發~1972 年尼克森訪華）

在蘇聯共產黨的倡導下，東德共產黨開始定期對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進行磋商，以便於他們在相關行動上能保持一致。因此成立研究中國之機構，大學內增設現代中國研究，致力於研究中共的歷史、經濟、思想和政治問題。

二、70 年代（上海公報發表~改革開放進程）

在此一階段中，隨著中國改善與西方的關係，中國對聯邦德國態度的改變，特別是中國在民族問題上的看法，被東德視為一種存在的危險，也因此使得東德對中國的種種發展敏感度提高。²³ 在此一階段，因為蘇聯方面感到中國與西方將結成同盟，這亦將對蘇聯形成威脅。因此，為了抵制中國的分裂企圖，關於中國的負面分析便有誇大化的傾向。依蘇聯的論點，認為中國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並為其帶上資本主義色彩。這些誇大化言論影響蘇聯的盟國，亦對蘇聯與其盟國的當代中國學研究產生影響。在

²² Ibid, pp. 292-295.

²³ 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聯邦德國與中國一般，都是傾向統一，且都視自身為其民族之正統。這與當時民主德國所採取的「分離政策」(Abgrenzung Politik) 相背離，亦威脅民主德國長期以來努力分立兩德間不同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請見許任，2001。「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探討」，**政策學報**，第 1 期，頁 151-153 和畢業論文庫（2008）。「論昂納克時期民主德國的民族分離主義政策」。線上檢索日期：2009 年 5 月 23 日。網址：<http://www.lwkoo.cn/Freepaper/Zhengzhi/minzu/200805/10562.html>。

那時候的政治環境中，要擺脫蘇聯的影響力，發表與其相左的言論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東德於此階段研究焦點集中於中國的外交政策，特別對西歐的外交政策、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本質。

三、80年代初～86年（改革開放的實施～昂納克訪華）

中美建交與中越戰爭等發展，突顯了中國外交政治的獨立性，使東德積極地進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為此，東德停止了誇大其詞的宣傳，試著採取客觀的角度去研究中國正在進行地變化。面對著改變中的中國，此時東德的中國學的研究焦點，乃著重於中國在建立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提下，如何進行經濟改革等政策問題。

四、1986～89年（昂納克訪華～柏林圍牆倒塌）

此階段的特點，是對中國改革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進行觀察分析，並對中國複雜的意識形態變遷進行描述。

和東德情況不同的是，在二戰後，西德學者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沒有機會到封閉的中國進行研究，當時台灣就成了西德各界研究中國的替身。60～70年代之當代中國研究因為政治因素而被忽略，由於西德的中國研究遵守著傳統的漢學研究，就是在中文文獻基礎上，從事語言學研究或考證，以及進行對中國及其歷史、文化的研究。²⁴直到1968年的學生抗議運動爆發，西德對於

²⁴ 請見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32-33。

中國學研究才出現了轉變。1968 年的學生抗議運動是一種近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也是一種反西方權威與反官僚的運動，這個反叛行動受到某種東方意識的影響與中國毛主義的煽動。在 70 年代以前，因為政治接觸少，對於中國的形象仍停留在神話中，在當時西德的認知中，中國如同一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現實替代品。²⁵ 不過，在此次運動中，對於中國的認同以及漢學之研究已經出現爭議，亦即在「現代中國」與「古典中國」之間形成拉鋸。

屈漢斯指出，其實早在 1968 年之前，在那段時空中，聯邦德國處於厭惡美國的外交政策又與蘇聯敵對狀態下，對於紅色中國的刻板形象便已經出現質疑。再者，透過田野調查工作者帶回的報導，米爾達爾（Jan Myrdal）在他的《來自一個中國鄉村的報導》中，顯現出中國並沒有出現類似飢腸轆轆的困境。過去大家都將毛澤東描述成嚴肅的社會改革者，而學者菲利克斯（Felix Greene）則在他的一本名為《狡詐、謊言和智囊團》書中，說明了許多關於中國消息的產生與傳播都是來自西方世界的詭計。²⁶ 於是，另一種形象的中國漸漸在德國散播開來。不可否認的，西德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出現了一段空白，而當時他們透過神話與錯誤的觀點來填補這段空白。當然，會排斥當代中國研究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後來自於紅色中國的文獻多具宣傳色彩，這對西德學

²⁵ 請見屈漢斯，2005。「1968 年的抗議運動、毛澤東思想和西德漢學」，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321-323。

²⁶ Ibid, pp. 326-327.

者而言，認為這種文獻不值得研究。²⁷

這些原有的情況皆在 1968 年的運動中出現轉折。在當時的大學中，大部份中國學的課程都是漢語語言與文字培訓。在驟變的政治氛圍中，這種中國學教育不能滿足變遷的時空，於是對現況感到不滿的學生便模仿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進行中國學中的運動。學生與助教們認為應該學習真正的現代漢語知識，而不必去學習古代漢語和台灣式的漢語。於是，西德的傳統漢學研究轉往現代中國學研究，將大學學習方式導向新型馬克思主義，則古文的培訓便逐漸式微。大學生轉變了興趣，並對傳統中國學施加壓力，最後導致現代日常語言的教學被賦予更大空間，現代文學與思想史也受到更多關注。²⁸ 直至 70 年代末，這種狂熱逐漸平息下來，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學的專業便已經具備了新的研究能力。²⁹ 不可否認的，是 60~70 年代的運動奠定了西德進入現代中國的研究基礎。

許多過去一代西德中國學家如鮑吾剛 (Wolfgang Bauer)、馬漢茂 (Helmut Martin) 等人，皆是以從事古典中國研究以及將台灣當作中國研究之替身作為研究而出名。其中新一代的中國學家－王海 (Thomas Heberer) 頗受注目，比起其他同期的西德中國學家，他很早便投入現代中國的研究。德國的中國學研究為人所詬病之處，便是其出版物多以德文發表，普及化較低，影響力

²⁷ Ibid, p. 332.

²⁸ Ibid, pp. 334-342.

²⁹ 請見魏思齊，2006。「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世界漢學*，第 1 期，頁 42。

也因此較小。但是王海其中國學領域之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他能以德文、法文、英文與中文四種語言發表。³⁰ 其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研究中國之方式是以一種社會人類學的觀點，並採民族誌的田野研究方法，從少數民族、企業家群體等對象的實地參與觀察出發，這些不同於一般研究中國的角度，構思出中國的另一種形象，其研究因而具體而微地見證了轉型中的德國的中國學研究。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相關文獻中，研究各地學者的中國觀皆有，唯歐洲區甚少，因此筆者僅能藉與本文相似之文獻作探討。李圭之在《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中，分析了白鳥庫吉、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和竹內好的中國觀，前三者之間有著繼承與轉化的關係，並且視中國為「他者」，用否定的態度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對日本之影響，藉此突顯日本的特殊性。³¹ 而竹內好則是再度拾回中國，用以批判、論述日本，並將中國視為抵抗西方的方法。³² 陳建廷則在《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中提到，日本藉由對照中國之落後而提出近代脫亞

³⁰ See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2007.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Y.: Routledge, p. 106.

³¹ 請見李圭之，2007。《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73-74。

³² Ibid, pp. 94-98.

論後，面對當今中國的崛起，日本正面臨到國家定位的困境。³³ 以上都是以歷史角度分析日本對中國之觀點，而在當代中國研究中，曾彥中在《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中，探討安戈及何包鋼在中國農村與轉型之研究。安戈的研究主要以政治學角度作分析，而早期由於進入中國不易，因此安戈以香港作為代替，藉由訪談在港陸人進行其研究。³⁴ 何包鋼則是具有哲學背景，因此其研究通常融合了哲學與政治學理論。³⁵ 白婷婷在《學者高敬文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轉型中的知識社群》中，探討學者高敬文的中國觀。高敬文的中國觀是宏觀的，他將中國置於國際關係之中，探討中國內外部問題，其研究慣以問題為導向，然後以研究成果提出解答。³⁶

相較於日本學者對於中國之觀點，德國學者王海對於中國能以客觀的角度作分析，不以西方觀點評論中國，反之，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與安戈 (Jonathan Unger) 和何包鋼 (Baogang He) 不同的是，王海甚早便可進入中國作研究，以社會人類學觀點進行分析，採微觀角度觀察中國，更能精闢的分析探討相關議題與現象。

³³ 請見陳建廷，2007。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68-76 和頁 159-167。

³⁴ 請見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25-29。

³⁵ Ibid, pp. 48-52.

³⁶ 請見白婷婷，2009。學者高敬文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轉型中的知識社群，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44-64。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本文將採質化研究，以歷史途徑進行文獻分析。在文獻分析上，將採取「外在研究法」與「內在研究法」，³⁷前者藉由探討王海之成長背景、時代環境、求學過程等歷史脈絡之影響，並藉此了解其思想之養成；後者將以分析王海的作品，探討其作品內在敘事所傳達之中國知識。本文交互運用兩種方法，處理被觀察者如何成長、反思與成長的發展歷程（發展三部曲），以充分了解王海之思想脈絡以及中國知識觀點，繼而剖析筆者所採之觀察、分析與評論（分析三步驟），交織出王海學術轉型－德國中國學轉型－彝族轉型－筆者分析之多重敘事架構，並進而了解王海在德國中國學界之貢獻，並對德國中國學研究發展產生影響。

在作品的選擇上，除了涉及對中國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研究，本文重點將著重於其少數民族研究，並針對幾部具代表性作品作深入探討。此外，欲研究影響王海思想的這些歷史脈絡，德國的中國學發展文獻亦是分析之要素。這些文獻將由期刊、論文、書籍中獲得，其他包括王海的成長背景等相對個人之資料文獻蒐集較為困難。因此，筆者將藉由訪談方式建立口述歷史來完成。相關文獻以中英文為主，德文為輔。

³⁷ 請見曾倚萃，2007。論溝口雄三的中國方法，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頁 15-16。

第六節 研究限制

由於王海的著作眾多，無法逐一作分析探討，因此筆者將其大宗歸納為三類，故部分議題將有所遺漏。此外，本研究主要在於研究王海的著作與其思想建構，因此僅針對其研究作探討，在部分專業（如：少數民族、彝學）上僅有應本文撰寫需要而作的基礎認識，無法深入探討，部分多有疏忽。

王海著作中所提及的彝族觀點與影響無法代表全體少數民族，亦不能代表全中國。因此，此處所指涉之中國意象並非整體宏觀，而是從社會人類學角度，以微觀的特殊單位（如：企業家群體、彝族）角度切入，呈現不一樣的中國意象。除此之外，本研究僅針對王海作個人的思想研究，研究成果並不能代表整個德國社會與學界之觀點，僅能屬於其中較具有特色與影響力的一部分。

第七節 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

本章節將介紹本文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以及研究方法與途徑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德國漢學之歷史脈絡

本章節將德國漢學歷史分成四個時期：

一、17~18 世紀漢學啓蒙時期：

本節介紹早期傳教士（湯若望等）遊歷中國所帶回的中國意象，對歐洲社會之影響，以及對漢學研究之啓蒙。

二、19~20 世紀初殖民主義漢學時期：

本節將介紹帝國主義時期，爲了帝國利益所做的漢學研究之特色，而在這個時期許多漢學研究機構亦陸續成立。

三、二次大戰~戰後國家分裂漢學大分流時期：

二次大戰期間，大多數漢學研究受到納粹政府所控制，漢學研究披上了政治色彩，加上大批優秀猶太學者受到驅逐，而且受驅逐之學者於戰後亦未見歸國，使德國失去許多漢學人才。戰後的德國又分裂成民主德國（東德）與聯邦德國（西德），在此時漢學研究出現了明顯的分流，分成傳統漢學（Sinologie，以研究古典中國語言、文學與歷史文化爲主）以及中國學（Chinawissenschaft，研究中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而兩德之漢學研究亦有差異，本節將介紹此時期之漢學發展。

四、現代漢學時期：

在兩德統一後，經由大學系所與研究機構可以得知，德國漢學研究明顯以中國學爲主流。因此，本節將藉由現今德國各大學系所之設立、教學目標以及各個漢學研究機構之出版品等面向，了解現在德國漢學之發展趨勢。

第三章：當代中國學時期 — 王海（Thomas Heberer）之背景與思想養成

本章節將介紹王海的成長背景、學習過程與研究生涯，經由

這些來透視王海的思想養成過程，並分析王海處在什麼樣的轉型環境，以及他如何掌握這樣的環境變遷，建立自己的研究議程，並設定研究活動的政治與社會意義。

第四章：王海的中國意象

本章節將藉由王海幾部代表性作品如：《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與制度變遷的承載者》、《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等，分析其建構中國意象之方式。並由此再探討其思維對德國當代漢學之影響。

第五章：結論

本文將反省中國研究在德國的變遷，王海在其中的角色與評價，以及王海作品中所透露少數民族研究對中國研究的意義。

第二章 德國漢學之歷史脈絡

前言

欲探討德國學者之中國學研究，了解德國漢學歷史脈絡為之重要。德國漢學研究雖然較晚於英、美、法國，但是在二戰之後在當代中國學上卻有豐富的貢獻。德國不僅歷史發展過程特殊，在其歷史進程中亦產出許多著名哲學家。然這些哲學家身兼數職，中國研究亦是其專科之一。在 17 至 18 世紀之時，作為歐洲的德國只能崇尚流行，跟著迷上「中國熱」。但是，隨著國家發展，逐漸壯大的德意志帝國對於中國之研究，轉向以利益為導向，漢學研究更注重其實用性。然而，最大的變革乃於二戰後，德國面臨國家分裂，而漢學亦在此時出現分流，亦明確界定漢學與中國學之分家，並且為「現代漢學」或稱「中國學」建立基礎。此後，中國學研究逐漸超越傳統的漢學研究。

本章節將整理諸多學者之研究，並歸納成四部分探討德國漢學之歷史脈絡，並作概略性的介紹。

第一節 17~18 世紀漢學啓蒙時期

歐洲漢學之興起，可追溯至 17 至 18 世紀，這個時期已是地理大發現時代末期。歐洲在地理大發現時期，不僅從海外累積豐

富資源，亦將海外諸國文化引入歐洲，使歐洲人得以認識許多陌生國度，產生想像意識。然而，這種情形到了 17 世紀更達到高峰。在諸多的陌生國度中，又以中國最令當時歐洲人感興趣，在 18 世紀時掀起一股「中國熱」。歐洲的中國熱，可分成「俗」與「雅」兩種層次。³⁸ 前者指的是從下到上、從平民百姓到王公貴族對於中國文化的狂熱追求。他們的狂熱行為包含對中國藝品的收藏、園林景觀與服飾的模仿以及了解中國的奇聞軼事。因此，這類「俗」層次的熱潮，主要偏重於物質文化形態，對於中國的了解僅處於淺層，有時這類狂熱追求甚至已非理性，也因此，容易對中國意象產生許多誤解。³⁹ 而所謂的「雅」層次，指的是學者與思想家等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所產生的巨大興趣，進而開展研究。他們對於中國文化未必盲目追求，而是力圖採理性思考，並且用以對照歐洲現況，使對中國文化的閱讀真正有助於省思歐洲思想。⁴⁰ 然而，這兩種層次的中國熱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互影響。藉由前者啟發後者，後者深化前者，⁴¹ 建構出 18 世紀歐洲的「中國熱潮」。其中也受這股「中國熱」影響的德國，不僅是在建築上的模仿，更主要仍是在於影響某些哲學家與學者身上，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便是一個例子。但是，這股熱潮只在德國上層階級發酵，並未對整個德國社會造成太多震盪。

³⁸ 請見許明龍，2008。《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2-3。

³⁹ Ibid.

⁴⁰ Ibid.

⁴¹ Ibid.

第一項 引發中國熱的媒介

究竟歐洲是經由何種媒介導致中國熱呢？這些媒介包含了到過中國的商人、旅歐的中國人、歐洲傳教士與外交官。商人以藉由貿易獲取利益為主，其透過貿易方式將中國商品西傳，僅提供中國文化物質層面交流的部份，具體影響有限。但是，其他三者之貢獻就較商人為具體。旅歐之中國人多為傳教士遴選來作為培訓之神職人員，其培訓內容自包含語言訓練。因此，他們在歐洲除了接受神職訓練外，就是從事翻譯工作。他們藉由翻譯中國典籍，將中國文化較為具體引入歐洲。但是，當時的中國由於鎖國政策與交通不便，能到歐洲的中國人屈指可數，因此他們的影響力仍有限。而外交官所傳達的中國文化，屬於較高層次之資訊，其藉由與中國政府文書往來之資料以及與王公貴族交流之書信，使歐洲對於中國政治與上層社會有些許了解。⁴² 但是，這兩者之影響力實在有限。真正影響歐洲中國熱的產生，屬傳教士之貢獻最功不可沒。

第二項 傳教士的角色

傳教士隨著各自來華時間的不同，在中國之任務便有所差異，其中又以耶穌會的傳教士對於歐洲與中國文化交流之貢獻最

⁴² Ibid, pp. 3-6.

大。這些傳教士在華時期，許明龍將之大致分成序幕、第一期、第二期與尾聲：⁴³

一、序幕（16 世紀中葉左右）

明末清初幾位為羅馬教廷到中國探路的傳教士，他們皆踏上中國土地，卻因為種種因素未能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但是卻為教廷傳教於中國揭開序幕。

二、第一期（16 世紀末葉～17 世紀中葉）

16 世紀末，傳教士羅明堅（Father Michele de Ruggieri）才真正進入中國內地作實質性的傳教。此後，在 17 世紀接續到來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對西學東傳以及東學西傳之貢獻最大。

三、第二期（17 世紀末葉～18 世紀末葉）

法國耶穌會到中國傳教，中國與歐洲之文化交流達到另一波高峰，這個熱潮持續了數十年，直到西元 1775 年（乾隆四十年）耶穌會被解散為止。

四、尾聲（19 世紀初～中葉）

在中國的耶穌會被教廷宣告解散後，傳教活動視同停滯，雖

⁴³ Ibid, p. 30.

有僅存幾位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但已無多作為。因此，教廷在中國的傳教在此停滯下來。

許明龍進一步說明，傳教士在華期間，除了傳教活動以外，其餘時間亦向中國傳授西學。第一期的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等人，藉由傳授西方知識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吸引文人名士注意，進而宣傳天主教義，使其信奉天主教。⁴⁴ 之後，從湯若望開始為皇室服務後，這些傳教士便成了皇室的專屬，也因此西學並未對中國普羅社會帶來太多影響。另一方面，傳教士們除了在中國傳授西學之外，亦向歐洲介紹中國。起初，第一期之傳教士研究中國古典，用以了解中國人的思想，以利其傳教活動，但這種研究仍缺乏深度與廣度。直到第二期，耶穌會士們因為得到法國政府的鼓勵與支持，再加上歐洲非教會學者對中國所產生的巨大興趣，再者則是受到天主教會內部延續許久的中國「禮儀之爭」影響。⁴⁵ 使得這些因素，特別在「禮儀之爭」這場論戰上，促使在華之傳教士對立雙方，能夠強化各自對中國傳統之研究，並在寄往歐洲之書信或其著作中，充分表達各自觀點，以爭取歐洲社會之同情與羅馬教廷之支持。這類著作引起歐洲各界人士的關注，亦增進

⁴⁴ 請見董叢林，1992。《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47-48。

⁴⁵ 「禮儀之爭」係指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人的禮儀問題上發生的爭執；這是一場持續許久的論戰，時間從 17 世紀初延續到 18 世紀中葉，長達一百餘年。羅馬教廷強令傳教士，必須遵照執行其所定義之中國禮儀，並多次派遣使者來華，企圖說服中國方面接受教廷對中國禮儀之判斷，因而導致中國皇帝強烈反感，最終致使天主教遭禁，傳教士活動受到嚴重限制，對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產生負面作用。請見許明龍，2008。《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40。

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⁴⁶ 雖然許多傳教士因「禮儀之爭」而返回歐洲，但是他們並未因此停止介紹中國。他們返回歐洲後積極著書立說，介紹中國文化。⁴⁷ 因此，以上種種因素亦推進傳教士們對中國的研究，使這類研究逐漸成爲一門學問，即爲漢學。⁴⁸

第三項 傳教士與漢學

傳教士所推動的中國研究包含了三層意思，⁴⁹ 首先，傳教士引發了歐洲學者對於中國的興趣與關注。在 18 世紀以前，歐洲人對於中國的認知甚少，知識界亦是如此。在「禮儀之爭」期間，不同立場的傳教士們，竭盡所能地爲其觀點作辯護，他們以其熱情與知識對中國做了各方面的介紹，使歐洲人認識中國，進而引發歐洲各界對於中國這個既陌生又富神秘感的國度之興趣，這種影響特別在歐洲知識界發酵。

其次，傳教士爲這些歐洲學者的中國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與少量的實物資料。傳教士的著作多以紀實爲主，著作所述皆是其於中國期間之所見聞。儘管在觀察事情角度不同或個人因素以致無法客觀陳述，但是這些資料仍是對觀察中國的真實反應。因此，傳教士所提供的資料文獻，是當時歐洲學者研究中國之重要依據。

⁴⁶ Ibid.

⁴⁷ 請見張西平，2009。《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中華書局，頁 358-370。

⁴⁸ 請見許明龍，2008。《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33-34。

⁴⁹ Ibid, p. 56.

第三，傳教士對於歐洲學者的中國研究，給予了支持與幫助。傳教士總是耐心回答學者所提出各層面問題，認真地審閱學者們有關中國之著述，並提出具體的意見。除此之外，亦協助寄送各種相關研究文獻資料、研究樣本（植物種子、藥物樣本）等。而從中國功成身退返回歐洲的傳教士，亦在其繁重教務閒暇之餘，撥冗接見研究中國之學者，熱情為其解決各種研究上之難題，並且與其建立長期關係。傳教士們透過與歐洲學者建立關係，亦有利其傳教事業，其透過歐洲學者爭取歐洲各國君主、教會、百姓在人力、物力與精神層面更多支持。許多傳教士甚至把中國研究作為來華的任務之一，因此，幫助歐洲學者猶如推進自己從事的中國研究。也因此，傳教士對於中國研究更加不遺餘力。

傳教士與非教會的歐洲學者來往，亦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媒介之一。這些學者對於中國之興趣與研究，目的皆是為了反省歐洲問題。他們藉由研究中國，把研究結果用於改變歐洲，因此這些非教會學者的研究對於歐洲人之影響是值得關注的。⁵⁰ 其中，德國思想家與科學家萊布尼茨的貢獻極大。萊布尼茨並非只是一位哲學家，他亦是律師、數學家、法學家、力學家等多達四十餘種專業領域的「全才」。因為他全方位傑出的表現，使其成為歐洲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萊布尼茨所處的年代適逢歐洲「中國熱」時代，與大部分歐洲人不同，他並非因為喜歡中國瓷器與園林建築而愛上中國，而是因為深入中國思想層面，體會中國的精神世界而愛上中國。

⁵⁰ Ibid, pp. 48-49.

萊布尼茨於 1689 年遊歷義大利時，結識了耶穌會派遣至中國的傳教士，這個經歷使他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興趣。萊布尼茨與在華傳教士的來往，使其得以直接獲得關於中國的消息，有助於他日後的中國研究。萊布尼茨在 1697 年出版其著名的一部書，亦是他最具影響的一部關於中國的編著－《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中國近事》所敘述中國的情況極為豐富，涉及層面相當廣闊，是當時歐洲難得的一部著作。書的內容共包含六篇文章，其中五篇為在華耶穌會傳教士所寫，另一篇為外交官所著。文章內容在於敘述當時的中國社會，以及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⁵¹

《中國近事》提供當時歐洲思想與文化界主流對東方文化、中國文化一個系統性的介紹。萊布尼茨與其他傳教士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不同，他秉持一貫平等的態度觀察中國。⁵² 他承認中國某些方面高於歐洲，如中國在實用哲學方面，或稱為道德戒律方面，以及日常生活的政治方面的文化就高於當時的歐洲。他認為中國能夠巧妙地運用法律，建立社會秩序與維繫國家安定，使人們彼此之間較少發生分裂，因此萊布尼茨相信，中國人比歐洲人具有較高的道德水準。⁵³ 他試圖從對細節的觀察中，找出中國的優點，並用以反襯歐洲，對照歐洲問題。他認為歐洲和中國的文化交流可以使雙方學習到對方的歷史經驗，從而促進各自的

⁵¹ 請見張西平，2009。《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中華書局，頁 631-632。

⁵² *Ibid.*, p. 643。

⁵³ 請見許明龍，2008。《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156。

發展，此外還可透過中西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創新和發展。萊布尼茨認為，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不僅是學習對方技術與歷史經驗而已，而是希望透過兩種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能夠產生新思維，進而推展兩大文明的發展。⁵⁴ 萊布尼茨是歐洲最早發現中國的思想家，其漢學研究說明歐洲早期漢學的誕生不僅是歐洲東方學的擴展，而是與歐洲近代思想變遷聯繫在一起。⁵⁵ 萊布尼茨的思維以及其著作《中國近事》，在思想變遷的進程中，給予當時的歐洲極大地影響。

傳教士如同一座橋樑，連結了中國與歐洲，促成兩者文化交流。不僅如此，傳教士的研究，或稱為傳教士漢學，直接向 17 至 18 世紀歐洲介紹中國，並在當時的歐洲掀起一股「中國熱」。此熱潮亦衝擊當時歐洲學者的思想，對於歐洲近代思想變遷有著極大影響。因此，傳教士的研究以及影響，可說是歐洲漢學研究之啓蒙。然而，這股「中國熱」最終在「禮儀之爭」後逐漸降溫。隨著清政府實施禁教政策，以及最後教廷解散在華耶穌會，中國與歐洲之交流因而停滯下來。

第二節 19~20 世紀初殖民主義漢學時期

自中國禁教以及羅馬教廷解散中國耶穌會以後，中國與歐

⁵⁴ 請見張西平，2009。《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中華書局，頁 640-641。

⁵⁵ Ibid, pp. 665-666.

洲便中斷聯繫，對外採閉關自守政策。近百年的閉關自守政策，導致中國科技落後歐洲，歐洲人再到中國時，已是挾著船堅砲利推開中國大門。由於中國的落後，歐洲在此時期的漢學研究多以歐洲中心主義為觀點進行。再加上帝國主義之興起，此時的漢學研究也以因應帝國的利益，在德國的漢學研究，亦不超脫此目的。

19 世紀德國的漢學，其仍然隸屬於東方學與普通語言學系的學科。大部分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多是基於個人對漢學或滿學的喜好，而這時期德國大學亦尚未具備培養漢學專業人才之能力。但是，在 19 世紀初期仍有許多學者，儘管他們並不是以漢學為唯一專業，但是其研究為爾後德國的漢學發展立下基礎。

第一項 德國漢學基礎之奠定

身為德國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的克拉普洛特 (Julius Klaproth)，還兼具著漢學專業。但由於早期德國漢學研究並不盛行，因此他轉往法國發展。他出版一本漢語－拉丁語讀音對照手冊，對於早期漢語學習有極大貢獻。此外，他還提出漢語及藏語是系出同源，同屬藏緬語族，這一觀點日後成為語言學界之定論。其致力於推動漢學研究，並於 1822 年與法國知名漢學家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Remusat) 共同創設「亞細亞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以及於 1825 年創辦以亞洲語言文化為對象的專業刊物《亞細亞學報》(Journal Asiatique-J.A.)。⁵⁶ 克拉普洛特不僅對德國，對整個歐洲的漢學研究發展影響極大。

⁵⁶ 請見李雪濤，2008。《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32-33。

19 世紀初期德國漢學圖書與資料的建設，亦是奠定爾後德國漢學發展之基礎。這類圖書資料之建設，應歸功於另一位德國漢學家諾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諾伊曼意識到德國漢學知識藏書之不足，因此他到中國採購了千冊珍貴書籍送回德國。這些書籍與中國歷史、哲學、宗教以及語言均相關，對漢學研究有極大助益，亦對日後這類漢學研究奠定基礎。但是，諾伊曼對中國的認識與其他主流思想一樣，認為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但諾伊曼對於德國 19 世紀漢學圖書資料的建設，仍功不可沒。⁵⁷

第二項 實用漢學的出現

在漢學教育上，德國雖然在部份大學設有臨時教席，但是直到 1887 年柏林東方語言學院（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設立後，德國才正式擁有一個教授漢語的永久性教席。因應帝國利益而設立的柏林東方語言學院，乃以教授實用東方學為目的，特別著重於現代語言學習，以及對亞洲國家現實問題之認識。在此之前，德國外交部必須將受過學術與軍事訓練的青年送往亞洲國家首都，以便他們學習當地語言，當時這些做法皆與德國對亞洲國家之政治與經濟利益相關。無論如何，到了 19 世紀末葉，外交與通商所需之專業東方語言人才劇增，因此柏林東方語言學院便應運而生。德國在這個

⁵⁷ Ibid, p. 34.

時期所建立的這類型學院，具有外交謀略的意義，其目的在於加強與亞洲國家的聯繫。學院成立後設立了六種語言訓練（漢語、日語、阿拉伯語、印地語、波斯語和斯瓦希里語），但是除了語言訓練外，其更加著重對於亞洲國家風土民情之了解。⁵⁸ 因此，相關國家的宗教、風俗、地理與近代史的介紹便顯得相當重要。在學院中的任課教師，皆是具有國外多年生活經驗的專業人士。而學院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多位後來還成為德國東方學的傑出人才。⁵⁹

在此時期的傳教士，扮演著實踐型的職業漢學家角色，他們藉由在中國傳教期間，就近研究中國。他們與 17 至 18 世紀的傳教士不同，從本質上而言，他們除了還是虔誠教徒之外，在專業性質上，其角色已經轉向漢學家。而且這類型居住在中國的德國漢學家之水準，比德國國內的漢學家要來的高。因為其資料運用以及調查方面，要比遠在歐洲的學者來的方便，因此其學術價值與成就也較高。⁶⁰ 德國新教傳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便是一個例子。花之安對中國哲學、宗教、歷史、社會和植物學有很深入地研究。其他有成就的漢學家還包括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他還是德國著名的地理和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前後八次前往中國作田野調查，其足跡遍及中國山東、河北、四川和華中、華南、華西與東北等地，為當時的德國學術界與政界，

⁵⁸ Ibid, pp. 39-40.

⁵⁹ Ibid, pp. 164-165.

⁶⁰ 請見李雪濤，2008。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49。

提供有關中國地理與地圖的精確描述，還為當時德國政府的東亞政策奠定基礎。不過，他的這些研究終究是為德意志帝國在中國的經濟與殖民發展在提供具體建議。⁶¹

第三項 漢學研究方法之推進與學術專業性之建立

李雪濤說明，19世紀德國漢學之特色在於三大項目：⁶² 一、漢語及漢字；二、歷史學；三、四裔學。首先，在漢語及漢字部份，當欲研究、理解一種外國文化時，掌握其語言及文字便成爲一項基本的入門知識，如此才能夠真正深入了解該文化。因此，這時期所設立的東方語言學院便扮演著重要角色。該學院除了以學術研究爲教學研究目的外，亦爲滿足帝國政治與外交等方面教授實用漢語課程。此外，爲了因應初興起的德意志帝國爭奪海外殖民地之需要，該學院更加具備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

其次，在歷史學方面，在18世紀以後，德國史學家視中國爲一個停滯不前的衰老帝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亦有同感，因此學者們對中國之熱情逐漸消散，並且輕視中國儒學，舉例來說，德文中以孔夫子

⁶¹ 李希霍芬這部劃時代的著作名爲「中國—親身經歷的旅行以及據此所作的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這部著作精確的描述中國地理與地圖，超越當時歐洲所有關於這方面的知識，描繪了一幅廣闊和多樣的中國地域圖景。請見李雪濤，2008。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46-47。

⁶² Ibid, pp. 49-51.

（Konfuzius）的諧音與糊塗蟲（Konfusius）混用。⁶³ 與 18 世紀以前的漢學研究不同的是，他們不在是專注於經典古籍的翻譯與研究，逐漸興起的是對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與關注。而具有傳教士與漢學家身份的郭士立（Carl Gützlaff）便是一例，他在 1852 年出版《道光皇帝傳》（*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該書敘述了當代中國的情況。因此，自郭士立開始，歷史學家不再只是通過語言和古老文獻研究中國文明，實際發生之事件亦成爲其關注之焦點。

過去西方學者認爲，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且停滯不前的帝國歷史，並不適合作爲世界歷史運作中，文化學科領域的一門。但由於當代史研究的出現，西方世界又重新將中國納入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只是此時期多數漢學家仍將中國排除於西方文明概念之外，研究中國之目的乃是以歐洲的模式「開發」中國，並且「文明化」中國。多數漢學家研究中國之目的，仍是爲了滿足其帝國之需求，如李希霍芬的研究或東方語言學院之設立等，皆與當時德意志帝國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有極大關聯。即使如此，仍有部份漢學家抱持著不同觀點研究中國，在萊比錫大學任教的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便認爲中國是具有高度文明的自然民族。他不認爲中國需要歐洲人以西方宗教與西式教育等來「教化」中國，更反對西方列強以軍事武力侵略中國，認爲應該用文化影響中國。

⁶³ 請見董叢林，1992。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128-129。

最後，在四裔學方面，過去早期西方關於中國史料涉及最多的是在匈奴、突厥、吐蕃與蒙古等民族，中國西部邊疆地區與中亞部落亦成爲德國漢學家研究重點，許多該時期出版的著作，如夏德（Friedrich Hirth）的《大秦全錄》（*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等，皆是以中亞各民族作爲研究對象。這樣以中亞民族爲對象的研究，也等同於將中國置於一個更加廣泛的中亞背景當中來觀察。

19 世紀的歐洲漢學研究是研究當代中國歷史的開端，除此之外，就其研究方法，在 19 世紀上半葉仍處於資料蒐集與整理階段，大多數的著作與文章只是在中國文獻上作翻譯與介紹，具體研究較少；19 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漢學家對漢語的掌握，其對中文文獻運用便更加靈活。此外，歐洲科學技術的發展亦提供人文研究方面新的思維方式，各項學科如地理學、歷史學及人類學等各種研究方法逐漸運用在漢學研究上，這種嘗試使得此時期的漢學研究成果與水準獲得極大提昇。

李希霍芬以親身經歷與觀察所完成的研究，雖然性質偏向地質學與地圖學之研究，其實際上已超出了狹義的漢學領域。這類型的研究方法卻對往後的實證漢學研究起了相當重要的示範作用。⁶⁴ 李雪濤指出，過去的漢學研究者僅是埋首書叢中作研究，他們多未真正到過中國，因此並不完全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僅將漢學視爲考古研究的其中一門學問。但是 19 世紀中葉以後，由

⁶⁴ 請見李雪濤，2008。《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51。

傳教士、外交官與探險家等這類注重現實的漢學家，引導著漢學從經典古籍書叢中轉向當代漢學研究。而漢學成爲一門真正學科以及「Sinology」一詞在歐洲的誕生，已是 19 世紀末葉。⁶⁵

直到 20 世紀初期，德國在漢學研究上才真正具備學術專業性。1908 年，德國在其重要對外之海港城市漢堡，建立漢堡殖民研究所 (Hamburgische Kolonialinstitut)，並且在次年產生了第一位漢學教授與教席。此後，德國幾個大城如柏林、萊比錫與法蘭克福相繼在其大學設立正式的漢學教席，⁶⁶ 而這些漢學教席的設立，展開往後德國漢學在學術專業上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 30 年代，德國漢學研究已有相對明確研究對象，其方法也較爲成熟，學科亦具備穩定的專業人才。德國漢學在教學與研究上之素質與研究成果，相較於同期其他歐洲國家，已堪稱先進。

第三節 二次大戰～戰後國家分裂 漢學大分流時期

20 世紀 30 年代以後，由於納粹政權上台，使德國國內局勢出

⁶⁵ Ibid, pp. 52-53.

⁶⁶ 柏林於 1912 年設立德國在漢學研究上的第二個教席，但是由於德語區缺乏合格的求職候選人，因此，該教席特別聘請出身萊頓的荷蘭人哥羅特 (Johann Jakob Maria de Groot) 擔任該教席。萊比錫則在 1914 年設立漢學教席，由孔好古任職該教席。法蘭克福在 1924 年，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利用私人基金建立的法蘭克福中國研究所，爲另一個與大學相關連的漢學教育與研究中心，並產生第三個漢學教席。請見費丁豪，「從德意志帝國到第三帝國之間的中國學」，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131-132。

現巨大變化，影響層面不僅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上，就連學術界也遭受波及。1933年希特勒簽署並頒發的一部法律——「恢復職業公務員法案」（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該法律完全針對種族主義而設，剝奪猶太人在政府部門任職的資格，範圍包括在大學任教資格。除此之外，還立許多法條限制那些非納粹黨員，以及一些政治上與黨對立之人員。⁶⁷因此，許多優秀漢學家在此時期出走或被迫出走至其他國家發展，其他留在德國未被驅逐的漢學家，為求自保也紛紛加入納粹黨，這種窘境使德國正逐漸興盛的漢學研究停滯下來。⁶⁸

納粹政府雖在1933年至1945年間於中國成立「德國研究所」或稱為「中德學會」（Das Deutschland-Institut in Peiping），該研究所成立之宗旨在於建立中德文化與學術交流關係。雖然以學術研究為其目的，但是作為政府所控制的組織，實際上仍具有宣傳功能。⁶⁹在二次大戰期間，德國許多大學與漢學圖書館受到破壞，戰後還能保持完整的只有漢堡大學的漢學系，其餘絕大部分大學都遭受極大地摧殘。至於在戰時遭到驅逐的漢學家，在戰後也未見歸國，造成德國漢學界損失許多人才。因此，納粹執政時期亦可說是德國漢學研究的災難時期。

二次大戰之後，德國百廢待舉，對於漢學學術之重建成了另一項艱難課題。二次大戰雖然摧毀了許多珍貴資料，但是經過重

⁶⁷ 請見李雪濤，2008。《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135。

⁶⁸ Ibid.

⁶⁹ 請見王維江，2004。「20世紀德國的漢學研究」，《史林》，第5期，頁11。

建以後，德國漢學因此能夠確立成爲一門獨立學科。而二次大戰以後，德國分裂成「聯邦德國」（西德）與「民主德國」（東德），漢學研究在這兩者之間也有了明顯的不同。與此同時，漢學研究也隨著國家分裂，如火如荼地進行漢學研究的分流。

第一項 民主德國的漢學研究

戰後的民主德國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加入了蘇聯共產陣營，比起聯邦德國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G)，民主德國擁有更多機會進入中國作研究。然而，東德與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係之好壞，影響東德對中國學研究的重視程度。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爲東德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到了 60 年代，中國卻成爲東德與蘇聯的主要敵人之一。如此因爲與中國關係的變化無常，使東德政治家將中國以及漢學研究視爲重要研究課題，也因爲這層多變的關係，漢學研究 (特別是在當代中國學研究部份) 在東德的重要性遠勝於西德。⁷⁰ 坎鵬 (Thomas Kampen) 便指出，比起其他東歐國家，東德的中國學研究具有相當大的規模。20 世紀 50 年代，東德僅有柏林與萊比錫大學設有漢學研究機構，但是到了 80 年代，漢學研究出現較大規模的機構如下：⁷¹ 科學院語言和歷史研究所 (ADW)、社會科學和法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 (IIB)、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社

⁷⁰ 請見坎鵬，「民主德國的中國學研究：科學計畫、高校論文及自我描述」，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262-263。

⁷¹ Ibid, p. 263.

會科學院（AFG 或 IFG）下屬的國際工人運動研究所、萊比錫大學漢學系、柏林洪堡大學漢學系、柏林洪堡大學中國現代史專業（HUB/FGNG）。

50 年代以來，由於東德積極想要與遠在東方且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盟友關係，並發展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關係，因此對於中國學專業人才需求極大。東德政府便開始積極培養中國學人才，當時且有大批東德學生因此被派往中國留學。東德政府對中國學學科有著相當完善的規劃，對於學生未來就業或教授教職皆有良好的安排，中國學研究亦因此在東德活絡起來。但是，隨著 60 年代中蘇衝突使東德與中國關係出現變化，對漢學家需求大幅減少，各大學漢學系因此不得不進行縮編。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得這時期漢學／中國學研究與漢學／中國學家的培養大幅減少，這種劣勢使許多漢學系學生選擇離開該領域。但是 60 年代卻反而奠定東德當代中國學研究的機會，由於許多漢學家的出走，間接削弱了東德在古典漢學上的研究。⁷² 坎鵬更說到：「自 1964 年以後，沒有一位教授是重點講授古代漢語。與此同時，萊比錫大學的古典漢語研究所也關門了。」⁷³ 這種情況也導致原本學習古典漢學的學生，畢業後只能作一般的研究，無法從事教學工作。

古典漢學研究的削弱，也反應在當時論文篇數中，當時僅有少數的碩士及博士論文是以 1840 年以前的中國作為其論文題目寫作，大多數則是以 1840 年以後的中國作為研究對象。⁷⁴ 在 70

⁷² Ibid, p. 269.

⁷³ Ibid.

⁷⁴ 在民主德國撰寫的 236 篇碩博士論文中，共有 189 篇是關於 1840 年以後的

～80 年代，東德爲了解中國當時的對內政策、社會和思想，於是在中蘇關係緩和之後，設立了「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或稱國際工人運動科學委員會，專門研究上述各項領域。東德在 1973 年制定一項「當代中國研究計畫」更加確立各研究機構之研究重點與工作分配，請見表 2-1：⁷⁵

表 2-1：各研究機構之研究重點

研究重點	研究機構	國際工人運動委員會	柏林洪堡大學中國現代歷史專業	國際關係研究所
1.工人階級的發展		○		
2.毛澤東思想的本質		○	○	
3.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		○	○	
4.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毛主義者的分裂活動		○	○	
5.中國領導人的歐洲政策		○	○	○
6.同反動的資產階級漢學理論， 特別是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的漢學理論之爭辯			○	

資料來源：筆者參照坎鵬教授之歸類製成表格

中國，只有 47 篇研究 1840 年以前的中國。而 47 篇論文中 35 篇是在 50～60 年代完成的，其他 12 篇則是在之後的 20 年完成。請見坎鵬，「民主德國的中國學研究：科學計畫、高校論文及自我描述」，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270。

⁷⁵ Ibid, p. 268.

70 年代之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高層對中國與國際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政治與經濟議題上有著濃厚興趣，其中又以政治議題為最主要研究課題，這個結果亦顯現在當時碩博士論文題目的選擇上，半數以上論文是與中國政治相關。⁷⁶

隨著各階段東德領導人對華政策的不同，費路（Roland Felber）將東德的當代中國學研究發展分成四個階段：⁷⁷ 一、60～70 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爆發～1972 年尼克森訪華）；二、70 年代（上海公報發表～改革開放進程）；三、80 年代初～86 年（改革開放的實施～昂納克訪華）；四、1986～89 年（昂納克訪華～柏林圍牆倒塌）。而東德對中國學之研究方法是以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共產主義觀點來研究中國，從政治、經濟和思想各方面作綜合性的研究，以完整歷史辯證法來看待中國社會發展，這樣一來才能全面觀察中國社會的進程。這種觀察方式便顯現出政治生活和思想領域的現象並非獨立，而是和社會發展相關聯。因此中國政治所發生的變化，就有他相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⁷⁸

綜合以上論點可以得知東德中國研究之範式有以下幾種：⁷⁹

1. 用維護社會主義與保護社會主義陣營的觀點分析毛澤東政策與中國的發展。

⁷⁶ 在 80 年代完成的 37 篇博士論文中，有 19 篇屬政治類，歷史類有 5 篇、經濟類 4 篇、農業類 3 篇、文學類 2 篇、哲學類 2 篇、語言學類 2 篇。Ibid, p. 273。

⁷⁷ 請見本文頁 9-10。

⁷⁸ 請見費路，「民主德國的當代中國研究」，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296。

⁷⁹ Ibid, pp. 298-300.

2. 東德的生存是依賴於和蘇聯的盟國關係，對中國的研究主要採用蘇聯觀察中國時所用的角度。直到 80 年代以後，東德才試圖脫離蘇聯觀點，這也是基於東德自身利益和謀求與中國之間關係正常化才做的改變。
3. 在無產階級統治地位不可動搖的前提下，以無產階級的觀點來分析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

礙於當時東德不允許政治學科的存在，因為害怕學者會以政治學觀點對其制度作分析，故學者只能從維護政權的觀點來分析政治制度，這樣一來反而忽略了民主問題、抗議活動等議題研究。而且由於過度注重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執行者中國共產黨身上，甚少於關注黨外或一些違背黨意志之政治與思想領域內的發展。⁸⁰ 東德的中國學研究受其政治與研究範式所影響，其研究成果亦因此受到侷限，而且在冷戰結束後，這種馬克思、共產主義觀點範式的倒塌，如何建立一套新範式是兩德統一後，前東德學者需要面對的新課題。

第二項 聯邦德國的漢學研究

二次大戰結束後，西德僅剩漢堡大學還保有漢學系，在此之後，到了 1946 年，慕尼黑大學 (Ludwig-Maximilian-Universität München) 才再次設立漢學專業，在鮑吾剛 (Wolfgang Bauer) 等教授努力之下，進一步設立漢學系。一直到了十年之後，柏林

⁸⁰ Ibid.

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才又設立漢學系。緊接著西德各大學的漢學系與漢學教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如：波恩大學（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1957 年）、科隆大學（Universität zu Köln, 1960 年）、法蘭克福大學（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1962 年）、海德堡大學（Ruprecht 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1962 年）等大學設有多達 20 多個漢學教席。⁸¹

西德的漢學研究也受到政治因素羈絆，維持純粹的傳統漢學研究，也就是在中文文獻基礎上，從事語言學研究或考證，以及進行對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研究。⁸² 而且在其漢學研究中，亦不重視漢文口語教學。如當時的慕尼黑大學，擔任漢學系主任的 E. Hänisch 認為漢文屬於古文字學，因此不需要去學習這種古文字。⁸³ 而西德維持著純古典漢學研究的另一個原因，乃由於當時來自「紅色中國」的文獻多是些具有宣傳性質的文章，導致學者認為這類文章不具研究價值。⁸⁴

在 70 年代以前，西德對中國的印象仍停留在神話般的烏托

⁸¹ 請見魏思齊，2006。「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世界漢學**，第 1 期，頁 41-42。

⁸² 請見屈漢斯，「1968 年的抗議運動、毛澤東思想和西德漢學」，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332-333。

⁸³ 請見魏思齊，2006。「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世界漢學**，第 1 期，頁 42。

⁸⁴ 請見屈漢斯，「1968 年的抗議運動、毛澤東思想和西德漢學」，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332。

邦社會。在當時冷戰對立的氛圍中，當局者不願對中國有太多地著墨，對於中國的形象不是以神話代之，就是將其妖魔化。對於當時西德以研究中國為主題的博士論文中，其中有 78 篇是研究 1840 以前的中國、25 篇是研究 1840-1949 年之間的中國，僅有 22 篇是研究當代中國。⁸⁵ 而這種維持古典漢學研究的情形，一直到 1968 年出現了變化。

西德在 1968 年爆發了一場學生運動，這場運動最初是發生在 1966 年，由柏林自由大學一群學生組織而成。他們深受左翼勢力影響，主要是想表達對於教育政策的不滿、聲明反對越戰以及提倡改善第三世界國家生活的立場。他們首先在慕尼黑與法蘭克福發起行動，表達反美與反越戰立場。接著又在 1967 年 5 月 8 日，也就是德國二戰投降協定週年的前一天，示威衝突越演越烈。近百名示威者在慕尼黑美國總領事館前，突破警方設在領事館前的封鎖線，高掛越共旗幟及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照片，此外還以雞蛋、石頭等物丟擲警察，並焚燒代表美國總統詹森的稻草人。兩週之後的 6 月 2 日一名抗議伊朗國王訪問德國的示威者 Benno Ohnesorg 被警方槍擊死亡，這個事件使得學生抗議衝突更加激烈，而抗議衝突到了 1968 年達到高峰。在這一系列的學生運動中，主要是由「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SDS)」所主導，這些參加 SDS 的學生都是受高等教育，而且他們提倡社會主義。⁸⁶

⁸⁵ Ibid, p. 333.

⁸⁶ See Milan Petrovlj, 2007, "Students Movement of 1968-Unfinished Revolution", *Law and Politics*, vol. 5, no. 1, pp. 9-11.

學生們認為自己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反對官僚與西方威權，他們也把其信念帶進大學的改革中。1968 年的學生運動是一種近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不僅學生，許多漢學家也受到影響，他們開始反省大學的傳統漢學教育，他們認為漢學應該是新的社會科學專業領域，⁸⁷ 古代漢語及漢字教學已經不符合學生興趣與需求，屬左派的 SDS 開始在大學中「解放」傳統漢學研究。在柏林自由大學的課程陸續出現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批判等，當代中國議題開始成了教授重點，新式漢語培訓或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言，取代古代漢語，包括台灣式漢語。從此大學開始學習新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導向），古代漢語的培訓就此勢弱，甚至消失在當時的「解放」潮流裡。⁸⁸

雖然學生運動在 1979 年隨著其領導人 Rudi Dutschke 被暗殺身亡，以及之後訴求的目標過於空泛，導致這場學生運動逐漸平息下來，然而 1968 年的學運可說是推進西德漢學研究的轉捩點。隨著 1970 年代末中國的變革與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成了西方國家的潛在市場。在廣大利益誘因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為西德中國學研究的一項新議題，⁸⁹ 甚至掀起另一股「中國熱」，學習中國學的學生也達到一波高峰。

⁸⁷ 請見屈漢斯，「1968 年的抗議運動、毛澤東思想和西德漢學」，載於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頁 332-333。

⁸⁸ Ibid, pp. 335-336.

⁸⁹ Ibid.

第四節 現代漢學時期

雖然具有學術專業性質的漢學研究存在德國已有百年之久，但是歷經中國歷史變遷，在 20 世紀前半世紀才出現的當代中國學，經過冷戰時期明確地分流，時至今日已與傳統漢學有了明顯的分界，並且在 21 世紀中國崛起的同時，當代中國學研究的發展顯然已經超過傳統漢學，在德國地位顯得更加重要，許多相關研究與教學在學術研究機構裡佔有極大的比重。直至今日，在德國幾個主要研究當代中國學的重鎮有柏林自由大學、波鴻大學 (Ruhr-Universität Bochum)、科隆大學、杜伊斯堡埃森大學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漢堡大學 (Universität Hamburg)、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特里爾大學 (Universität Trier)、杜賓根大學 (Eberhard-Karls-Universität Tübingen)、哥廷根大學 (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第一項 當代中國學學者

早期的學者 Wolfgang Klenner 有極豐富關於中國的著作，其研究最主要在於中國對外經濟與貿易關係，並以他多年對中國的認識以及強健的理論支撐其論述。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在國際上聲名遠播，這是因為他的著作只在德國出版。而這種問題也出現在新一代學者身上，近半數在「漢堡亞洲研究機構」(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IFA)的成員也面臨到相同的問題。因為語言的隔閡，

使得許多優良的著作難以傳播到世界。⁹⁰ 但是有兩位 IFA 成員，在中國經濟研究上，能夠以流利的英文寫作，他們就是 Margot Schüller 和 Heike Holbig。Schüller 是一位經濟學者，他善用中文的資料來作研究。他的研究範圍很廣，但是近幾年他專注於研究中國經濟在國際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⁹¹

Holbig 的研究跨中國經濟與政治議題，最近致力於研究中國經濟私人領域的發展，特別是與中國共產黨員有關的部分。探討黨員結構的改變，聚焦在允許資本家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部分以及中國改變其社會經濟的情況下，中國如何加強黨的領導力的問題上。⁹²

其他學者像 Sebastian Heilmann 是政治學家，他的著作只以德文呈現，他最近的文章都是經由分析政府在財政上的干預與任用親信（Cronyism）的影響，探討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結構之衝擊。⁹³ 還有像 Thomas Scharping 最近的著作對於現代中國研究貢獻極大，他專注於中國人口議題與社會經濟發展。他近期的研究是關於中國的家庭計畫，其中包括生產控制、性別比例不均等。近期關於中國人口研究的出版物很多，其中大部分就是由 Scharping 所著，其中國人口研究的專書對於現代中國研究有極大地貢獻。⁹⁴ 而另一位學者 Karl Gottfried Kindermann

⁹⁰ See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and Seichiro Takagi, 2007.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Y.: Routledge, p. 29.

⁹¹ Ibid.

⁹² Ibid.

⁹³ Ibid, p. 30.

⁹⁴ Ibid.

則專精於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以及民主政治之研究。⁹⁵

第二項 當代中國學之研究機構

德國在中國與台灣的政治研究組織上有仔細的分權。在德國，有兩個主要的研究中心，著重於研究亞洲政治學領域：一、漢堡的亞洲事務研究所，二、杜伊斯堡的東亞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國政治的大學有柏林自由大學、科隆大學、海德堡大學、慕尼黑大學、杜賓根大學，而這些研究中國政治學的學者都是由政治學以及比較政治學系中所獨立出來。⁹⁶

由聯邦政府所資助的漢堡亞洲事務研究所，提供了德國學界多位鑽研於中國研究的專家。這個研究所由 Günter Schucher 帶領，其中還包括著名的中國學專家 Margot Schüller 與 Hans-Wilm Schütte，Günter Schucher 與 Margot Schüller 特別專注於兩岸社會與經濟整合的研究上。亞洲事務研究所在德國出版了一本月刊名為《當代中國 (China Aktuell)》的英文月刊，內容主要說明最新的領導關係與制度的改變。此月刊的文章不僅提供中國的政治、制度、法律與社會發展上的完善分析，還包含了對台灣、香港與澳門的相關分析。但是，漢堡亞洲事務研究所的出版品，大部分還是以德文出版，只有少數文章以英文來發表。⁹⁷

⁹⁵ Ibid, p. 107.

⁹⁶ Ibid, p. 105.

⁹⁷ Ibid.

柏林自由大學有著悠久與完善的中國學歷史，其擁有兩個機構專職於現代中國學研究：

一、中國與東亞政治研究中心

在這個研究中心裡，著名的學者有 Werner Pfennig，他專精於東亞比較政治，其中包含中國司法與政治改革和兩岸關係。

二、東亞研究中的中國學研究所

其著名學者有中國歷史、中國家庭婦女關係專家-Mechthild Leutner，現代中國與台灣政治專家-Jens Damm。不僅如此，總理部下屬還主辦幾個主要的現代中國學的研究機構，像是「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的研究機構」（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⁹⁸

另一個重要的中國學研究之大學是科隆大學，兩位著名的教授 Thomas Scharping 與 Hermann Halbeisen 皆任教於此。Scharping 的專業在於研究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關係，但是在 90 年代中期以後，他特別研究中國的移民政策與出生控制政策。Halbeisen 則是擁有二十餘年對於台灣的研究經驗，是個台灣研究專家。另一位 Robert Heuser 則是德國在現代中國法律研究方面最優秀的專家之一，他也任教於科隆大學。⁹⁹

慕尼黑大學有四位研究中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學者，Peter Opitz、Karl Gottfried Kindermann、Franco Algeri 和 Saskia Hieber

⁹⁸ Ibid.

⁹⁹ Ibid, p. 107.

但是前兩位已經退休。後兩位年輕學者，其中 Algieri 的專業在於研究中歐關係，Hieber 則是中國軍事安全與能源政策專家。¹⁰⁰

杜賓根大學，著名的學者 Gunter Schubert 自 2003 年開始擔任德國的中國政治學研究主席，他的專業在於台灣政治與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地方選舉與民主化，他的寫作語言有英文與德文。他也是《亞洲》(Asien) 期刊的編輯之一，《亞洲》是德國在亞洲方面研究的主要期刊之一。¹⁰¹

海德堡大學著名的「中國學研究所」(Sinologisches Seminar) 在 2009 年以前由 Rudolph Wagner 所領導，Wagner 是一位研究傳統漢學的學者。其他著名學者還有 Thomas Kampen，專業在於中國政治研究。而 Gunter Schubert 也與這所大學有所合作。¹⁰²

在德國，與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對於台灣政治的研究，皆是在 80 年代台灣民主化之後，才引起眾學者的興趣。除了前面所述的幾位學者之外，在魯爾區的波鴻大學，其中國語言與文獻學系的 Henning Klöter，其專業不僅在歷史學上，他也發表了一些政治方面的文章。¹⁰³

此外在眾多大學中，值得注意的是「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東亞研究所」(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Institu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研究領域包含整個亞洲大陸阿富汗以東，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東南亞與南亞。在這個研究所中約有三十位專家，其中就包含多

¹⁰⁰ Ibid.

¹⁰¹ Ibid.

¹⁰² Ibid.

¹⁰³ Ibid, pp. 107-108.

位中國學專家。東亞研究所的出版品是屬於「研究報告」(Working Paper) 類型，並以顏色來區分其內容，分為四種顏色系列，綠色系列－國家內部研究、藍色與黑色系列－太平洋沿岸國家的經濟發展、橘色系列－在建立區域共同體之新進程的啓發中，東亞與東南亞政治之改革與民主化之課題。

王海就是隸屬於這個研究所著名的中國學專家。他在中國學這個領域的出版品能以德文、法文、英文與中文四種語言發表，他的研究特別著重於中國的私人企業、地方選舉、公民社會與政治系統以及少數民族彝族。其他還有 Claudia Derichs、Christian Göbel、Anja-Désirée Senz 也是隸屬該研究所之成員，Derichs 是日本問題專家，對於馬來西亞議題上更是多有著墨。而 Göbel 則是研究中國與台灣議題，特別是中國與台灣的公民社會問題以及台灣政治貪污與組織犯罪問題。Senz 的研究則在於中國少數民族與地方政治參與。¹⁰⁴

王海所領導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所，乃德國在當代中國學領域最專業的研究所，其教學主要著重於東亞（中國與日本）的理論與社會問題研究以及政治與經濟現象，使學生可以藉此真正了解當代現實的改變、還有東亞地區的挑戰以及對於歐洲發展的影響。此外，該研究所還特別著重於三種能力的培養：¹⁰⁵

¹⁰⁴ Ibid, p. 106.

¹⁰⁵ 請見 Universtät Duisburg Essen, “MA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Studies”,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12日。網址：<http://www.uni-due.de/~hy0382/?id=46>。

一、方法學技巧

加強學生在大學時所學之研究方法，使其可更深入研究分析東亞問題。

二、特殊區域性的發展

不但深化該學科知識，更擴展東亞跨學科知識，也就是以中國與日本為範本之研究。

三、發展語言能力

東亞語言（中文、日文）二擇一當作語言訓練。

學生必須將當代東亞研究的理論、方法、區域性及語言能力合而為一，寫作獨立的研究計畫與論文。此外，田野調查也是進行研究的重點之一，結合田野調查與教學是當代中國學教育中的一種創新。因此，該研究所目標在於培訓學生具備完備的語言能力與東亞知識，為未來從事更深的研究或高階政治工作作準備。此外，該研究所還定期出版「綠色系列」（Grüne Reihe）的研究報告，對德國當代中國學研究貢獻極大。¹⁰⁶

小 結

德國漢學發展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面貌。在早期漢學啓蒙時

¹⁰⁶ Ibid.

期，傳教士的中國研究，主要目的是爲了傳教，因此，還不能夠算是具有學術價值的漢學，最多僅是對於中國作一些深入的介紹以及翻譯一些中國經典，使歐洲人了解中國當時的情況與中國人的思想。到了殖民主義漢學時期，德國對於中國的研究在於因應帝國主義利益，此時期的漢學屬於實用漢學性質，以培訓漢語以及當代中國知識爲主，以利於帝國殖民地之擴張。而學者所作的漢學研究亦都是爲了擴張德意志帝國之利益，並且以歐洲中心觀點研究中國，希望能夠進而開發中國。雖然此時期的漢學爲實用而生，但是德國因此蒐集大量中國相關的書籍資料以及出版漢語相關學習書籍，這些資料爲德國日後具學術性質的漢學奠定基礎。

真正具學術性質的漢學研究則是出現在 20 世紀初期，而且在二戰之前的漢學皆屬於傳統漢學的範疇，直到二戰之後漢學才出現分流。在漢學大分流時期，將漢學明確地分成傳統漢學與當代中國學，使漢學有更明確的定義。迄今漢學發展也轉向以當代中國學爲主流，許多學者也以研究當代中國學而出名。如同過去傳教士與非教會學者一般，藉由研究中國文化經典，建構出反襯歐洲的古典中國意象。當代中國學學者則是藉由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少數民族議題等，建構出與歐洲可資比較的現代中國形象。

過去一代著名的德國學者都是以從事傳統漢學而出名，如鮑吾剛、馬漢茂、傅吾康，而且過去德國漢學界也都是以研究傳統漢學爲主。但是時至今日，從事當代中國學研究的成果表現比傳統漢學豐富，甚至在中國崛起之後，研究當代中國學成爲一種趨勢。在當代中國學領域中，王海與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從中國基

層（由下而上）觀察研究中國，並且比其他同期的學者更早進入中國作田野調查，並將田野調查結合教學。他認為只有進入中國實地作調查，才能真正了解時事，提供更豐富的資料與正確的資訊為自己研究作佐證。然而，其特殊之研究觀點與方法亦為當代中國學研究注入一股新血。

第三章 當代中國學時期一

王海（Thomas Heberer）之背景與思想養成¹⁰⁷

前 言

王海為一位道道地地的德國人，但是在其金髮碧眼外表下，內心卻是擁有著中國靈魂，除此之外，他還說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倘若不見其人，只聞其聲的話，會讓人誤以為他就是一位中國人。「王海」的德文原名為 Thomas Heberer，有人直譯原文成「托馬斯·海貝勒（或湯瑪斯·海貝勒）」。王海認為直譯原文名字不具特色，因此他想取一個道地的中文名字。「王海」一名的出現幾經波折，首先，他想以其姓「Heberer」中的第一個音節，取其音「海」，作為姓氏。但是，其中國友人告知，「海」為滿州貴族之姓氏。因此，其自認並非滿州人，更非貴族，故摒除了以「海」為姓氏的念頭，改以其夫人之姓——「王」為姓氏，此外，「海」有廣闊之義，故以「海」為名。因此，他喜歡人稱其中文名字「王海」。

¹⁰⁷ 本章節資料乃採自筆者 2009 年 10 月至德國探訪王海所整理之訪談資料，因此本章節主要是將訪談內容作分析整理。

王海雖然出生於西方國家，接受西方教育，但是他卻鮮少以西方觀點省視中國。相反之，其融入中國社會，真真切切的體驗中國生活，以中立角度研究中國，給予中國更客觀地闡述。然而，是何種成長背景引發其對中國的熱愛？是何種學習環境影響其研究中國之方式？此外，哪些人影響其思想養成？筆者將藉由對王海之訪談於本章作探討。

第一節 王海之成長背景與學習歷程

王海（Thomas Heberer）出生於 1947 年，出生地在聯邦德國黑森州（Hessen）的一個工業城市奧芬巴赫（Offenbach），自謙來自於一個平凡家庭，有兩位兄長以及一位姐姐，在四個孩子中王海排行最小。王海於 1958 年考進中學接受基礎教育。高中畢業後在選擇大學科系時，由於其父認為，讀法律對於未來工作上幫助較大，工作機會也較多，亦可擔任公職人員，便期待王海能在大學學習法律。於是王海於 1967 年高中畢業後，隨即應父親之期待進入法蘭克福大學就讀法律系。但是讀了三個學期以後，發現法律實在不符合自己的興趣，便在 1969 年時轉向學習社會人類學與哲學。然而，其父當時對王海的決定並不支持，認為念民族學一類的前途渺茫，未來就業困難。即使父親繼續強調念法律的重要性，並且仍希望王海未來能擔任公職人員、官員或是法官，仍堅持只有學法律才能把這些就業問題解決，不過，王海仍下定決心要學習社會人類學。

第一項 學習過程中之轉捩點

影響他轉向社會人類學其實源自於偶然。在某次與就讀法蘭克福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表弟聊天過程中，王海得知社會人類學之特別教學以及學習方式，¹⁰⁸ 因此感到極大興趣。於是在表弟的鼓勵下，並與社會人類學教授細談後，確定轉向學習社會人類學。同年，他又轉到哥廷根大學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繼續學習社會人類學、哲學以及政治學。於此同時，德國的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王海的幾位朋友在緬因茲大學 (University of Mainz) 組織了一個集體宿舍，因此為了參與這個活動，王海僅在哥廷根大學讀了一年便轉到緬因茲大學。到了緬因茲之後，王海與他的朋友們一同組織與教導當地的中學生和學徒工學習馬列主義響應學生運動，此外也繼續學習社會人類學。

王海認為學習社會人類學應該要選定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研究，且本來已選定印度作為研究對象，並在 1970 年的時候計畫到印度考察，但是礙於緬因茲大學沒有現代印度的資料，所以他便轉向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然而，緬因茲大學在當時並無漢學系，王海說到：

在緬因茲大學沒有漢學，就一個美國人教漢語，但他的漢語不怎麼樣。他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他在美國軍隊，

¹⁰⁸ 當時該研究所只有七個人，社會人類學教授告訴王海他們的教學方式是：「我們這很放鬆，有時候在教授家裡談學術方面的問題，喝喝葡萄酒作交流。另外還有百分之一的博士生在國外不回來，留在他們的部落。」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他們委託他學漢語，他的那個聲調不對，但是當時我不知道。不過我們覺得他的漢語不怎麼樣，所以我去海德堡大學。

由於緬因茲大學的漢語教學無法滿足王海對漢學的需求，因此王海於 1972 年離開了緬因茲，到了海德堡大學學習漢學。¹⁰⁹王海對海德堡的漢學教學的評價是較為保守，仍以傳統漢學為主，主要教授古代中國的哲學、文學、歷史為主。由於當時漢學在德國還未盛行，因此課堂中包含王海在內僅有兩名學生。而他們亦都是從緬因茲大學過來，所以其漢語聲調也都不太正確。在海德堡教授漢語的老師是一位老太太，她不但沒有改變他們的聲調，反而取笑他們，使得王海及其同學感到失望，不過也因此使他們發奮圖強努力自學漢語。他們自己從香港訂教材，努力自學漢語兩年。

王海僅在海德堡大學待了一年，便隨其博士導師轉到不萊梅大學（University of Bremen）寫博士論文，論文課題是關於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其中特別研究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方法。1977 年，王海從不萊梅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畢業以後，隨即加入西德共產聯盟，開始從事共產活動，另一方面計畫到中國工作，了解真正的中國情況，為日後研究作準備。

¹⁰⁹ 德國是近幾年才出現英國學制（BA 三年/MA 二年），但是當王海進入大學就讀時，德國沒有 BA 與 MA，僅有一種稱為「Magister」的學位，這是一種四年制的高等教育，其中較為出色的學生可以在 Magister 尚未畢業之前，直接攻讀 PhD 學位，而王海便是採取這種方式攻讀 PhD 學位。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表 3-1：王海成長紀事

1947	出生地於聯邦德國黑森州 (Hessen) 的一個工業城市奧芬巴赫 (Offenbach)
1958-1967	接受基礎教育
1967-1968	法蘭克福大學就讀法律系 (三個學期)
1969	轉向法蘭克福大學社會人類學系、哥廷根大學社會人類學系
1970	轉到緬因茲大學社會人類學系 (參與學運)
1972	海德堡大學漢學系
1973-1977	不萊梅大學完成博士學位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口述歷史整理

第二項 王海的博士論文與影響王海建構思想過程中的重要學者

王海的博士論文是屬於歷史進程方面，乃啓發於 Charles Bettelheim 的理論，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任教於 Sorbonne University in Paris 並擔任 Centre d'études des modes d'industrialisation 主任。在毛澤東群眾路線的概念影響之下，他發展出一個理論，也就是在特定國家中，發展中的革命黨角色，其群眾路線的重要作用。王海的論文便是從這個概念開始展開，並且驗證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群眾路線的發展。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清楚的學術議題，儘管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著手。時

至今日，或許會被質疑這種論文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深刻的影響，儘管如此，這在當時是一種潮流。其論文指導教授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不萊梅大學法律學教授，Manfred Hinz，他也是支持這個主題的一個左派。王海自認為這篇論文若以現在標準來看，是不具學術價值，而是一種意識形態 (ideology)，不過對於當時的他則認為這是很科學，因此也並不後悔曾寫過這類意識形態的論文。

在建構思想方面，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家 Theodor W. Adorno，是王海大學時期的老師，其批判思想對王海帶來重要影響，¹¹⁰ 包含日後在學運中對教育採取的批判行爲。其他影響的學者還包括英國歷史及政治學者，同時也是研究中國問題專家的 Roderick Macfarquhar；美國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 特別是其著作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曾將許多中文哲學作品翻譯成德文的翻譯家 Richard Wilhelm；中國文學家林語堂；在宗教批判方面專精的法國哲學家 Albert Camus；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 Karl August Wittfogel，他是共產黨員也是漢學家，1957年出版《東方專制主義：極權力量之比較研究》(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totaler Macht)，內容探討中國、俄國、印度、阿拉伯等國家各自特殊的水力文化，及因此所導致政權傾向獨裁，王海迄今仍對這樣的論點深感興趣，

¹¹⁰ 請見馬丁·杰著，鴻鈞譯，1990。阿多諾：法蘭克福學派宗師，台北：結構群發行，萬里書攤總經銷。和 Martin Jay,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32-1950*, London: Heinemann.

也多次為他寫書評。此外，Pierre Bourdieu 在方法論之觀點，對於王海在分析問題時多有幫助，特別在其階級方面的論述。在王海的理解中，Bourdieu 的階級概念所指涉的，是一種領域，每個領域有四種資本，即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凡是在這四種資本方面比較接近的，就形成一個階級。這種論述與馬克思以及其他的階級觀點完全不一樣，但王海認為在分析某些階層階級時很實用，如：分析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企業家階層，其更進一步將此概念發展成戰略性群體的理論。¹¹¹

近年來，王海仍舊孜孜不倦的再增進知識，幾位他認為對自己在知識上的提昇有極大效益的學者還有 Jean Baudrillard 怎麼看宣傳工具的影響，以及 Michel Foucault 提出之關於政府或國家如何控制和影響個人及群體思維的分析，稱之為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並認為這是一種更深層的治理工具 (tool of government)，後者這個觀點使王海深感啟發。王海又提到 Amitai Etzioni 的社群主義 (communitarism)，認為這是屬於民主國家的社群主義，而王海在分析社區的時候受到他的影響，而將中國大陸歸類為權威性的社群主義，藉以說明一種型態迥異的自上而下的社群主義。至於 J.S. Migdal 關於國家理論的論述，西班牙的

¹¹¹ 「戰略性群體」：一群人經由一個共同利益的維持或擴展其『取得』 (acquisition) 的共享機會而連結在一起，此處所指的『取得』並不只是物質品，還包括了非物質因素，如：權力與聲望。該群體成員有一個共同的共享、長期的計畫以及適當戰略行為，並且視自我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角色。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3.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as Strategic Player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1, p. 71.

政治學家 J.J. Linz 分析權威主義與集權主義的不同等等，讓王海體會到現代化可以帶來內涵不同的現代性。James Scott 的著作，《軟弱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以及其初始的研究《農民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s*）對於王海在中國農村地區的研究有極大的影響。Samuel Eisenstadt 造就王海對於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理解。Norbert Elias 則是使其了解文明發展（*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的概念。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Vaclav Havel 的著作《活在真理》（*Living in Truth*），其說明知識分子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之下應該以何種方式思考及行動，這些見解使王海感到大開眼界。此外，中國學者與政治家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與毛澤東的著作也充實了王海對於政治以及政治思想的理解，特別是在中國方面。

這些學者或作家對於王海的影響，有的在方法論上，有的是理論分析上，其領域不僅侷限同一學科，可見王海涉獵之廣，與他轉學轉科系一樣，追逐興趣，毫無拘束。不過，他自述尤其喜愛閱讀哲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等領域。王海指出，單純僅閱讀政治學是不足的，因為政治學沒有自己的方法論，其方法論是一般性社會學的方法論；然而，社會學、社會人類學以及哲學的方法論各有不同，他經常從哲學方面書籍得到不少啟發。

第三項 1968 年學運之因素

影響王海的除了上述諸多學者外，1968 年的學運也是影響王海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法蘭克福大學位於德國中部，學運發

生之初，除了柏林以外，法蘭克福的活動也很多。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 Horkheimer、Adorno 以及 Marcuse、Habermas 當時亦都在此，兩位亦是二次大戰以後才從美國回到德國。他們提出德國應該施行社會主義，在法蘭克福影響力極大。之後學生們開始在德國進行類似革命的學生運動，王海當時也是 Adorno 的學生之一。Adorno 在學生運動爆發之後不久的 1969 年去世，學生運動並未因此停歇，反而在法蘭克福如火如荼的展開。

王海主動參與學運工作最初是在哥廷根大學。當時王海與在社會人類學的老師組成自己的學生組織，研究社會人類學的歷史以及他們認定為有問題的歷史，他們循著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主義對歷史提出質疑，王海回憶：

我們質疑 19 世紀還有 20 世紀初期很多那個德國的社會人類學家他們的這個殖民主義的觀點，我們批評這個，另外一個方面還有他們的帝國主義。

他們所作的工作還有研究與批判某些著作如 Wittfogel 所寫的《東方專制主義》。之後王海和同學們開始批判自己的教授，王海自述：

他（教授）有一個講座，關於那個塔斯馬利亞海島，他介紹塔斯馬利亞人的社會情況。我們問他為什麼沒有說塔斯馬尼亞人已經在一百多年前被幹掉了？

隨著運動開展，王海與同學們對教學上的不滿逐漸上升，之後更與同學們將研究所分割，一部分給學生，則教授不進去，另一部分給教授們，而學生也不允許進去。演變而來的是，所上沒

有教授們上的課，只有學生們自己的課。逐漸地，王海認為這種上課方式不具意義，便離開哥廷根大學，轉到緬因茲大學。學運在緬因茲大學也有活動，學生組織整個社會人類學系從事學運相關活動，而王海的活動主要在校外，以集體宿舍之方式，組織學生和學徒工，從事大學外的政治活動。德國學生運動到後來分成幾個部分，有一部分是配合社會民主黨要長期進行政治活動，另一部分是依靠蘇聯的德國共產黨，再一部分是佔少數的恐怖份子，最後一部分則靠攏中國。

王海參與學運之初，對於許多事還不甚了解，通常都是跟著幾位學校前輩進行，王海回憶：

當時我剛開學的時候，有的是學了四五年，當然有影響，因為他們都是已經了解，而我不是特別了解。當然在我前面的一些同學，我向他們學習不少東西。

王海回憶與前輩在法蘭克福、哥廷根、緬因茲大學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以自己的基礎理論，分析歷史。其中，列寧的帝國主義一書對王海在國際關係方面的影響較大，王海從書中的左派理論方面了解到不少東西，並且在 1968 年開始的學運中落實其左派思想。

第四項 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王海

王海認為共產黨的思維已經成爲一個封閉式的極端思想，如此「頭腦裡便會出現一座天秤，衡量出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

這種二分法是王海在參加共產黨之時，在適應上最大的困難。若是以共產黨思維方式，當分析結果 A 符合馬列主義思維，B 不符合，就只能說 A 是對的，B 是錯的。王海批評，「以這樣方法挑選社會分析的因素會造成偏見，也是共產黨意識型態最大的問題。」王海的思想已非共產黨這種過於極端的思維，對於現在的王海而言，自認是一個先進的公共知識分子 (Progressive Public Intellectual)。不過他認為參加共產黨亦有其益處，起碼在分析社會問題時，在共產黨時的經歷讓他獲益良多。

在國際關係理論分析上，王海認為有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比如對資本主義之分析已不符合實際。現在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發展過程中亦有變化，因此照搬馬克思主義不一定能完全解釋和分析資本主義。

王海參加學生運動的時候，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發展模式。但是經過許多歷練後，王海幾十年來去過許多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俄國、波瀾等前共產國家，他們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對其無吸引力。但是到中國的時候，其發現中國通過文化大革命似乎找到一條不同的路線，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看似較為良好。日後王海在中國工作一段時間過後，又發現中國也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社會。他開始認為最好先透過歷史，分析中國 19 世紀、20 世紀的發展，且不一定要以馬列主義作分析。簡言之，他已經不再認為馬列主義是特別重要的一環，中國主要還是受到歷史要素的影響較大。

經過多年的歷練後，共產馬列主義儘管在部分方法論上仍然管用，顯然無法充分解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王海而言，身為一

個先進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公共事務必須具有批判性，不僅如此，在政治與社會發展上亦採取這種批判態度。其亦強調，學者並非只待在象牙塔裡，僅熱衷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其仍必須關心政治與社會發展上之議題，這是做為一個學者對於政治社會展現良知的一種方式。

第二節 王海的中國經驗

中國意象最初出現在王海腦中，源自於其幼年時期母親之贈書，此因素對其有極大影響，王海自述：

在我小的時候，我母親送給我很多的地理方面的一些書。一個叫做 Karl May 的德國人，19 世紀的時候寫了六十多本書，都是關於到國外去的旅遊冒險。但這些都不是他自己虛構的。他在德國很有名……以後我看一看哪個地區我比較感興趣，在當時還是小孩的時候我覺得，對東亞洲、中國這些地方興趣最多。到了青年時期，我有很強烈的慾望想要去了解他者 (the Other)，並且藉由他者來更加了解我所身處的社會以及自我……

此次與中國的邂逅對其影響極大，並衍伸至未來就學與就業中。然而王海一直到了 1975 年，才隨著學校旅遊團首次到中國進行真正的認識。當時中國正處文化大革命期間，批林批孔喊得震天響，而且外國人甚少。當時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不多，所以凡是中國方面對訪客所作的介紹，他們都認為正確，但是實際的了

解非常有限。因此王海建議，研究者唯有到中國待一段時間後，才能真正體驗了解中國。其本人在 1975 年旅遊回國後，隨即聯絡中國駐波昂 (Bonn) 大使館，討論前往中國工作一事。

第一項 中國初體驗

在 1977 年畢業後，王海仍未收到中國大使館的回覆。他便再寫信給大使館，表達前往中國之強烈意願，此次終於獲得中國大使館之回覆，館方告知他中國現在的生活環境不比德國，在中國沒有足夠的夜生活、多樣的食物，工作量也很大。不過由於王海積極的求知慾望，因此披荆斬棘的到了中國。1977 年 6 月，王海前往北京，在北京週報以外國專家身分任職。到了中國以後，果然發現新中國和過去在書面資料上的中國全然不同，實際的情況與自己過去所了解的中國頗不一樣，令他感到驚訝，亦更加確定他所作的決定是正確。

在中國期間，王海以及其他外國人共約六百多人被限制居住在北京的友誼賓館，其中一大批人是各國的革命與左派份子，有印尼共產黨、馬來西亞共產黨主席等。工作上約有三十多個中國人在北京週報德文辦公室中，但與這些中國同事談中國社會問題是一種禁忌，因此王海在辦公室中除了工作以外，無法藉著與中國同事聊天得知太多或談論太多中國的情況，感到工作平淡無奇。他回憶工作條件很差，辦公室僅有冬季 11 月份至隔年 2 月提供暖氣。不過比起中國人，外國人的待遇畢竟比較好，薪資更

是中國人的十倍之多。¹¹² 王海還記得在中國的生活甚是無趣，尤其晚上的北京更是靜得可怕，連家餐館也沒有。日復一日如此無趣的工作與生活後，王海萌生回國的想法。但是他最後仍如年輕時追逐興趣那樣執著，爲了想要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再繼續留下。

這種情況到了 1978 年，鄧小平受平反後出現了轉折，外國人在中國所受的限制突然有所放寬。原因在於周恩來一篇談話被重新發表，周在談話中表示：「百分之九十的外國專家都是好人。」反映的政策變化，使得外國人在中國受到極度限制的情況有了改善。此後，包括友誼賓館的管制也變得較爲彈性，本來不允許中國人進入的限制被取消，¹¹³ 從此王海便得到許多與中國人交流的機會，特別是與工人、藝術家，並藉由彼此資訊交流了解雙方國家情況。

王海在中國這段期間，1978、79 年的變化最大。因爲友誼賓館的解禁，王海在每個週末關於德國的報告中認識了他的夫人——「王靜」。從交往到結婚的過程中，讓王海了解到當時中國的官僚以及凡事都要「關係」的文化。王海在中國待了四年直到 1981 年才離開，與夫人共同返回德國。

¹¹² 王海說到：「因為我們也不好意思，每次領導到辦公室來給那些中國同事四十塊錢，給我們五百，我感到不好意思。」當時中國人的工資每個月只有 40 元人民幣，但是外國人有 500 元人民幣，王海跟他的同事都拒絕這種差別待遇，因此他們向領導階層要求一視同仁，他們也要領 40 元。不過後來受到領導的反對，領導告訴他們甚麼人該領多少都是有規定的，況且外國人住在友誼賓館裡開銷大。聽了領導的解釋之後，王海與其同事也就不反對了。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¹¹³ 雖然禁止中國人進入友誼賓館的限制取消了，不過進入仍是要登記，如果同一個中國人進入友誼賓館三次，館方便會通知該中國人之單位，有關單位便會約談此人。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第二項 專業上之經驗

1981 年回到德國以後，王海隨即接到一個新研究課題，關於四川涼山少數民族發展政治的研究，於是甫回國的王海，再度前往中國四川涼山地區進行兩個月的研究。¹¹⁴ 直到 9 月份才回到德國，並著手撰寫一本關於少數民族政治與民族地區發展政治之書。返國的一年間，王海見旅德華人受到暴力威脅的事件層出不窮，他便為德國聯邦警察局 (German Federal Criminal Office) 以及多個德國法庭擔任口譯員與翻譯。¹¹⁵ 從 1983 年到 85 年，王海在不萊梅海外博物館亦可稱為民族博物館成立中國館，管理許多明清時期及清代以後的歷史文物。不過，該中國館由於沒有中國方面的機構或單位參加，令他感到失望，並且認為這稱不上中國館，因此其任職兩年後便隨即離職。

由於德國的教育體制要求必須通過教授論文才能有資格擔任教授，¹¹⁶ 於是在 1986 年，王海到不萊梅大學進行教授論文的寫

¹¹⁴ 這是王海離開中國以前，當時其單位北京周報通過國家民委的批准，所以王海可以立即到四川涼山作研究。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¹¹⁵ 因為當時有一個台灣的餐館老闆，被黑社會勒索並且暴力相向。王海說到：「因為這個台灣人不懂德語，所以請他當他們的翻譯，一起到警局去報案。警局說這樣的情況在最近在德國很頻繁，已經有六十多個人受害。他們找我當翻譯，所以我大概有一年搞這個工作，到各個地方去給他們翻譯。」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¹¹⁶ 德國這個教授資格考試稱為「habilitation」，這是一個像博士論文一樣，但是水準必須更高。通過之後擔任講師，不是教授，因此也必須要教書。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作，其課題關於中國個體經濟，而教授論文之導師，乃地理學家 Wolfgang Taubmann。爲了撰寫教授論文，王海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中國六個城市考察，以理解各個階層的個體經濟，通過挨家挨戶訪問個體戶，受訪者總共有一千五百多戶，共計三千多人。他還在同年採訪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藉此了解黨中央對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之看法。近年來研究胡耀邦的大陸學者發現，在中國難以搜尋到當年胡耀邦在個體經濟與私營企業方面之觀點。¹¹⁷ 因此，當年的採訪提供大陸學者在研究胡耀邦方面許多珍貴資料。在對於個體戶的追蹤研究中，王海在 1987 年再度回到那六個城市作追蹤，了解一年內有何變化，並完成教授論文。

1988 年到 91 年，王海到杜伊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Duisburg）擔任代理教授，教授政治學。1991 年，不萊梅科技大學設立一項新學科「經濟漢學」，王海被任命爲中國經濟學教授，在此任職一年半。1992 年轉任職於特里爾大學（University of Trier）政治學東亞政治教授，並在 1993 年搬到特里爾居住，在特里爾大學待了六年多。但是由於在特里爾大學沒有較具規模的東亞研究所，因此在 1998 年，王海轉回到杜伊斯堡大學任職東亞政治教授。

杜伊斯堡大學是德國大學當中關於現代東亞方面最大的研究

¹¹⁷ 王海自述：「去年有一個大陸的胡耀邦研究所，他的兒子是名譽所長，他們找我跟我說 86 年我採訪的內容在國內找不到，要我發給他們。他們今年 3 月份邀請我過去一下，他的兒子在問他的父親對於個體經濟有甚麼觀點，他說這個資料在國內沒有，要我跟他們講一講。他們很高興現在了解他，他支持私營企業和那個個體經濟。」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所，在此沒有漢學，僅專注於東亞經濟、中國經濟、日本經濟和東亞政治學、東亞社會學和東亞語言社會學，這種教學條件正符合王海之需求。於是王海自 1998 年之後一直任職迄今。

第三項 課題研究上之實踐

獲得教授資格後，王海在 1993 年到 94 年同一位不萊梅大學地理學教授合作，費時六個月在中國七個省考察八個鄉鎮，所研究的範圍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教育與財政，這個課題專書於 1998 年並以德文出版，接著發表英文版本。在 1996 年到 97 年進行另一個關於私營企業家的社會和政治作用的課題，王海以社會學方面戰略性的戰略群體理論，分析越南和中國企業家的問題。爲了這項研究，其在中國三個省進行田野調查，最後該研究同時發表成德文版本以及中英文版本，但是中文版本僅載有中國部分。

1999 年到 2002 年的主要研究課題，乃關於知識分子之概念如何轉換成政治，其範圍涵蓋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越南和日本，於是王海在中國北京和上海採訪約六十多位知識分子。這個課題以德、英文出版。同時期還有另一個大課題乃關於四川涼山彝族企業家，一并在十個縣作田野調查。

其後於 2003 年到 04 年和人民大學合作一個課題關於基層選舉，對該課題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分成兩組，一組在農村、一組在城市。王海負責城市組，在中國深圳、瀋陽、重慶三個地方，費時四個月進行田野調查，主要以這三個城市爲樣本，調查不同的

地方社區其選舉行為的影響，考察結果很快就發現居民對選舉不感興趣，此課題可說是王海運用社會學理論對社群之作用進行分析與研究。這個課題以德、英文出版。

2008 到 09 年則和杜賓根大學 Gunter Schubert 教授合作，研究關於農村縣和鄉鎮幹部之作用，在方法上仍是採取戰略群體的理論，並對地方幹部的作用進行分析，具體是通過一個特定的政治領域，分析幹部有何表現與舉止。

王海在研究課題上展現了對中國的熱愛，並非僅是紙上談兵的社會主義空談，而是深入當地作田野調查，以訪談方式體會中國百姓的遭遇與情感，並蒐集數據再作深入分析，藉以呈現中國各階層之面貌。

第四項 踏入少數民族世界

王海之專長在於社會人類學，因此對於少數民族特別感興趣，某次他在北京服務單位圖書館翻找相關資料，雖然資料甚少，不過他仍歸納出幾個感興趣的少數民族，其中有彝族、佤族以及景頗族，王海回憶：

我偶然在圖書館找到一本 50 年代書，是一個英國的記者他寫的，他 57 和 58 年去四川和雲南三個地方，四川涼山，還有佤族和景頗族的地方。看過這本書以後，我覺得我特別的感興趣……然後我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我通過我的單位跟他們聯繫說，我要採訪兩個彝族、兩個景頗族、兩個佤族。他說沒有景頗族，只有兩個彝族、

一個佤族。然後我覺得彝族的故事最有意思，然後我決定去四川涼山，到那邊去考察。因為當時佤族和景頗族是在緬甸的邊界，他們說不好安排。所以涼山不在邊界，比較好安排，所以也是比較偶然的。

這個偶然，使王海首次進入到少數民族的世界，他特別對彝族區感到興趣。他發現從 50 年代以來，似乎沒有外人去過當地，遑論是作田野調查，加上當時尚未完全開放，因此當地大部分的居民沒有見過外國人。王海從資料中得知，當地還保留著薩滿教，不過中國官方不願面對這項現實。王海仍是提出要求採訪薩滿教，遭到中國方面陪同與翻譯的拒絕，¹¹⁸ 不過他一如既往仍堅決採訪，後來中方勉強答應，安排兩位薩滿參與採訪。幾年後，當地封閉的情況逐漸出現變化。過去不能談的薩滿問題，隨著中國開放，還衍生出薩滿協會，其他還包括薩滿旅遊、薩滿舞蹈等。

1981 年，王海在研究彝族回國後，因為工作關係以及準備教授論文寫作，王海暫時中斷彝族之研究，直到 1994 年才重拾研究。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Steven Harrell 邀請王海參加 1995 年舉辦的首屆國際彝學研討會，由於國外研究彝學的專家很少，大概僅有四、五個外國人，故該領域仍是以中國大陸學者居多，而且大部分是彝族人。

首屆彝學研討會圓滿落幕後，王海提議每兩三年舉辦一個這類型的國際研討會。爾後，王海在 1998 年擔任主辦人於特里爾

¹¹⁸ 當時中方人員見王海與中國籍夫人說：「如果你是中國的朋友，就不要提出這個問題。」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大學舉辦第二屆國際彝學研討會，與會學者有三十多位。在此次研討會中，兩位彝族學者有意與王海共同研究涼山彝族在關於私營企業家部分的課題，王海同意後，隨即向大眾基金會（Volkswagen Foundation）申請經費，由中方得到汽車、電腦等設備，以及所有考察的費用。此課題從 1999 年進行到 2002 年，一共在十個縣作田野調查，王海認為這個研究課題是研究生涯中最費時費力的一次，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飲酒文化，如果不喝酒當地單位就不合作。因此每到一個部門就得先喝酒，否則拿不到該單位提供的數據，這樣的研究遭遇使王海感到特別辛苦。這個研究課題沒有德文版本，僅有中、英文版本。國際彝學研討會繼王海舉辦之後，接著又在 2000 年於石林縣彝族自治縣舉辦其第三屆，然後 2005 年在美姑縣舉辦第四屆國際研討會，而第四屆之規模最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海進行研究彝族的課題當中，美姑縣當地提出希望王海可以到德國募集經費籌辦民族學校，王海確實目睹當地學校無論在教學或是環境上顯得困窘，老師教學及學童們的學習的情況都相當惡劣。因此王海在德國籌集二十五萬馬克，用這一筆不小的數目在美姑縣籌辦了一個希望小學，但事後判斷可能有一部分被貪污了，令王海感到失望，導致其日後不再作慈善辦學之事。這些因素也影響了王海於日後的研究，王海有部分文章是在探討中國貪污腐敗問題，特別是在地方幹部的部分。

第三節 研究議程之產生

王海式的中國學研究方法進一步的影響了德國其他中國學、東亞政治和漢學的一些學者，王海特別提到 Gunter Schubert 為其中之一，他原來的研究沒有結合田野調查。但是，王海認為如果真正想了解中國現代發展的情況，必須下鄉進行田野調查，不然無法完全掌握實際情形，而且若田野調查不能只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為這些地區與西部的情況差異極大，很多學者只到中國的北京、上海進行一個星期田野調查，這明顯不足。王海認為必須到最貧困的地方去，而且不要只待一天，而是待幾個星期，慢慢地便了解中國真正的情況。王海的這一個哲學也間接影響到 Gunter Schubert，此後 Schubert 常找王海合作，一起到農村去做田野調查。¹¹⁹

第一項 王海在中國學上之研究方法

王海自述其方法論是政治學社會學方法論，在一方面是定型和定量的。王海和所指導之學生所作的研究大部分必須結合田野調查，可以斷言，結合田野調查是王海在中國學研究上之特點。王海認為自己的田野調查又和一般學者的不太一樣，他觀察許多西方國家的專家或學者，獲得國內政府或機構經費後，所進行的

¹¹⁹ 引自王海訪談稿。

田野調查通常是到當地取得數據便離開，回國後再引用這些數據作分析。但是王海的調查方式不同，他必定親自下鄉到群體去作調查。加上王海的專業為社會人類學，原本社會人類學和民族學就有很多研究都要求下鄉調查，因此他兼採了人類學和民族學概念下鄉作調查。這些理論與經驗基礎，對於日後研究考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課題有極大幫助，使研究能夠更深入，王海認為這是自己與西方許多學者之田野調查不同處，好在他有豐富的田野經驗，調查起來也得心應手。

不過，王海曾經在涼山田野調查中遭遇問題，他以定型化問卷作調查的方式，合作的中方民族研究所在涼山沒有事先申請，所以這個課題沒有到達上級，亦沒有於公安局報備。因此當王海去統計局作調查時，統計局局長便通知安全局，安全局對王海一行人進行調查。因為在大陸有規定，問卷必須事先通過安全部批准才能發送。由於當時不知道這項規定，因此一行人被趕離當地，公安並介入調查、審查王海，給他帶來不少麻煩。經過這次事件後，王海決定不再使用問卷調查這類定型的方法論，而是改成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¹²⁰

王海除了結構性的訪談外，認識到單純採訪是不足的，因為不只是外國人，即使面對中國學者，地方幹部很多事情不會如實告知，所以產生很多非政治的政治問題。因此王海總是經由事先閱讀相關資料，另外再與學者作訪談，先建立基本了解。王海自述：

¹²⁰ 王海說明其結構性訪談，就是先在自己腦中整理出要問些甚麼，作出結構性的採訪，然後再分析問題。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這個關於地方幹部的作用，我偶然的找到一本書。關於縣地區的地方幹部的工作，這是鄭州大學一位女士寫的，他很詳細的介紹黨委書記怎麼回答，怎麼談他自己的情況，還有這個農村的賄選情況，都有很詳細的介紹一下。

對於一些非政治的一些情況，中國大陸很多學者早有比較詳細和具體的介紹，王海透過閱讀其他學者的先行研究，得知農村方面具體的經驗。¹²¹ 由於王海研究政治課題，有時候是民族的課題，在中國都很敏感。因此，平時王海不稱自己要進行「政治研究」，而是稱為「社會研究」。其通常先向訪談對象說明是為了解農村的發展，這種的表達方式地方幹部容易接受，但是，如果如實說明是研究地方幹部的表現和舉止，則會導致研究對象生疑而有所戒備，這樣一來所作訪談的真實性就會降低。

此外，王海將語言能力當作方法論之一，他認為作田野調查必須理解中文，如果外國人不懂中文，那麼就不可能了解真正情況。儘管有翻譯陪同，但是這些翻譯遇到較為敏感的問題不會如實翻譯或者乾脆不翻譯，當地翻譯常會自己考慮後只做有條件式的翻譯，因此，只有自己讀中文、懂中文才能避開這類問題。但實際操作上難免會遇到困難，比如到鄉下去常會遇到濃厚的口音，像是在浙江的農村，居民多使用方言。儘管懂中文，但是他

¹²¹ 王海說到：「比如貪污腐敗問題我查不出來，不過另外一個學者也查不出來，所以你要是有個人的關係的話，還是你的家鄉，這個資料就會不一樣。」但身為外國人的王海在這個方面就有侷限，必須透過與當地人的合作來解決。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們說地方話腔調極重，儘管有北京來的陪同也不一定聽的懂。面對此問題，王海只能透過地方的學者，他們會在談話中作紀錄整理後提供王海中文資料，幫助理解聽不懂的部分。

另一方面，下鄉作田野調查之前，事前的資料蒐集必須要先作好，事先理解大概的情況以及國家整體上在這方面有甚麼問題。王海說明：

……考察農村的選舉，如果你甚麼都不知道，你可能從農村回來會覺得沒有甚麼問題，非常好，都是很民主的。但是如果你看中國其他別的地方的資料，你更了解有甚麼問題。

比如在農村選舉方面，透過資料蒐集了解先行研究後，王海得到一個基本的概念是，農村選舉基本上是失敗的，舉例來說因為「賄選」因素，導致有些地方農民根本沒有興趣參加選舉。但是，進行這種研究要謹慎，以免誤觸中國政治問題的敏感神經，田野調查便可能因此受到阻礙。另一方面王海還說明，鄉下幹部即使是對於中國學者或其上級地方幹部，向來都只介紹理想的情況，因此必須通過自己觀察，加上事前的準備，就可以避免被蒙蔽，然後慢慢解讀有關問題。¹²²

¹²² 在 2009 年 2、3 月份時，王海進行了一個課題關於農村環保資歷。王海回憶：「……我們在一個縣裡，他們說沒有一個村莊有垃圾箱。我們說不能夠看一個，我們開車開了一個多小時，就去一個村落看一個垃圾箱。那如果每一個村都有的話，我們五分鐘就可以看到了。開一個小時，就在一個村有，別的村沒有。但是我們去的那個村還是一塌糊塗，垃圾在垃圾箱旁邊。」因此王海認為田野調查時要一方面作觀察，一方面作一些非正式的交流談話，一方面別的地方的資料也是很重要。引自王海的訪談內容。

王海常引述政治學者 Aaron Wildavsky 的一段話來告誡學生：「所有人必須去做的回答問題就是提問。」這也是其進行田野調查的一種方式。王海從扎根理論這個概念著手進行。也就是說在進到當地之前先提出一個基本的想法或者一個假設。然後收集資料以及整理訪談、分析這些材料，最後起草一個更詳盡的假設以及分析架構（理論）。「讓人們告訴我們，他們最關心甚麼」這個觀點對於田野調查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因此，王海認為田野調查就像釣魚，你不知道你會釣到哪種魚。

王海說到，在中國有目的的「送禮」文化不會用在外國人身上，不過對於當地的地陪，他會贈送小禮物或設宴款待表達感謝。對王海而言，送禮是為表達感謝之意，而非有求於人而送禮。此外，王海的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是，其堅決反對以金錢或禮物作為交換條件的訪談方式。王海說明地方在金錢上的索取，只會對中方安排工作的人索取，而不會對外國人，而且他也拒絕。王海說到：

我知道有些外國的學者採訪會給他們錢……但這個我拒絕。因為如果你給錢的話，以後不知道他們要說些甚麼來騙你。我搞社會人類學的時候，我的老師他說美國有一個在社會人類學很有名的一個印第安納部落，那個部落他們自己考量說明年有一個美國學者要來，他給我們那麼多錢，我們要怎麼跟他講，這就是在考慮他要聽甚麼，他們就要跟他說甚麼。

王海深知有了金錢誘因後，訪談將失去真實性，因此在其田野調查時，堅持拒絕這類的金錢往來，以維持樣本的有效性。

第二項 「關係」為方法

王海另一個作中國學研究的方法，就是建立與發展「關係」，他發現在中國大陸作研究，需要一個有權力的合作夥伴，僅找一個大學是不夠的，大學在本城裡面有些許權力，但到了城外就沒有，而且大學在全國也沒有權力安排或組織一項工作。王海在中國的合作夥伴主要是有權力的機構，他便與中國政治經濟研究中心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經常透過中心安排地點，他們都找自己有關係的地點，如果沒有這層關係，通常很難到地方去做研究。因此需要在中央有一個比較專業與具有權力的合作夥伴，也是方法論的一部分。

「關係」對於社區研究更是重要，王海在完成涼山的研究以後，認識了人民大學一位社會學的教授，王海觀察這位教授口才好關係也廣。當時王海透過這位教授的博士生以及其父母，自行聯繫下鄉作考察，下鄉研究如果有好的關係，有任何需求透過直接跟居民委員會聯絡，都能獲得安排。王海的田野調查通常會到當地待幾個星期，與地方的陪同或者是幹部慢慢交流，藉由吃飯、喝點酒培養關係，逐漸地發展信任感，爾後他們自然而然就會說明一些情況和事情。這種考察沒有通過官員安排，研究者完全是自由的。也因為和當地居民有良好的關係，透過這層關係，訪談對象就不會抱持心防，訪談的可靠性也就較高。

王海強調，發展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而「語言」是發展關係的工具之一，因為如果不懂中文的話，與中國人的感情便

不一樣，好比之間隔了一層，因此王海花許多時間學習不少成語。言談間夾雜成語使得與中國人感到更為親切，雙方的關係也更加親近。王海說到：

我從早以來學了不少成語……他們聽這個就會覺得，「唉，這外國人真了解中國」，這很有意思。以後真個信任就更好，就跟他交流，他們應該就知道應該了解你跟中國這方面很熟悉。

這次由於王海在中國的地陪是政治學博士，因此也了解關係的重要性。他向當地人介紹王海時，會強調說這個人也是共產黨，如此一來，對方就會覺得這也是我們的人，其信任度又更高了。促成採訪胡耀邦的因素之一，正是依靠發展關係，提高信任度而來。

第三項 研究資金來源

王海的研究經費大部分來自德國最大的基金會「德國研究基金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這個機構隸屬於國家。此外大眾基金會(Volkswagen Stiftung)也是經費來源之一，大眾基金會每個階段會有主要課題，比如當時有一個關於經濟學方面的課題，包括整個亞洲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企業家發展這類型的重點課題。通常課題並不限於某種專業領域學者，因此王海在大眾基金會通過申請到涼山進行彝族企業家研究，幫助王海完成其著名的《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與制度變遷的承載者》研究。

當王海到四川涼山地方少數民族研究所時，發現當地資源短缺，甚麼都沒有，更遑論有汽車作為代步工具。於是王海便向大眾基金會告知這種窘境，申請汽車以及所有設備與路費，這些項目大眾基金會全數提供，並且支持地方的研究所。至於中國方面所提供的經費，王海多不接受。王海認為如果中方提供經費，也會有所要求，往往這種要求不一定是學術方面，而屬於政治。到目前為止，德國研究基金會和大眾基金會對於在中國的研究中，中方人員所需路費、經費等，都能全部都提供。但是王海亦補充，這種情況以後可能改變，轉而要求中方人員出自己的路費和經費。

第四項 與德國官方之關係

由於王海不屬於德國任何一個政黨的黨員，因此與各黨的合作彈性較大。對於政策，王海也不吝嗇地提出意見，意見有時較為尖銳也無妨。王海舉了一個例子是 2007 年基督教民主黨在議會有一個聯邦議院黨團的亞洲戰略題綱（council paper），主張外交政策應有其價值觀，比如應多與日本和印度這類民主國家合作，並反對權威型的國家。王海很早便提反對意見，指這樣的外交政策對德國不利。王海認為如果爲了要刺激中國民主化，而故意只跟日本、印度合作，對德國在亞洲關係的發展不利。王海強烈地批評這項外交政策，而現在這個立場也已經取消了。

王海認為對於有疑問的政策就要勇於發表意見，這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任務與義務。但是王海亦坦承，有時其意見也不一定對，

但他仍不吝提出。這個事件發生以後，其州長派一個代表團到中國，州政府的辦公廳邀請王海參加此次代表團，顯示官方還是希望有專業知識的人能夠提供意見。

2009 年德國大選結束，聯合政府上台，其關於亞洲政策主要的結論為必須跟我們長期的夥伴，如中國、日本和印度合作，應該支持亞洲國家公民社會的參與發展，像這類良性發展之政策，王海便表示極為贊成與支持。而歐盟現在也有這個觀點，即應該協助在中國發展有利於公民社會的結構，王海認為這個概念應該受到支持。但是由於沒有具體實踐的措施，因此王海仍抱持懷疑的態度。王海認為，中國對政治參與的觀念，與歐洲、台灣的觀點具有差異性。中國觀點認為政治參與應該限制在由共產黨領導的參與，而不是自由的參與，雙方在觀念上的差異，使王海對這方面的合作仍是存疑。

小 結

王海的學生時代正處在聯邦德國學生運動動盪之時，除了學校老師的影響之外，亦經由同儕、前輩與自行閱讀，形成其左派思想。不過到現在，經過時間的歷練，王海的左派思想已經不同於極端的共產黨意識形態，他的左派思想已經轉型為研究工具之一，亦即作為建構研究議程的其中一支而已。

王海對中國並不只是盲目的熱愛，而是從各方面去實踐。不僅在職業選擇上，研究課題亦是實踐的結果，更以田野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深入中國，打入群體，了解當地。經由多年在中

國作研究之經驗，他更導出另一項重要研究方法，就是發展與建立「關係」。也因為有多年的中國經驗，對於中國甚為了解，一些敏感問題可以技巧性的發問，但是又不失其研究目的，並且深知「關係」在中國文化中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王海在中國的研究課題通常得以順利進行。

第四章 王海的中國意象

前言

王海善於以社會人類學及民族誌的研究方式探討中國。社會人類學強調以同等地位與價值的觀點，將「異文化」當成「本文化」來理解，並以「社會」的概念來組織分析整體。¹²³ 因此，社區與族群這類小型社會單位成了研究重點，而這種研究方式更容易深入了解與體會研究對象的世界，亦可避免受到主觀規範的制約，相對地開放接受本文化之外的事物與現象。¹²⁴ 王海在其研究中更落實民族誌方式，到研究對象之地區作長期生活，親身理解當地社區，並將其體驗與發現呈現在其研究中。因此，對於中國改革的研究便具有更客觀與多面向的探討。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盡然只是從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方式，反之，私營個體戶在其中扮演極重要之推手。王海認為，這種由下而上的推力，才是促使政府改革的主要原因。然中國之改革並不僅限於經濟改革，社會改革亦是改革進程中的一部分。其中，王海注意到了少數民族問題，其探討共產黨從 50 年代開始對少

¹²³ 請見王銘銘，1997。《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5。

¹²⁴ Ibid.

數民族區域(涼山彝族)進行社會改革,以及日後所進行的民族融合,對少數民族地區(涼山彝族)造成極大地衝擊。王海更是融合私營個體戶(企業家)戰略群體之觀點與少數民族,探討少數民族企業家對其傳統社會轉型之影響。

王海亦發現中國在改革進程中,面臨到如何持續改革又要維持政權合法性的困境。但是在這個困境中,反而藉由兩者的互動而逐漸建構出中國公民社會的雛形。王海結合了社會人類學與民族誌觀點,體現出中國改革的不同意象。本章節將王海著作歸納成三個面向:(一)作為原動力之企業家;(二)少數民族議題;(三)中國公民社會之建設;探討其著作中所體現的中國意象。

第一節 轉變中國－作為原動力之企業家

中國之改革有其進程,乃經濟改革之後,才有進一步社會與政治上的變革。改革的結果並非同前蘇聯國家一般,最終導致國家政體的崩潰,反之,王海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由下而上的方式,雖然導致社會急遽變化,但是並未造成體制上的崩盤。其中,民營化後所產生的新精英階級與新型企業家,扮演著至關重要之角色。在社會政治變革過程中,企業家之作用通常受到忽略,甚至認為這類個體在強調市場投資與利益最大化的總體機制中,並不會產生多大影響。¹²⁵ 但是,王海認為企業家的角色在改革進程

¹²⁵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3-4。

中乃具有更多元的性質，企業家不僅是經濟學所闡述的「一個具有創造性與獨立性的活躍經濟人（active homo economicus）」，企業家更是身處於各種社會關係環境之中，並於其中活動之行動者，因此企業家不單僅是獨立的單位，¹²⁶ 而是連繫著複雜網絡的行動者。

第一項 有限的逾矩行爲—私有化進程

王海認為由於中國農村的貧困情形，導致了私營企業的發展。早在 1970 年代改革開放之前，地下經濟（shadow-economy）已在貧困地區發展。然而，這些行爲並非合法，但是這些地下私營經濟卻有效暫緩中國農村的經濟壓力，因此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許。¹²⁷ 再加上中國政府於全國推行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¹²⁸ 使得國家組織逐漸退出農村，產生更多剩餘勞動力，然而這些勞動力人口沒有到城市工作的門路，因此只能轉向私營

¹²⁶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著，2001。「轉型社會中的企業家及其角色定位」，**制度經濟學**，第 3 期，頁 38。

¹²⁷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28-29。

¹²⁸ 70 年代由於農產品與日常所需用品供給短缺，農民自發性的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經營，這種行爲起初出現在貧困地區，後來發展至全國。國家領導階層意識到，此類家庭經營刺激了產出，較快改善城市供給情況，於是開始於全國實施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Household-Responsibility System）」，並且使得「農業改革」綱領被建立。請見托馬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頁 65。

經濟，如：小攤販、手工業等，藉以謀生，¹²⁹ 使得私營經濟愈來愈發達。此外，國營企業的無效率亦是肇因之一。王海認同 Walter Hamm 所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私有化的原因，包括：¹³⁰ 一、生產力的浪費性投入；二、適應能力與創新精神不足；三、缺乏競爭導致的惰性；四、企業領導人缺乏動力；五、私人競爭受阻；六、企業決策錯誤對整個經濟的影響；七、缺少能帶來營利的資本引導。不過王海認為對於中國這類社會主義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導致私有化還有其他特殊原因，即為：就業問題、供應問題與額外收入來源之需求。¹³¹ 而合法前的個體經營者逐漸的化解以上問題，成功為政府舒緩經濟壓力。

他指出，個體經營者（農民）為其利益，開始出現有限的逾矩行為。個體經營者體認到公開反抗政府的行為極具危險，因此其改採長期有限的逾矩行動戰略，以雇用人員為例，起初政府禁止雇用以工資為生的勞動力，於是個體經營者就雇用家族成員或親戚來迴避法律，但是卻讓雇用行為成爲一種事實。¹³² 逐漸地，政府放寬同意可以雇用一至兩名勞動者，而此時個體經營者就進一步地雇用三至五名，政府再同意雇用三至五名，個體經營者便再增加至五名以上，個體經營者之行為總是走在政策之前，如此一推一進，慢慢迫使政府做出退讓。王海說明：「政治制度面臨

¹²⁹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爲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29。

¹³⁰ Ibid, pp. 20-21.

¹³¹ Ibid, p. 21.

¹³² Ibid, p. 29.

著來自農民的要求和實際行動的雙重壓力，同時，大部分領導人已經認識到這種要求與行動的必然性和益處，並開始實施改革計畫。」¹³³ 最終更在 1988 年，中國國務院正式解除雇用限制，使私營企業開始蓬勃發展。¹³⁴ 然而，導致此結果之關鍵仍在於私營經濟所表現的豐碩成果，促使政府逐漸地作出適當退讓。

逾矩行為引發了一連串效應，然而，逾矩行為的出現，最先是為解決物資短缺的情況，爾後這種逾矩行為展現的成就，卻發揮其示範效應，逐漸導致這種行為的推廣。¹³⁵ 個體經營者的行為幫助政府化解物資短缺的窘境，並且創造就業機會，從而獲得政治領導人的肯定，而這些肯定激發更進一步的逾矩，王海說明，最終範圍不斷擴大，甚至擴展至其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領域之中，進而衍伸出漸進式自下而上的改革。¹³⁶

中國政府先在 1995 年肯定私營企業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力，接著在 1997 年將其解釋成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最終在 1999 年修訂憲法，認定個體與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受到國家保護。¹³⁷ 於是逾矩行為從

¹³³ Ibid.

¹³⁴ 請見 Thomas Heberer, 1999. "Entrepreneurs as a Social Actors: A Privat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DUISBURGER ARBEITSPAPIER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no. 21, p. 12.

¹³⁵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31。

¹³⁶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劉合光等譯，2004。「轉型國家的戰略群體與國家能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雙月刊)**》，第 1 期，頁 34。

¹³⁷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

原先被認定為非法，隨著其成就逐漸被政府法理化。

第二項 轉型動力－企業家之作用與特色

王海認為，企業家在中國社會轉型進程中之作用與角色不容忽視，每個階段亦因為其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比如，在 1970 至 80 年代改革初期，個體經營者乃屬自發性、無組織性的行動，進而影響國家行爲。但是，1980 年代末期以後，由個體經營者延伸而成的企業家形成有組織的企業家集團，改採取有質量的「新型戰略」(new form of strategy)，這種戰略屬於利益導向，並且進而更有效的促進政府結構與能力方面的變化。¹³⁸ 職是之故，王海認為企業家作為其中的行爲者，其社會角色與作用具有相當影響力。

80 年代末期以後的企業家之角色與過去又不相同，王海認為他們已經不是單純買賣商品的個體經營者（商人），企業家必須組織生產過程、繳交賦稅、創造就業機會，更特別的是，他們必須投入社會公益，以增進地方與政治地位。¹³⁹ 在此處之企業

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32-33。

¹³⁸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劉合光等譯，2004。「轉型國家的戰略群體與國家能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雙月刊)，第 1 期，頁 36。

¹³⁹ See Thomas Heberer, Timothy J. Glukman(trans.), 2009.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R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p. 53.

家已不單是獨立的個體，而是賦有更廣泛的公共職能，王海稱之為「非正式的社會承載者」（informal social bearer），¹⁴⁰ 其職能不僅限於經濟活動上，更承擔著重要的社會使命。王海認為西方企業通常處在勞資雙方以及供需兩造之間的合約網絡中，不同於此的是，東方企業之特色，在於更深陷於和其他企業以及官僚機構的網絡中，然而處在這種模式中的企業與非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互動具有更緊密的關聯性，並且亦會影響互動過程的變化。¹⁴¹

王海強調中國企業家謹守道德規範，這種觀念是西方企業所缺乏。古代中國儒家思想中，將追求金錢視為不道德的行為，在馬克思主義盛行中國期間亦是如此。但是經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出現已經轉變了這種觀念。王海指出，在年輕一代的觀念中，已經將獲得高收入作為人生重要目標。因此，現今對於道德觀念已經改變，而企業家金錢與道德之間的觀念亦受到轉變。¹⁴² 但是，道德依然存在，並未因轉變而消失，如多數企業家仍然不認同可以不擇手段的去獲取利益。¹⁴³ 然而，部分企業家認

¹⁴⁰ 非正式的原因乃地方政府並未了解龐大的私營企業實際上就是職能的承載者（bearers of function），其職能早已超出其經濟使命（economic tasks），他們同時承擔著重要的社會使命（social tasks）。Ibid。

¹⁴¹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47。

¹⁴² Ibid, p. 195.

¹⁴³ 在王海的調查中顯示 65%的人認為：「如果人們不觸犯法律，那麼採取任何賺錢手段都是正確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28%認為「部分正確」，僅有小部分的人認為「完全正確」，這證明人們在追求利益時不僅要注意法律，也應該考慮道德。Ibid, pp. 195-196。

為由於缺乏「法律安全」(legal security)與「公部門之專斷力」(arbitrary behavior)，迫使他們必須經由一些手段來建立關係，如：賄賂行為，亦對於幹部與公部門的這類腐敗行為感到困擾，¹⁴⁴ 這證明多數人儘管對於道德的重視，在行為上則頗有彈性。

王海所闡述之中國企業特色除了具備道德觀以外，對於「關係」的重視也是一大特色。此處的「關係」不僅意味著與政府或黨幹部之間的互動結果，「關係」同時意味著企業家對於社會之責任與義務，其中包括對地方社會的資助與建設，履行這種社會義務亦有助於提升企業家之社會聲望，¹⁴⁵ 進而累積社會資本，對於日後追求利益有所幫助。此外，提供就業機會亦是企業家的社會義務之一，王海說明在中國私營企業中，絕大部分的員工是透過「關係」雇用而來，這種依靠「走後門」(Hintertür-Praktiken)的任用親信關係，在中國的企業經營中扮演極為特殊的角色。¹⁴⁶ 由於企業家對於國家政治與制度缺乏安全感，因此藉由任用親信可以彌補該部分之不足。¹⁴⁷ 儘管企業中也雇用許多外地人，但

¹⁴⁴ See Thomas Heberer, Timothy J. Glukman(trans.), 2009.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R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pp. 232-233.

¹⁴⁵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215。

¹⁴⁶ See Thomas Heberer, 1991. *Korruption in China: Analyse eines politischen,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Problem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 125-126.

¹⁴⁷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54。

是企業內部重要職位仍是以具有關係的人擔任。¹⁴⁸「走後門」還包括與地方政府及幹部建立關係，藉此為企業發展開拓更多機會。

除此之外，「家長式」的企業經營模式亦是中國企業家特色之一。王海說明：「企業內部家庭式意識形態之建立，使員工對企業和他們的老闆產生家庭式情感，從而起到建立認同感、促進工作之功用，並且也滿足了企業家的需求。」¹⁴⁹ 這個觀念也是源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將其延伸至經濟領域，在此之中，對於家長的忠誠轉變成對企業家的忠誠，其包含無償的服務和工作。¹⁵⁰

第三項 眾擎易舉—作為戰略群體之企業家

王海認為企業家所形成的戰略群體是推動中國社會與政治改革的重要因素，他所描述的「戰略群體」為：「一群人經由一個共同利益的維持或擴展其『獲取』（acquisition）的共享機會而連結在一起，此處所指的『獲取』並不只是物質品，還包括了非物質因素，如：權力與聲望。」該群體成員有一個共同的共享、長期的計畫以及適當戰略行為，並且視自我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角色。¹⁵¹

¹⁴⁸ 「具有關係的人」之義即為親屬、同宗與同鄉關係之人。Ibid, p.198。

¹⁴⁹ See Thomas Heberer, Timothy J. Glukman (trans.), 2009.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R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p. 237.

¹⁵⁰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出版社，頁 203。

¹⁵¹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3.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as Strategic Player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9, no.1, p.71.

王海稱戰略群體所指涉之「戰略」，即為對於特定目標而設計與執行的長期計畫，而其目標包含社會、經濟與政治上之目的，而這些作為皆為了累積其資本與利益最大化。¹⁵² 其將這些戰略歸納為六種：¹⁵³

1. 成長戰略 (growth strategies)：其群體或組織利益之成長。
2. 經營戰略 (business strategies)：確立市場與商業利益。
3. 穩定戰略 (stability strategies)：社會或群體穩定的利益。
4. 政治防禦戰略 (politically defensive)：避開多種不利之處。
5. 政治進攻戰略 (politically offensive)：為了正式、非正式利益的維護。
6. 不同戰略組合戰略 (stability strategies)。

各種戰略主要是為維持群體之利益，王海說明戰略群體的目標並非在於改變體制，其目標具有一定限制，他們必須維持與擴展其機會並推動企業發展。¹⁵⁴ 有鑑於此，王海整理出戰略群體之特徵：¹⁵⁵

1. 戰略群體關注社會與政治兩者之變化。

¹⁵² Ibid.

¹⁵³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劉合光等譯，2004。「轉型國家的戰略群體與國家能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雙月刊)，第 1 期，頁 37。

¹⁵⁴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3.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as Strategic Player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1, p.71.

¹⁵⁵ Ibid, p. 72.

2. 群體展現成一個具有權威與組織性的利益團體，藉此推動改革。
3. 戰略群體能夠在上述意義中達成「戰略性」的實踐，並且能夠以正式與非正式之型態進行。
4. 戰略群體具有一個清楚的計畫與執行計畫之能力。
5. 群體成員的態度與行為影響社會價值的改變。

戰略群體角色重要之原因，王海認為乃在於其不僅是集體行為者(collective actors)，亦為一種集體符號(collective symbols)，其象徵性不僅代表一種經濟權威與企業家的成功，亦代表一種追求道德期望的實踐。¹⁵⁶ 戰略群體所代表的是中國傳統同心協力之概念，簡而言之，便是集眾人之力將其利益最大化。因此，戰略群體為了利益所施行之戰略，等同間接地影響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變革，戰略群體理論亦呈現中國改革進程的另一種面向。

第二節 透視中國 — 少數民族作為工具

70年代改革開放後，人們看到中國經濟的繁榮景象，然而，卻忽略了企業家在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在社會發展與轉型過程中的企業家之角色，已經不全然是經濟學問題，亦成為社會學的一項重要課題。¹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研究往往忽視了少

¹⁵⁶ 「道德期望」：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福利等以社會為導向的行為。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劉合光等譯，2004。「轉型國家的戰略群體與國家能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第1期，頁38。

¹⁵⁷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2001。「中國大陸彝族企業家階層對社會變遷和族群性的影響」，*遠景季刊*，第二卷，第3期，頁88。

數民族在改革進程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及作用，更遑論少數民族企業家在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進程中，所產生之影響。王海認為研究經濟與社會變遷過程，不能只將重點置於總體機制上，如：市場、利益極大化，企業家作為行為者（actors），其個人行為亦是一項不能忽視的因素。職是之故，把此觀點用於少數民族研究，以少數民族企業家作為能動者，藉此探討在經濟與社會變遷過程中之影響與作用。如此一來，使研究中國改革進程時，可以由另一個容易受忽略的群體之角度切入，體現另一種中國發展。王海擅長彝族研究，彝族特色在於其特殊的傳統社會結構，特別是仍存在著奴隸制度，是現代較為少見，以彝族作為例子頗能體現另一種中國發展進程。

第一項 同化與自治－少數民族在改革進程中所面臨之挑戰

在此處所指的「改革進程」，筆者彙整王海之研究將其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0年代中期之民主改革；第二階段，文化大革命期間之改革；第三階段，改革開放期間之經濟改革。

關於彝族在改革進程中之衝擊，王海指出早在1950年，中國便開始試圖將「諾蘇（Nuosu）」整合到社會主義的體制與社會中，¹⁵⁸ 起初政府的改革較為溫和，在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並未產生太大衝擊。¹⁵⁹ 直至1956年，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全面

¹⁵⁸ 「諾蘇（Nuosu）」是在四川地區彝族人的總稱。

¹⁵⁹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性的激進改革，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亦包括在內。彝族傳統的社會結構（奴隸制度），在此次改革中被強制廢除。彝族傳統社會結構可分為兩級制度：¹⁶⁰ 第一級為黑彝或稱「諾」（Nuo），屬貴族、地主與奴隸主；第二級為奴隸階級，在此階級中又分成三個不同種性，即為曲諾（Qunuo）、白彝或稱嘎加（Gajia）、嘎希（Gaxi）。曲諾與部分的嘎加被允許擁有自己的土地和奴隸，但是不同階級與種性禁止通婚。¹⁶¹ 在當時，黑彝僅佔涼山彝族總數的百分之八，卻掌握了大部分資源，其餘百分之九十二的彝族人受黑彝宰制，他們必須向其奴隸主（黑彝）付出極高的土地租金或者是無償耕作，並且受到各種經濟限制。¹⁶²

改革之後，奴隸階層得到自由，並且無償得到耕地。¹⁶³ 因此，絕大部分的彝人都樂見改革。雖然黑彝被迫釋放奴隸並且交出土地分配給奴隸階層，不過即使失去了這部分的財產，但是其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82, p.409.

¹⁶⁰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22。

¹⁶¹ Ibid.

¹⁶² 請見 Thomas Heberer(ed.), 1987.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 Aachen.: Rader Verlag, pp. 9-10.

¹⁶³ 根據 1956 年的『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改革實施辦法』，第四章第十四條：「分配土地以鄉或鄉以下的適當居民區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根據數量（習慣面積）、品質及其位置遠近，用抽補調整的方法按人口統一分配。但區或縣的勞動人民協會得在各鄉或適當居民區之間作某些必要的調劑。鄉與鄉之間的交錯土地，原屬何地勞動人民耕種者，原則上仍劃歸何地分配。」Ibid, p.11. 與法律圖書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實施辦法」，線上檢索日期：2010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80252。

政治權力並未受到侵犯。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共產黨宣稱只要黑彝願意還給奴隸自由，便保證不會損害其政治權力與地位以及生活水準。¹⁶⁴ 因此彝族領袖與前奴隸階層逐漸參與改革。王海指出，共產黨無論如何仍對彝族社會存在質疑，共產黨認為彝族傳統組織結構及其文化認同是過時的觀點，漢文化才是高等文化，因此將漢人觀點加諸彝族社會，導致日後與漢人之間出現嫌隙。

雖然改革使土地平等分配於彝人，但是與漢人政權的合作卻開始將黑彝整合進國家新的階級當中，逐漸地，彝族社會開始受到漢文化直接地影響。¹⁶⁵ 官方試圖同化彝族社會與經濟之傳統，使其融入國家整體，一些彝族傳統活動，如：薩滿活動，因此被禁止。在大躍進時期共產黨更加激烈地禁止了彝族對彝語及文字之使用，並且禁止彝族之文學教育、從事各種禮儀習俗與宗教活動，強迫彝族進行民族融合。¹⁶⁶ 但是此舉卻適得其反，導致彝族於 1956 至 58 年間開始一連串的武裝暴動，彝族稱之為「反動的，奴隸制社會 (reactionary, slave-holding society)」，暴動到後來轉向游擊戰方式，並持續數年，直至 1960 年受到強力鎮壓才平息下來。¹⁶⁷

不過好景不常，1966 年中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少數民族地區再掀起一陣波瀾。文化大革命對少數民族進行更加極端的同

¹⁶⁴ 請見 Thomas Heberer(ed.), 1987.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 Aachen.: Rader Verlag, pp. 9-10.

¹⁶⁵ Ibid.

¹⁶⁶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24-25。

¹⁶⁷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2, p. 409.

化行爲，期間政府否定中國爲多民族的國家，故認爲不需要民族政策，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治被認爲是反對國家統一的行爲，並將其視爲國家分離主義。¹⁶⁸ 少數民族地區不再享有特別待遇，共產黨取消地區性的經濟政策，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如：服裝、飲食、語言、文字等，受到嚴厲禁止，少數民族組織與學校亦被廢止。中國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積極推行同化政策，目地在於使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不再存有差異性。¹⁶⁹ 涼山彝族在經歷過「大躍進」時期的破壞後，文化大革命之改革對其無疑是雪上加霜。

文化大革命持續了十年之久，共產黨在不了解少數民族實際狀況之下，貿然將漢人觀點強加於上，爲爾後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關係造成嚴重衝擊。此外，共產黨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進行改革與開發，卻忽視少數民族地區之特色，大量的建設反而變成浪費，並未對少數民族帶來諸多利益，反而成爲少數民族的一種負擔。¹⁷⁰ 因此，王海認爲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並未使得民族間的差異性消失，反之，少數民族成了相對弱勢的一群，而且在就業與教育上受到歧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的漢人移入少數民族地區，其原有的文化遭受到嚴重破壞，所處的地區資源受到大量剝削，生態環境亦遭受極大浩劫。¹⁷¹

錯誤的政策成爲對少數民族之剝削與壓迫，導致族群之間關

¹⁶⁸ 請見 Thomas Heberer, 1989.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NY.: Arnonk, p. 25.

¹⁶⁹ Ibid.

¹⁷⁰ 請見溫軍，2001。「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政策的演變與啓示」，*貴州民族研究*，第二十一卷，第2期，頁16-17。

¹⁷¹ Ibid, pp.28-29.

係更加緊張。少數民族對漢族產生許多不滿，兩者間之關係因此需要花極長時間進行修補。經過這些歷史經驗，使中國政府認知到，對於少數民族之整合不可用過度激烈手段，應該透過匯集廣泛共識方式，因此中國改採溫和政策，以自治取代同化，並制定更完善的自治法律，¹⁷² 而這項政策沿用迄今。

共產黨從 50 年代開始對少數民族的各種改革，雖然對其傳統文化、社會結構與制度造成偌大衝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當時中國政府爲了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投入許多人力、物力與財力，並在該地區積極開發基礎建設，爲未來發展奠定些微的經濟基礎。此後，少數民族改革邁入第三階段。

第二項 改革開放－文化傳統之復興與貢獻

彝族存在著特殊的社會結構，歷經千年使得這些結構觀念在彝族社會中根深蒂固，並非幾次激烈改革所能改變。彝族社會建立在「家支」制度之下，黑彝亦是藉由「家支」統治其社會。彝學家張德元（2003）說明，「家支」就是「以父系血緣爲紐帶的家族聯合體」。張德元更進一步解釋「家支」就是「家」和「支」的總稱，由祖姓延續迄今，並且藉由子孫的繁衍形成若干的「家」，彝語稱爲「楚加」或「楚西」。「家」之下又可分成若干的「房」，彝語稱之爲「楚尼」。而「房」之下又可分成若干一夫一妻制的

¹⁷²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25。

小家庭，彝語稱爲「楚布」。「房」的範圍可大可小，少則一代，多可至若干代，「房」的增殖與擴大就成爲「家」下的「支」。總的來說，「家」是由「房」和「支」所演變，須經十代左右才能形成。每個「家支」都有黑彝氏族命名的稱號，並有一套「父子聯名」的家族系譜，¹⁷³以證明黑彝身分，確保在「家支」間械鬥後不會淪爲奴隸。¹⁷⁴

「家支」不僅是奴隸主（黑彝）維持其統治的政權組織形式，亦是血緣社會內部公共事務組織與管理的社會組織形式。¹⁷⁵「家支」具有保護內部成員利益、解決內外矛盾糾紛之功用。¹⁷⁶因此，可將「家支」分成內部功能與外部功能，內部功能在於維護家支成員經濟利益，成員間彼此互相援助與保護，也就是說家支成員遇到困難，無論是經濟上或與人結怨，「家支」成員都必須出手相助；「家支」的外部功能乃團結成員一致對抗外來威脅。¹⁷⁷由於彝族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是由多個「家支」所組成，雖然「家支」間會有仇恨與衝突，但是當遭遇外來威脅時，彝族各個「家

¹⁷³ 「父子聯名」：在稱呼或背誦家譜時在本人名字前冠上父名，而省略氏族名。請見蘇靜，2002。「論甘孜彝族家支的特點與作用」，**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十一卷，第2期，頁21。

¹⁷⁴ 請見張德元，2003。「涼山彝族家支制度論要」，**貴州民族研究**，第二十三卷，第4期，頁47-48。

¹⁷⁵ 請見趙聲燾，2009。「多中心治理視角下涼山彝族家支治理經驗研究」，**前沿**，第12期，頁106。

¹⁷⁶ 請見蘇靜，2002。「論甘孜彝族家支的特點與作用」，**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十一卷，第2期，頁21。

¹⁷⁷ 請見張德元，2003。「涼山彝族家支制度論要」，**貴州民族研究**，第二十三卷，第4期，頁51-53。

支」便會團結起來一起對抗。¹⁷⁸ 不僅黑彝具有「家支」，白彝亦是。白彝「家支」主要還是在於輔助黑彝「家支」的統治，並作為黑彝「家支」的經濟與軍事支柱，因此也被稱為「管家娃子」。¹⁷⁹

彝族的家支結構環環相扣彼此連結，形成一個巨大的社會網絡，雖然歷經多次激烈改革，但是這些傳統社會觀念仍存在彝人心中。時至今日，雖然中國政府宣稱已經廢止彝族社會的奴隸制度，但是在彝族社會中對於自身階級觀念仍是根深蒂固，誰是誰的「娃子」仍是清楚的；王海認為在通婚上，黑彝仍是與黑彝通婚，白彝亦是與白彝通婚，並未受到改革而有太多影響。¹⁸⁰ 然而，這是由於白彝過去在教育與經濟上受到限制，隨著時代進步與經濟發展，通婚問題逐漸地出現變化，已有部分彝人認同黑白彝通婚，這亦表示彝族的傳統觀念也隨著時代進步正在改變中。在 1976 年以前的激烈改革，導致家支活動受到限制因而停滯下來，但是改革開放後，這些傳統再度復興。中國政府更是借力使力利用彝族傳統，藉由「家支」消除糾紛並實行經濟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維持社會之穩定。

第三項 傳統觀念之轉變－彝族企業家與族群認同

在彝族傳統社會的闡述上，王海雖然僅概略地說明「家支」作用，但是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現代化之後，彝族傳統社會觀

¹⁷⁸ Ibid.

¹⁷⁹ 「娃子」是彝族奴隸的稱呼。Ibid, p. 52.

¹⁸⁰ 引自王海訪談稿。

念之作用與轉變多有著墨。王海發現過去在涼山的國營企業幾乎不聘雇彝族人，僅有極少部分員工為彝族，而且大多是從事較為底層的工作。改革後，許多國營事業關門，使得彝族的貧困情形雪上加霜。因此，發展私營公司並藉此產生企業家階層成為了區域重要的經濟戰略，亦是擺脫貧困與失業的重要關鍵。¹⁸¹ 而「家支」這項傳統在私營企業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王海說明「家支」概念亦可視為「效忠特定團體的族群資本（particularistic ethnic capital）」。¹⁸² 因為這項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彝人深知自己的責任與義務，彼此間因此具有某種信任感。以經濟角度來看，這種信賴關係可用於勞動力、信用與貸款、客戶與供貨商。¹⁸³ 因此發展私營企業，使「家支」有了現代化的功能，這項傳統因素，有效的降低了各項成本，除此之外，假如有「家支」成員在政府機關中擔任要職，通常該企業便可透過這層關係，獲得相關資源、投資成本與市場信息，¹⁸⁴ 為企業經營提供有利環境。

彝族企業多是任用「家支」成員，因此形成一種「家族企業」的企業經營模式，多數企業家認為信賴非家支成員是一種冒險，甚至是一種危險行為，而且這種情形特別出現在農村地區企業。¹⁸⁵ 但是並非所有企業家都有相同論點，王海說明隨著企業的擴

¹⁸¹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40。

¹⁸² Ibid, p. 177.

¹⁸³ Ibid, p. 178.

¹⁸⁴ Ibid, pp. 180-181.

¹⁸⁵ 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彝族企業認為：「在困難的時候，近親的工人會在必要時候不要報酬白幹，而且他們靠的住、服從，最重要的是有信賴關係。」

大與現代化，親屬因素正在逐漸減少，因為家族親屬間的關係與義務容易形成公司運作上的阻礙。舉例來說，假如有某位親屬員工因工作表現不佳而受到批評或裁員，將會導致家族內部對抗，故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了公司運作。因此，有些彝族企業選擇以資遣方式辭退這些家支成員，但是這筆資遣費足以給於其家支成員成立自己的公司，此舉表示對「家支」成員已盡道德上之義務，以這種和諧方式完成分離。¹⁸⁶ 因此，可以說「家支」觀念能有效地降低業務成本，如：人事、貸款等物質上之成本，卻也潛在極高的社會成本，如：家支成員間之間發生衝突的危險等。¹⁸⁷

「家支」不僅是族群資源，亦是一種政治資源。「家支」雖然不是正式組織，但是卻是與政府之間建立溝通與進行社會控制的橋樑，¹⁸⁸ 而且「家支」這項傳統隨著時代進步與社會人口流動轉型成爲「家支協會」形式繼續發展。越來越多區域性質的「家支協會」組織出現，其重要功能還是在於保護家支及其作用，此外還具備提高凝聚力、建立關係、提供信息與財務服務等各種家支事務。¹⁸⁹ 換句話說，「家支協會」就是一種利益團體。在人口不斷地流動之下，彝族受到各種社會與地理因素影響，對家支

另外也有企業家認爲：「即使給最高的工資，外人也很少有真正可靠的。」

Ibid, pp. 178-179.

¹⁸⁶ Ibid, p. 178-179.

¹⁸⁷ Ibid, p. 181.

¹⁸⁸ Ibid.

¹⁸⁹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2, p. 413.

觀念傳統互惠觀念愈趨薄弱，而「家支協會」的出現無疑是對家支傳統的強化，使其得以繼續延續。

隨著彝族的經濟化（economization），家支的經濟功能逐漸超越其社會功能。王海說明：「彝族利用家支和家支網絡來優化商業機會，保證在與漢族企業家的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¹⁹⁰ 家支觀點不再僅限於社會上的經濟互助，而是加入了經濟因素，也就是結合勞動分工與社會供給。王海更認為隨著市場的擴展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影響，對於原本家支互助的觀念將逐漸弱化，傳統觀念受到極大地挑戰。這亦導致彝族企業家在自身利益以及家支利益上面臨兩難的窘境，王海稱之為「商人的困境（trader's dilemma）」。

因此當面對較為窮困的家支，對其善盡道德義務成爲了彝族企業家的負擔與壓力。¹⁹¹ 在共產黨積極倡導公益活動之下，越來越多是爲了自身利益而盡家支義務的企業家，因爲藉由對家支所處的村莊或社區所作的公益，如：蓋房、蓋學校、道路、扶貧等，這些不僅可以積累其社會資本，使彝族企業家在家支中獲得極高名聲，甚至被評爲「模範勞動者」，爲企業家在人大或政協中獲得委員席位，亦可說這些積累最終有利於轉化成經濟與政治資本。¹⁹²

許多面對市場經濟現實面之彝族企業家，愈趨重視個人利

¹⁹⁰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184。

¹⁹¹ Ibid, p. 185.

¹⁹² Ibid, p. 187.

益，家支的觀念相對弱化，彝族企業家行事相對的理性化，愈來愈多的企業家寧願以金錢資助家支成員，而不雇用他們作為企業員工，反之，對外尋求有助於企業利益的員工。儘管如此，彝族企業家比起漢人仍是更富道德性。¹⁹³ 由於經濟與社會上的成就，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家被選為家支中的「頭人」，¹⁹⁴ 也因此這些具有現代化思考的「頭人」，成為傳統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以上反映出一個現象，即是彝族的家支概念正在弱化，透過新興的彝族企業家，其新穎的經濟謀略使得一種超越家支的意識正在發展。

時代不斷地在進步，為了企業利益，彝族企業家無法避免與家支以外的族人接觸，他們需要連結更多的「關係」，用以增進企業利益。王海指出有近一半涼山彝族企業家是共產黨員，他們與官員的關係更好於與漢人之關係，透過這些關係更容易解決問題。因此，隨著與非血緣關係的作用日益增加，涼山彝族人不僅限於「家支」內部活動，涼山彝族人作為一個民族，其族群的認同意識因而開始得到強化。¹⁹⁵

企業家經濟上的成功不僅增加其自信心，更直接的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因此王海認為民族（彝族）企業家具有「雙重角色（ambiguous role）」，他們不僅是族群象徵的載體，另一方面也是現代性的代表。族群象徵承載著族群訊息，構成「象徵的族

¹⁹³ Ibid, p. 197.

¹⁹⁴ 「頭人」在家支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家支在作出重大決定時，必須向他們發出邀請參加決策，徵詢建議，而他們的觀點具有決定性。Ibid, pp. 192-193。

¹⁹⁵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著，吳志成編譯，2007。「中國的民族企業家與民族認同：以涼山彝族（諾蘇）為個案的分析」，**民族研究**，第4期，頁35。

群性 (symbolic ethnicity) 」，而且間接的創造了身分認同。¹⁹⁶ 王海說到訪談彝族企業家時，發現他們總是以許多象徵性的物質品，如：身著民族服裝、使用傳統餐具，作為身分認同象徵，而且更是顯現在建築設計上，他們也會在家中擺放傳統習俗的照片，設法證明其民族認同。王海指出這些行為都是民族歸屬感的表現，亦清楚識別出與漢族的日常用品有所不同。這種象徵性物品亦是一種文化代碼，其具有打造身分認同和集體記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已超出家支的範圍，並直接涉及民族。¹⁹⁷

除此之外，民族企業家亦是現代性的代表。王海說明：「彝族企業家的現代化 (modernization) 體現在生活方式上的改變，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也給予年輕一代極大的衝擊。藉由事業上的成功，其消費行為與習慣都顯示出企業家制定了社會與族群象徵的標誌。」¹⁹⁸ 這些企業家藉由「炫耀式消費」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來突顯地位之不同，並且逐漸形成一種共有的生活方式，其象徵一種特殊階層和群體的成員身分，亦當作企業家成就的窗口。¹⁹⁹ 企業家的這種作為並非只是炫耀財富，更重要

¹⁹⁶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210-211。

¹⁹⁷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2, pp. 421-422.

¹⁹⁸ Ibid, p. 422.

¹⁹⁹ 「炫耀式消費」：有成就的企業家藉由購買奢侈品（如：豪華名車、進口名酒、名錶）當作其地位象徵。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213-214。

的是透過這種行為可以證明其經商成功，以及所處地位的自信心與向上的社會流動。²⁰⁰

彝族企業家作為現代性的代表，不僅藉由生活模式帶來社會的轉型，促進價值觀的轉變，亦造成社會結構，如：利益代表組織、當地公眾收入結構、勞動力市場的轉變，此外，其作為趨勢的先鋒與榜樣亦發揮極大影響力。²⁰¹ 彝族企業家更具備一項重要特點，即為「創新 (innovation)」。這不僅是「經濟的行動 (economic action)」，企業家對於價值觀有不同的解釋，亦對舊思維模式提出質疑，因此其更涉及對社會變遷以及對價值的重新評價。²⁰² 在社會與制度變遷方面，企業家透過其經濟資本來擴大社會與政治資本（透過捐助地方，藉此獲得名聲，有助於打通政商關係）。²⁰³ 因此，王海所指涉之彝族企業家所具備的雙重角色意義，即為對當地發展與社會變遷具有貢獻的「現代性」，另一方面，就是對當地風俗、語言和文化的威脅之「現代性」。²⁰⁴

涼山彝族的認同是多元的，由於彝族家支觀念仍根深蒂固，

²⁰⁰ Ibid, pp. 214-215.

²⁰¹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8. "Ethnic Entrepreneurs as Carriers of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vol. 9, no. 2, pp. 111-112.

²⁰² 愈來愈多年輕人與小型企業等將彝族企業家的生活方式視為一種追求目標，並且相信只有透過企業家式的活動（如：追求利潤）得以達到。Ibid.

²⁰³ 請見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頁 215。

²⁰⁴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2, p. 423.

因此對自己的民族沒有一個統一的認同意識，但是藉由彝族企業家所帶來的變化，將家支的關係現代化，逐漸導向民族關係，一種涼山彝族新的民族認同意識正在形成。²⁰⁵ 彝族企業家所表現出的是軟性民族主義（soft ethno-nationalism），他們並非追求擁有自己的國家結構，而是希望保持其文化傳統。彝族人視自己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無庸置疑的，如同非裔美國人一般，他們已將自己視為美國人，彝族人亦視自己為中國人。²⁰⁶ 但是兩者皆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二等公民，因此努力透過文化政治與企業家階層來改變這種處境，進而在中國獲得尊重。²⁰⁷

第三節 擺脫西方框架 — 王海眼中的中國公民社會之建設

對於當今中國而言，現階段的公民社會正在建制中。中國複雜的文化背景與傳統，加上許多西方定義的公民社會形成條件剛在中國初露曙光。²⁰⁸ 因此，王海認為若將西方語境中的公民社

²⁰⁵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8. "Ethnic Entrepreneurs as Carriers of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vol. 9, no. 2, p. 116.

²⁰⁶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2, p. 427.

²⁰⁷ Ibid.

²⁰⁸ 西方定義的公民社會條件：公民社會以獨立於國家的自治與獨立於傳統結構如家族、單位或家庭的自治為前提，涉及公民結構及其思維模式的形成等諸多因素。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64。

會概念強加至中國，可能面臨不適用的情況。此外，歐洲公民階層係經過羅馬法、啓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而形成，這是中國所沒經歷過的事件。另一方面，公民社會以家庭或家族利益向社會利益之轉化與學習過程，亦會刺激自由公民的責任心與共同責任之建構。儘管中國在 70 年代以後，經歷社會分化、利益重組與利益代表的重構，這僅能說明中國正處在建構公民社會的開端，因為公民社會還涉及了公民結構與思維模式的改變。²⁰⁹

第一項 建設公民社會進程之開端—「改革」²¹⁰

王海說明建構公民社會的第一個前提為「國家組織之外行動空間的產生與社會力量的增長」。因此，改革成為這個前提的一項重要因素，簡而言之，改革即為中國國家—社會分離的推動力。中國在 70 年代末期，農業改革綱領建立之後，國家組織逐漸從農村中退出，成為社會力量增長的第一步。²¹¹ 在改革過程中，農村的政治經濟化，共產黨積極從事經濟建設，並且鼓勵黨幹部投入企業經營，加上經濟部門的收入遠高於行政部門，因此越來

²⁰⁹ Ibid.

²¹⁰ 在此處所指涉之改革，是概括性的，包含農村改革、經濟改革等諸多項目。

²¹¹ 70 年代由於農產品與日常所需用品供給短缺，農民自發性的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經營，這種行為起初出現在貧困地區，後來發展至全國。國家領導階層意識到，此類家庭經營刺激了產出，較快的改善了城市供給情況，於是其開始於全國實施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Household-Responsibility System)」，並且使得「農業改革」綱領被建立。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頁 65。

越多的幹部轉換跑道，而許多留在行政部門以及不會經營地方經濟的老幹部卻因此被市場所淘汰成了低收入者。²¹²

王海指出，農村市場與民營經濟越來越發達，在這種發展情況下，使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也出現變化，農村青年價值觀的改變，對入黨興趣不大，沒有黨員的村莊因此增加，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經濟實力的人，對政策更具影響力。國家組織的退出，衍伸而來的問題是許多勞動力受到閒置。這部分勞動力有的轉變成爲個體戶即爲獨立的小商人，並且成爲迅速發展的私人經濟領域的主體部分，亦成爲市場經濟的基礎。王海說明，這種發展導致企業家群體的產生，他們不僅具有經濟自主性，對於政治有更高要求，其影響力亦使中國共產黨在 2002 年十六大會議中，同意企業家入黨，導致農民與個體戶有了新的劃分，產生社會分化。

這種社會分化的結果，是許多弱勢族群陸續出現，爲了保障弱勢族群之權益，國家開始推動更多的社會福利政策。此外，儘管國家－社會逐漸分離，但是國家爲了確保不和社會完全脫節，在國家控制與監督之下，一些社會組織與利益團體應運而生，並且成爲國家與社會間協商及溝通之橋樑。²¹³ 儘管這些組織與團體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但是其功能與影響卻與社會、黨、國家

²¹²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柴方國，1997。「中國農村基層的社會變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 1 期，頁 37。

²¹³ 這些社會組織與團體依資金來源又可分爲三類：官方組織、半官方組織、民辦組織。不過無論資金是否來自於官方，這些組織都是受政府監督與控制，不是獨立的組織。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頁 65-67。

的互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加上在私人經濟日趨發達的情況下，其扮演著促使社會、黨國轉型的動力。王海將這種與黨國機構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社會組織稱為「體制上的寄生物 (institutional parasitism)」。²¹⁴ 由於西方所定義的公民社會是立足於國家－社會的對抗，因此，中國這種社會組織透過黨員與黨國相互影響所形成的網路與相互滲透的關係，西方的定義無法解釋這種現象，²¹⁵ 似乎也就成爲了一種中國特色。

第二項 公民權之實踐－政治參與

對於公民權的描述，王海以馬歇爾 (T. H. Marshall) 對於判斷公民權的三項標準檢驗之，即爲：²¹⁶

1. 個人自由的權利 (民事公民權)。
2. 適當的、有保障的生活水平的權利 (社會公民權)。
3. 參與權力運用的權利 (政治公民權)。

其中，中國城市社區就具備了第二、三項，而第一項仍是中國尚須努力的部分。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積極在農村地區推動基層選舉，並且將這些農村經驗延伸至城市地區。儘管大部分

²¹⁴ 請見 Thomas Heberer, 2010. "China: Creating Civil Society Structures Top Down?" 線上檢索日期：2010 年 5 月 6 日。網址：<http://www.de-cn.net>。

²¹⁵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頁 67。

²¹⁶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君特·舒耕德著，2009。*從群眾到公民－中國的政治參與*，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31。

這類選舉並非採人民直接選舉制，而是受政府監督與動員，²¹⁷ 但是王海認為不能因此否定其具有公民參與性，他預期這種動員性的政治參與以及按照規定程序進行的選舉，最終仍可能產生有實質內容的自治。在王海的調查下，農村與城市的人民在法律文本上的權利因此有所增加，而且動員式的選舉為選舉人創造了機會，選舉人有權利對候選人的職務有所要求，此外，亦對候選人設立一定的限制，如：要求候選人有義務遵守選舉承諾等。

王海提出「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與主動是公民社會與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標誌」，認為中國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或許還言之過早，在落實直接選舉與政治參與之前，首要應當注重經濟安全，因此解決社會問題才是當前重要議題。人民有了相對的經濟基礎後，才會有興趣參與政治。基層選舉所進行的項目為社區的居民委員會（Residents Committees, RC）選舉，而社區的居民委員會所承擔的職責最貼近民眾生活，因此這部分的選舉顯得特別重要，不僅是在解決社會民生問題上，對於維持國家政權合法性亦有其作用。²¹⁸

如上部分所述，社會的分化導致了弱勢族群的出現，而社區的居民委員會主要對這些社會弱勢團體具有極重要的功能，其代表上級政府機構，負責向弱勢族群提供社會服務與資金支持。²¹⁹

²¹⁷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69-70。

²¹⁸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城市選舉帶來制度變化和合法性？—城市社區居民的選舉認識和參與意識」，載於何增科等主編，2007。**城鄉公民參與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編譯出版社，頁162-164。

²¹⁹ Ibid, pp. 135-136.

除此之外，社區還要肩負維繫市場經濟以及為體制奠定合法性的功能，²²⁰ 因此社區的功能極為重要。不過在王海的調查中顯示，社區居民對於基層選舉的興趣並不高，最直接的原因乃認為選舉對其利益影響不大。

中國政治領導人希望社區的居民能夠藉由凝聚集體利益共識，逐漸促成自願性的參與選舉這類公共活動，進而建立國家－社會之間穩固的合作關係。²²¹ 但是，由於生活型態與就業結構之差異，社區居民不像農村一般能夠藉由集體經濟獲得集體利益，²²² 所以現階段要城市社區居民凝聚共識不易。因此，王海經調查導出一個觀點「只要參與者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利益所在，參與積極性就不會高」。王海亦指出，積極參與份子多是認為與其直接福利相關而參與，如：領取救濟金者，因為選舉結果會影響他們的權益。²²³ 此外更多的民眾認為，組織選舉所耗費的資源多過於所得之利益，²²⁴ 故導致民眾對選舉缺乏興趣。因此，

²²⁰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著，魯路譯，2005。「中國的社會政治參與－以社區為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第3期，頁24。

²²¹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城市選舉帶來制度變化和合法性？－城市社區居民的選舉認識和參與意識」，載於何增科等主編，2007，**城鄉公民參與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編譯出版社，頁138。

²²² 請見 Thomas Heberer, Gunter Schubert, 2009.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N.Y.: Routledge, p. 5.

²²³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著，魯路譯，2005。「中國的社會政治參與－以社區為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第3期，頁24。

²²⁴ 請見托瑪斯·海貝勒，「城市選舉帶來制度變化和合法性？－城市社區居民的選舉認識和參與意識」，載於何增科等主編，2007。**城鄉公民參與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編譯出版社，頁152。

社區如何扮演好提高居民參與意願的催化劑，中國政府應該提供更具體的幫助。

儘管如此，王海仍強調：「參與是凝聚公民步入新的政治與社會進程的手段，它有益於增加政治穩定性與合法性。」王海據以認為地方基層選舉仍是必要，因為選舉能夠提供機會給予相關居民反應意見，甚至罷免不稱職以及不受歡迎之官員，而政府領導階層則藉此了解人民的心理動態，使中國強權政府能夠進行修正與調整，從而激勵官員為選民服務。王海引用 Kerklin 所提出之三種模式作為解釋威權政體實行選舉的原因，即為：²²⁵

1. 為了制度合法性。
2. 為了使群中政治參與社會化。
3. 為了動員群眾。

在這三種模式之外，王海提出了第四種模式：「平等的一體化」模式，也就是黨員、非黨員、民眾與官員等社會階層一律平等。因此，透過選舉不僅能夠促進政治體制的合法性與穩定性，亦可使其更加開放。²²⁶

第三項 維持政權合法性－建設中國公民社會

中國在 1970 年進行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市場經濟出現巨大轉變。與蘇聯以及中歐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改革屬循序漸進，因此其間避免了因過度激烈的改革而導致政權迅速垮台

²²⁵ Ibid, p. 162.

²²⁶ Ibid.

或者國家動亂。中國的改革途徑乃獨一無二，其共產黨領導階層有效的控制市場改革的速度與規模是主要原因。²²⁷ 不過仍有西方學者預測，儘管中國共產黨目前仍可持續維持其獨佔權力 (exclusive power)，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向全方位的私營化 (privatization) 與民主化 (democratisation) 靠近。²²⁸ 王海因此綜合諸多預測，整理出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有三種可能：²²⁹

1. 災難論 (apocalyptic)：中國將因為社會與政治的不穩定導致共產黨內部出現摩擦，最終導致體制的崩潰。
2. 樂觀論 (optimistic)：中國將逐漸走向如同台灣與南韓模式一般的民主體制。
3. 含糊帶過論 (muddling through)：中國仍持續用現有的解決問題方法去勉強回應與保護共產黨一黨專政規則 (one-party rule)。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規則的終止只會被減慢，不會化解未來體制的崩潰，最好的情形是自我啟動民主轉型。因此，共產政體面對逐漸深化的合法性危機，最終將會導向民主化。改革與創新將會自然的出現，體制改變 (Systemwechsel) 在中國將是不可避免。²³⁰

²²⁷ 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藉由以下幾點有效控制改革：1.以最低的比例讓資本人家加入政黨精英的寡頭政治之內；2.在改革進程中仍然維持政治優先；3. 試圖維持最大限度的穩定以及同時產生有效的體制合法性（這些行為顯現在好的經濟表現、國家主義熱誠以及權力下放與地方聲音的容忍上。）請見 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 2006. "Political Reform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EN* 99, April, p. 10.

²²⁸ Ibid.

²²⁹ Ibid.

²³⁰ Ibid, pp. 10-11.

因此，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在一方面要穩定市場，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其威權主義。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必須一方面進行改革，另一方面思考如何達到改革目標，卻又不危及其一黨專政規則。²³¹ 但是現階段中國成功地維持了一黨專政規則，這必須要歸功於亮麗的經濟表現。王海指出，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將所有的經濟利益帶給大部份人民，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仍夠維持其政治支配的最大原因。²³² 在中國，一黨專政的規則依然會延續一段時間，這不僅是共產黨成功的壓制異議以及經濟的持續成長，也在於共產黨使民眾相信自己所推動的一系列法律規章，能擴大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並維持社會安定。以上作為，使人民不感覺一黨專政有何不妥。²³³

除了馬歇爾所提出檢驗公民權的三項標準之外，王海還補充了第四項即為「公民意識與集體精神」。王海說明義務工作形式的公民意識與集體精神在中國還相當薄弱，不過正在發展當中。這也是由於中國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進而延伸出慈善觀念有關；另一方面，則是與國家積極推動公民責任與公民意識的形成有關。在這部份，王海認為義工是造就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在新華社的訪談中說：「在一個沒有人關心社會弱勢群體的社會中，每個人僅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不考慮他人和社會利益，這樣的社會是注定失敗，沒有未來的社會。」王海更親力親為的於 2006 年到中國北京一個社區擔任義工，希望藉此鼓勵中

²³¹ Ibid, p. 11.

²³² Ibid, p. 13.

²³³ Ibid, p. 13.

國人民投入義工工作。²³⁴ 目前中國共產黨積極地在維持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因此配合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結果，適當地作了一些政治上改革，如：基層選舉、開放資本家加入共產黨等。種種政策的實施，似乎成爲建設公民社會之前提條件。

假如沒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中國人民便難有動力從事義工活動，因此，馬歇爾所提出的第二項：「適當的、有保障的生活水平的權利」似乎成了實踐公民社會的關鍵要素，而這個觀點亦是中國政府與人民之共識，此外，亦是中國政府維持政權穩定和合法性之核心因素。因此，王海認爲中國只要繼續掌握「慈善（benevolence）、繁榮（glory）、安定（stability）、責任感（accountability）」這四項準則，一黨專政便能繼續維持下去。如上所述，中國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或許爲時尚早，但是國家爲了維持合法性所作的改革，一方面亦間接的推動了建設公民社會進程，故真正的公民社會在中國出現，也是不無可能。

小 結

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研究文獻衆多，但是卻鮮少關注企業家在其中之作用與影響。王海認爲企業家身分具有多重功能，不僅是經濟上的先鋒，亦是社會的承載體。企業家不僅爲中國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企業家爲政府在就業問題、供應問題提供解套，

²³⁴ 請見新華網，2006。「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弘揚義工精神」。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5月2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5/22/content_4585582.htm。

亦增加政府稅收，紓緩中國政府經濟壓力，這些應歸功於企業家所具備之道德觀，而這也是中國企業有別於西方之特色。

企業家連繫著複雜的關係網絡，因此當企業家形成一種戰略群體後，行動更具影響力。企業家爲了將利益最大化，其所作有限的逾矩行爲，既不挑戰與威脅政府，反之，逐步使得中國政府做出退讓，逐漸地，制度上亦因此出現變革。職是之故，企業家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角色不容小覷。

王海除了關注企業家行爲外，更注意到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問題。其注意到少數民族（彝族）企業家在改革進程中之影響，以及少數民族在面臨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困境，其間少數民族企業家所扮演的，便是當中之磨合劑。少數民族企業家所具備的雙重角色，不僅維持了傳統家支觀念，更進而將之現代化，也就是將家支觀念用於企業的關係網絡中，體現出中國改革進程的另一面向。

最後，企業家爲其利益所作的逾矩行爲，導致了經濟、社會與政治上之變革。政府一方面欲持續進行改革，以維持經濟繁榮；一方面又必須維持其政權合法性下所作之行爲，卻間接成爲建設公民社會之前提條件。從同意企業家入黨，到開放地方基層選舉，種種措施爲建設公民社會露出曙光。王海擺脫了西方框架，認爲不應該以西方標準檢驗中國，中國具有歷史悠久有別於西方的傳統文化，因此將西方觀點強加之上乃不適用。王海認爲現在中國公民社會正在萌芽階段，固然不可避免受到市場化與現代化的影響，但在未來，中國將會出現具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

第五章 結 論

德國漢學發展始自 17 世紀，當時對中國的研究尚未形成一門學問，僅是文人雅士對神秘中國的興趣所衍伸。這是一種對中國熱愛的投射，反映在對物質的追求。對當時知識學者而言，「中國熱」則是反省歐洲問題的工具之一。而真正欲了解中國而研究中國，實屬傳教士。傳教士對於歐洲開展中國研究之貢獻極大，其不僅將當時中國現實情況傳播至歐洲，使中國得以抹去神祕面紗，讓遙遠的歐洲可以真正認識中國，亦揭開歐洲知識界對中國的興趣。傳教士還翻譯了不少中國經典，成為東西方知識交流之橋樑，貢獻頗大，亦為歐洲漢學研究揭開序幕。但是，在此時期對中國的研究尚未具備學術性。

而殖民時期之漢學研究，則是以實用為目的，為因應帝國利益而進行之研究，此時漢語培訓以及當代中國知識成為研究重點。由於此時期東西方的國家實力已出現明顯差異，因此，學者們多以歐洲中心觀點研究中國。身為列強之一的德國也不例外，其大量蒐集中國相關之書籍資料以及出版漢語學習書籍，也為爾後具備學術性質之漢學研究立下基石。

「漢學」一詞出現在 20 世紀初，此時期的漢學研究皆屬於傳統漢學範圍，一直到了二次大戰後「漢學」才出現分流。漢學被明確地分為「傳統漢學」與「當代中國學」，前者以研究中國文化經典古籍為主，用以反襯出歐洲的古典中國形象；後者則是

藉由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少數民族議題等，建構出現代中國形象。

然德國過去一代出名之學者多以研究傳統漢學為主，傳統漢學研究成果豐碩。時至今日，當代中國學研究儼然超越傳統漢學。中國崛起後，研究當代中國學成爲一種趨勢，其研究成果之表現亦比傳統漢學豐富。然而，每個時期不同的漢學發展亦有其代表學者，如同 17、18 世紀的漢學家代表有利瑪竇與湯若望等；殖民時期則有克拉普洛特、李希霍芬等。時至今日，當代著名漢學家以研究傳統漢學出名有鮑吾剛、馬漢茂與傅吾康等人。然而，在 20 世紀後半葉才興起的當代中國學，著名學者眾多，其中頗具特色的爲「王海（Thomas Heberer）」。

王海雖出生於聯邦德國，但是經過學思歷程，受到同儕及老師的影響，逐漸形成其左派思想，對社會主義有所憧憬。王海在求學過程所處的年代，正好遇到西德學生運動，他也參與了這種近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之中，在其中逐漸學習積累左派理論，也在該運動中落實左派思想，使其更加認同社會主義。而經過多年遊歷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王海較爲認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然經過多年的歷練，王海的左派思想已不是極端的共產思想，而是幫助其研究的分析方法之一。

王海對於中國並非盲目地熱愛，而是從各方面去實踐。這種實踐更顯現在於研究課題上，其認爲「田野調查」爲一重要研究方法，如此才可真正深入中國、理解中國。其較早便進入中國工作，多年在中國工作的經驗使其深刻體會中國特有的「關係」文化。也因爲王海深入中國作研究，才能夠理解中國，在某些敏感

問題上，他總是能夠技巧性的發問，卻又不失其研究目的。王海的研究亦不會因為喜愛中國，而失去中立性。反之，他能夠處於客觀的角度論述中國。

在中國累積多年的經驗，給與王海在中國研究上多有益處。因為理解中國，故他能夠以非西方觀點觀察中國，給與客觀的評價。他所受的社會人類學教育，使其可以微觀角度省視中國。王海在中國改革的研究中，注意到容易受忽略的部分，如：企業家之作用與少數民族議題。王海提出私營個體戶是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動力之一，亦紓解中國當時的經濟壓力。個體經營者逐步、有限的逾矩行為，驅使政府將原先的非法私營法理化，進而導致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帶動中國經濟，亦產生許多新興企業家，企業家的角色亦受到共產黨的肯定。

隨著時代的進步，王海指出在中國的企業家已不只是具有單純的買賣功用而已，他們是更複雜的載體，交織著生產、賦稅、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社會公益。王海更說明東方企業家與西方之差異，在於東方的企業不僅是營利組織，還牽扯於官僚組織之中。此外，中國的企業家更富有社會責任，他們必須遵循道德義務，不會有失道德的追求利益。王海亦分析中國企業特有的「家長式」企業經營模式，將傳統對家庭家長的忠誠，移轉至對企業家的忠誠，這些亦有效幫助企業家對於公司的管理。

企業家為了使利益極大化，亦會團結眾人之力，形成一種有目的的戰略群體作集體行動。這種戰略群體並非只是集體行動，還是一種集體符號，此符號象徵經濟權威與企業家的成功。王海利用戰略群體理論，分析企業家在改革進程中之影響，闡述中國

改革進程中的另一面向。

王海除了分析企業家角色，還將其導入少數民族議題中，分析改革進程中少數民族企業家的作用與影響。王海以彝族作為研究對象，說明彝族在改革過程中所受之衝擊，藉此呈現中國改革進程中，容易受忽略的少數民族部分。中國改革進程中，以文化大革命所施行的族群融合政策對彝族影響最大。此政策雖然破除了彝族傳統奴隸制度，但也嚴重破壞彝族傳統文化，更造成漢－彝族群之間的嫌隙。而改革開放使彝族傳統文化得以復興，中國政府亦藉力使力，利用彝族傳統「家支」概念維持其社會穩定。

現代化以後，傳統的「家支」概念應用到企業經營上。王海說明，家支的概念是一種族群資本，家支成員間有著各自的責任與義務，藉由對彼此的信任，有效的降低企業經營成本。若有家支成員擔任政府機關職務，更給予企業有利的經營環境。現代化的家支以一種協會模式（家支協會）繼續存在，繼續鞏固傳統。

不過，王海注意到彝族企業家正面臨到，在自身利益以及家支利益上兩難的窘境。王海提出，彝族企業家愈趨重視個人利益，家支的觀念相對弱化，其行事相對的理性化。儘管如此，王還仍認為彝族企業家比漢族企業家更富道德性。儘管面對較為窮困的家支，奉行道德義務成了企業家的負擔。但是藉由幫助這些家支成員，無形間累積了企業家的社會資本，進而形成其政治資本。

除此之外，王海提出彝族企業家具有雙重角色，不僅是族群象徵的載體，也是現代性的代表。族群象徵承載著族群訊息，而且間接地創造了身分認同。而彝族企業家作為現代性的代表，不僅藉由生活模式帶來社會的轉型，促進價值觀的轉變，亦造成社

會結構的轉變。王海說明彝族企業家所帶來的變化，他們將家支的關係現代化，逐漸導向民族關係，王海認為一種涼山彝族新的民族認同意識正在形成。

Barabantseva 提到，多數人對於少數民族的看法，認為他們是受壓抑的、被邊緣化的，當他們表達非主流的認同訴求，國家往往以兩種極端方式面對他們，一種是把其當作孩子般對待，給予所需；另一種，即視為反叛行爲，加以壓制。²³⁵ 然而，王海的少數民族研究，給予人們在關心少數民族議題上，有一個更寬廣的視野。

王海除了以微觀方式省視中國之改革，其亦擺脫西方框架來論述中國建設公民社會的可能性。中國政府現在正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中，一方面需要持續進行改革，以利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需要維持其政權合法性。因此，王海注意到當中國政府在維持這兩者的同時，實際上逐漸形成公民社會的雛形。王海強調不能以西方觀點省視中國，中國具有與西方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因此西方觀點將難以適用其中。王海認為中國的公民社會初露曙光，未來將有機會形成具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

王海在德國漢學轉型中所代表的意義，如同彝族企業家在中國改革中一般，是帶領所處群體轉型的先鋒。王海的思想養成過程時逢全球學生運動蓬勃發展之時，再加上師承法蘭克福學派大師 Theodor W. Adorno，因此 Adorno 的批判理論對其影響甚大，

²³⁵ Elena Barabantseva, forthcoming.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Ethnicity in China: Review Article”.

甚至將該理論應用於參與學運之時。當時，王海不僅對於教育制度上有所批評，其深受馬列思想影響，因此對於紅色中國的社會主義有極度的憧憬，並且實踐在其研究中。此舉與當年抗拒研究紅色中國的部分西德學者不同，一方面，西德學者認為紅色中國的資料多帶宣傳性質，不具研究價值；另一方面，則是深受當年意識形態影響，雙方陣營對立之下，不願意對紅色中國有過多地闡述，因此對於紅色中國仍存在想像之中，而台灣就成了研究當代中國的替代品。而王海或許也就是對於中國有所想像，才會嚮往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並且甚早就有機會參訪中國，後來更是積極爭取到中國的工作機會，這些中國經驗亦有助於其研究。因此，王海的研究在當時可能並非主流，但是可說是推動西德漢學轉型的先鋒之一。

60年代對中國有憧憬的一代人後來成為中國通頗多，王海並不特殊，其中反映了當代人對自己所處社會的批判，將理想投射到毛澤東發動的革命，但也因為曾經嚮往，以至於當後來對中國的發展實況有更多的認識後，因為革命理想破滅而失望的大有人在。這一代在激進年代成長的學者之間出現差異，在於他們如何回應於中國革命幻象的破滅。其中，有對中共產生憤恨者，希望中國分裂以免民族主義肆虐者亦有之，另有轉而致力於中國人權研究者。王海與眾不同的是，他進入田野調查，從關注彝族的經濟發展中，一方面延續了對基層與邊陲的關懷，二方面沒有在情緒上對中共的刻意抵制。與激進年代學者從批判自己社會轉而批判中共的多數相比，趨於務實的王海雖非唯一，但能夠在德國中國學的發展中產生成為轉型的代表，則是值得記載的成長過程。

經過多年的歷練，王海對於中國已不再只是想像，而更為務實。王海以社會人類學理論進行研究，如同該理論所強調一般，必須打入群體才能真正理解問題。也因此，使得王海在研究中國問題上能夠以中立的客觀角度切入，呈現非西方觀點的結果。王海不僅自身的研究強調田野調查，在其教學上亦是如此，其亦影響其他學者，如 Gunter Schubert，加入這種研究方式。王海所堅持的社會人類學與民族誌的研究方式，為德國的中國學研究注入一道新血，給予 Fairbank 範式以外的另一種選項，其研究成果亦展現不同面向的中國意象，更提供西方社會能夠客觀地檢視中國。如同彝族企業家所擁有的雙重身分，他們一方面象徵著族群，另一方面又代表著族群的現代性；在德國漢學現代化以後，王海亦具備雙重身分，其豐碩的研究成果呈現德國漢學的另一面，亦代表一種德國漢學轉型後的現代性。

參考文獻

一、英文資料

書籍：

Jie Fan, Thomas Heberer, Wolfgang Taubmann, 2006. *Ru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Y: M. E. Sharpe.

Martin Jay,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32-1950*, London: Heinemann.

Robert Ash,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2007.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Y.: Routledge.

Thomas Heberer(ed.), 1987.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achen: Rader Verlag.

Thomas Heberer, 1989.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NY.: Arnonk.

Thomas Heberer, 1991. *Korruption in China: Analyse eines politischen,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Problem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Thomas Heberer, Wolfgang Taubmann, 1998. *Chinas Ländelich Gesellschaft im Umbruch: Urbanisierung und sozio-ökonomischer Wandel auf dem Lande*, Opladen/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Thomas Heberer, 2003. “Der Wissenschaftler als Reisender: Ein Essay zum wissenschaftlichen Reisetrieb, seinem Nutzen und Erkenntniswert“, in Thomas Fues, Jochen Hippler (Hg.), *Globale Politik: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Bonn: 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Thomas Heberer, 2009.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Thomas Heberer, Gunter Schubert, 2009.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N.Y.: Routledge.

Thomas Heberer, 2011. Christian Göbel,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Urban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期刊：

Claudia Derichs and Thomas Heberer, 2002. “ASIAN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DISCOURSES ON POLITICAL REFOR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rill, Leiden*, pp. 147-176.

Esther Leslie, 1999. “Introduction to Adorno/Marcuse Correspondence on the German Student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vol. a, No. 223, pp. 118-122.

- Ingo Cornils, 2003. "LONG MEMORIES: THE GERMAN STUDENT MOVEMENT IN RECENT FICTION". *Germany Life and Letters*, vol. 56, No. 1, pp. 89-101.
- Joseph Yu-Shek Cheng, 2010. "Book Review".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pp. 125-127.
- Milan Petrovlé, 2007. "Students Movement of 1968-Unfinished Revolution", *Law and Politics*, vol. 5, No. 1. pp. 1-23.
- Thomas Heberer, 1999. "Entrepreneurs as a Social Actors: A Privat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DUISBURGER ARBEITSPAPIER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No. 21.
- Thomas Heberer, 2003.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as Strategic Player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No. 1, pp. 64-79.
- Thomas Heberer, 2005.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d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82, pp. 407-427.
- 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 2006. "Political Reform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EN 99*, pp. 9-28.
- Thomas Heberer, 2007. "Book Review: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 growing under orders since 1949".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pp. 51-52.
- Thomas Heberer, 2007. "Book Review: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pp.156-159.

Thomas Heberer, 2008. "Ethnic Entrepreneurs as Carriers of Ethnic Identity: A Case Study among the Liangshan Yi (Nuosu)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vol. 9, No 2, pp. 97-119.

Thomas Heberer, 2009. "Evolution of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or Authoritarian Communitarianism?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utonom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1, pp. 491-515.

Timothy S. Brown, 2009. "AHR Forum "1968" East and West: Divided Germany as a Case Study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114, No. 1, pp. 69-96.

Zurndorfer, Harriet T., 2003. "Beyond Sinology: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JESHO*, vol. 46, no. 3.

二、中文資料（依筆劃排列）

書籍：

Tom Bottomore 著，廖仁義譯，1988。《法蘭克福學派》，台北：桂冠圖書。

王銘銘，1997。《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于長江譯，2005。《涼山彝族企業家：社會和制度變遷的承載者》，民族出版社。

托馬斯·海貝勒（Thomas Heberer）著，吳志成等譯，2003。《作為戰略群體的企業家：中國私營企業家的社會與政治功能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托馬斯·海貝勒、君特·舒耕德著，2009。《從群眾到公民——中國的政治參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何增科等主編，2007。《城鄉公民參與和政治合法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李雪濤，2008。《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芮克里夫·布朗著，夏建中譯，1991。《社會人類學方法》，台北：久大文化。
-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1989。《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台北：稻鄉出版社。
- 馬丁·杰著，鴻鈞譯，1990。《阿多諾：法蘭克福學派宗師》，台北：結構群發行，萬里書攤總經銷。
- 高宣揚著，1991。《德國哲學的發展》，台北：遠流出版。
- 馬漢茂等主編，張西平等譯，2005。《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河南：大象出版社。
- 張西平，2009。《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
- 許明龍，2008。《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董叢林，1992。《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厲以寧等著，2001。《改革發展與社會變遷》，北京：華夏出版社。
- 顧長聲，1983。《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期刊：

- 王維江，2004。「20世紀德國漢學研究」，《史林》，第5期，頁7-13。
- 托馬斯·海貝勒，柴方國，1997。「中國農村基層的社會變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1期，頁36-40。
- 托馬斯·海貝勒，2001。「轉型社會中的企業家及其角色定位」，《制度經濟學》，第3期，頁36-48。
- 托馬斯·海貝勒，2001。「關於中國模式若干問題的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第5期，頁9-11。
- 托馬斯·海貝勒，2001。「中國大陸彝族企業家階層對社會變遷和族群性的影響」，《遠景季刊》，第二卷，第3期，頁87-129。
- 托馬斯·海貝勒 (Thomas Heberer) 著，劉合光等譯，2004。「轉型國家的戰略群體與國家能力」，《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第1期，頁31-49。
- 托馬斯·海貝勒，諾拉·紹斯米卡特，2005。「西方公民社會觀適合中國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64-71。
- 托馬斯·海貝勒著，魯路譯，2005。「中國的社會政治參與—以社區為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第3期，頁17-24。
- 托馬斯·海貝勒著，吳志成編譯，2007。「中國的民族企業家與民族認同：以涼山彝族（諾蘇）為個案的分析」，《民族研究》，第4期，頁31-40。

- 托馬斯·海貝勒著，張鳳鳳譯，2009。「20世紀中國政治史：對現代化與善治的追求」，《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第5期，頁36-44。
- 宋經同，2009。「彝族傳統家支觀對涼山新農村建設的影響研究」，《安徽農業科學》，第三十七卷，第36期，頁18177-18179。
- 李雪濤，2007。「德國漢學史的分期問題及文獻舉隅」，《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頁112-120。
- 孫景峰，1998。「列寧與左派共產主義者」，《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頁43-47。
- 張平功，2001。「批判理論：從法蘭克福學派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學術研究》，第7期，頁73-77。
- 張德元，2003。「涼山彝族家支制度論要」，《貴州民族研究》，第二十三卷，第4期，頁47-54。
- 梁怡，2004。「德國部份大學的中國研究機構」，《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二卷，第3期，頁38-43。
- 曹景文，2003。「德國中國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四卷，第1期，頁20-23。
- 許仟，2001。「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探討」，《政策學報》，第1期，頁151-153。
- 郭家驥，2002。「中國的民族政策：成就與挑戰」，《雲南社會科學》，第5期，頁65-68。
- 溫軍，2001。「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政策的演變與啓示」，《貴州民族研究》，第二十一卷，第2期，頁14-20。
- 溫軍，胡鞍鋼，2003。「民族與發展：新的現代化追趕」，《西

南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二十四卷, 第 2 期, 頁 1-12。

趙聲馗, 2009。「多中心治理視角下涼山彝族家支治理經驗研究」, 《前沿》, 第 12 期, 頁 106-110。

鄭濤, 2003。「論西部大開發與民族政策在西部的實施」,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 第二十四卷, 第 9 期, 頁 60-64。

盧麗等著, 2009。「涼山彝族等及觀念的變革與現狀研究」, 《內江師範學院學報》, 第二十四卷, 頁 65-66。

戴啓秀, 1999。「德國當代漢學家鮑吾剛及其主要著作」, 《德國研究》, 第十四卷, 第 2 期, 頁 44-48。

魏思齊, 2006。「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世界漢學》, 第 1 期, 頁 37-66。

羅章, 趙聲馗, 2009。「家支在當前涼山彝族鄉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 基於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視角」, 《雲南社會科學》, 第 3 期, 頁 73-78。

關山, 2005。「德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國外社會科學》, 第 2 期, 頁 57-65。

蘇靜, 2002。「論甘孜彝族家支的特點與作用」, 《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第十一卷, 第 2 期, 頁 21-25。

論文:

白婷婷, 2009。《學者高敬文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轉型中的知識社群》, 中山大學政治所。

- 李圭之，2007。《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中山大學政治所。
- 陳建廷，2007。《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中山大學政治所。
- 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台灣大學政治所。
- 曾倚萃，2007。《論溝口雄三的中國方法》，中山大學政治所。

網路資料：

- China Perspectives. “Strategic Groups and State Capacity: The Case of the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omas Heberer.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5日。網址：<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document255.html#texte>。
- NEW STATESMAN. “Utopia or Auschwitz: Germany’s 1968 Generation and the Holocaust By Hans Kundnani”.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1月11日。網址：<http://www.dw-world.com/dw/article/0,2144,3591495,00.html>。
- Open Democracy. “The 1968 Debate in Germany”.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1月15日。網址：<http://www.opendemocracy.net>。
-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Institut für Sinologie”. 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sino.uni-heidelberg.de/courses/ma_sinologie/。
- Thomas Heberer, 2010. “China: Creating Civil Society Structures Top Down?”.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5月6日。網址：<http://www.de-cn.net>。

Thomas Heberer. “China: Creating Civil Society Structures Top Down?”.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5日。網址：<http://www.de-cn.net>。

Thomas Heberer. “Some Considerations on China's Minor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Conflict or Conciliation?”. 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5日。網址：http://ir.minpaku.ac.jp/dspace/bitstream/10502/1755/1/SER50_002.pdf。

Universtät Duisburg Essen, “Prof.Thomas Heberer’s biographical data”. 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uni-due.de/oapol/Team_heb_en.shtml。

Universtät Hamburg, “Asien-Afrika Institut”, 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aai.uni-hamburg.de/china/Studieren.html>。

中國國家圖書館。「漢學家資源庫」。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12月2日。網址：<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4>。

中國網。「與德國漢學家顧彬對談中國文學史」。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12月2日。網址：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11/14/content_16768202.htm。

王維江。「二十世紀德國的漢學研究」。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7月2日。網址：<http://www.tecn.cn/data/20653.html>。

史學研究網。「史學研究-鮑吾剛」。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12月17日。網址：<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333>。

思想庫。「萊布尼茨時代的德國漢學」。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12月17日。網址：<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thread-13242-1-1.html>。

烏有之鄉。「中國與社會主義」。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12月17日。網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08/49205.html>。

高小龍。「家支與小涼山彝族社會」。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5日。網址：http://www.channelwest.com/files/friends/yndxrlx/xsyd/06_05.htm。

國際漢學。「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11月29日。網址：<http://www.guoxue.com/worldsinology/german/germanhaidebao.htm>。

第四屆國際彝學研討會。歷屆會議。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5日。網址：http://iel.cass.cn/yistudies/ljhy_1.htm。

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研究中心。著名漢學家傅敏怡應邀談德國漢學發展情況。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3月5日。網址：<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1671>。

新華網（2006）。「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弘揚義工精神」。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5月2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5/22/content_4585582.htm。

德國之聲。「68年運動在德國」。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1月11日。網址：<http://www.dw-world.com/dw/article/0,2144,3591495,00.html>。

德國之聲中文網。「百年德國漢學 探討昨天和明天」。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7月11日。網址：<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dwworld/20090606/0922330063.html>。

「論昂納克時期民主德國的民族分離主義政策」。線上檢索日期：2009年5月23日。網址：<http://www.lwkoo.cn/Freepaper/Zhengzhi/minzu/200805/10562.html>。

彝族人網。「涼山彝族奴隸制與殷周奴隸制比較研究」。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4月5日。網址：<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2407>。

彝族人網。「黑彝的過去與現在（上）」。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4月5日。網址：<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3351>。

彝學網。「涼山彝族家支與中國奴隸制宗族的比較」。線上檢索日期：2010年4月5日。網址：http://222.210.17.136/mzwz/news/8/z_8_730.html。

附錄：王海訪談逐字稿

受訪人：王海 (Thomas Heberer) (現任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訪談人：洪雅筠

地點：德國杜伊斯堡，王海教授家中。

時間：2009/10/26-27，上午 9:00

備註：以下受訪人王海簡稱為「T」，訪談人簡稱為「筠」。

筠：教授您想先從哪個部分先談起？像是說你想先談你的家庭背景？

T：從小以來…？我的履歷你有看過了嗎？

筠：有的，我有看過。

T：我是 1947 年在德國一個…要作特殊的部分談還是…？

筠：要談詳細一點的。

T：我是 1947 年出生的，在聯邦德國的 Offenbach，在 Hessen 州旁邊的一個工業城市。

T：我父親有一個麵包店，我母親在店裡幫忙，我們家有四個孩子，我最小。我的兩個哥哥，一個是作麵包的，一個是搞經濟管理。我的姐姐是開花店。我 58 年考進中學，我們的教育同中國的不一樣，我們有初中、高中，我們稱基礎學校，

一共四年。九年高中，一共十三年。67 年高中畢業，然後上法蘭克福大學，首先學法律，學三個學期以後，認為我對法律沒興趣，原來是我父親提出來我應該搞法律，如果學法律以後有固定的工作，比較好走。然後 1969 年換到社會人類學，也是在法蘭克福大學。還有哲學。69 年去哥廷根大學繼續學習，繼續社會人類學、哲學，還有政治學。讀了一年，然後搬到緬因茲（Mainz）大學。當時在德國有大學生運動，我參加了大學生運動。

筠：68 年開始的那個大學生運動？

T：對。到 MAINZ 那個大學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幾個朋友包了一個房子，搞了一個集體宿舍，在 Mainz 旁邊的一個小城市。主要組織中學生和學徒工，那邊一個比較大的化學公司，我們組織他們學馬列主義。我 1972 年離開這個地方，去到海德堡大學，主要為了學漢學。原因是我認為學社會人類學，自己應該選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地區，所以我本來 70 年要去印度看一看印度的情況，但是當時我在 Mainz 大學的時候，他沒有現代印度的學科，所以我決定把中國為主。但是在 Mainz 大學沒有漢學，就一個美國人教漢語，但他的漢語不怎麼樣。他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他在美國軍隊，他們委託他學漢語，他的那個聲調不對，但是當時我不知道。但我們覺得他的漢語不怎麼樣，所以我去海德堡大學，去海德堡大學漢學去了一年。

筠：也是 70 年的時候嗎？

T：這是 72 年。海德堡漢學比較保守，主要是古代中國為主、

哲學、文學、歷史。我們那個漢學課堂中只有兩個人，我們兩個也都是 Mainz 大學來的。因為我們的聲調也不對。由老太太，49 年離開中國、先到台灣然後到歐洲。他沒有改變我們的聲調，他老笑我們。因此我們覺得失望，所以我們決定自己學，我們自己向香港訂了錄音帶和課本，自己學了兩年。然後我的博士導師他去布萊梅大學，我們就跟著他去，寫這個博士論文。這是 1977 年畢業的，當時我是一個左派，我加入了西德共產主義聯盟，搞這個活動。我 1977 年畢業以後…不是…我 1975 年第一次去中國，當時是一個學校旅遊團，我們去一個月，當時外國人很少，當時還是文化大革命，那個批林批孔，批林彪、批孔子。所以真正的了解很少，但是我覺得我們比較了解了，他們跟我們說話、介紹那個情況，我們覺得是對的、是正的，我覺得還是很好的。我覺得要真正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的話，必須到那個去待幾年。所以我從 75 年旅遊回來以後，我到那個駐 Bonn 那個中國大使館，去跟他們交流說是不是可以到他們的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工作一段時間。當時我那個博士論文畢業以後，我 77 年再給他們寫了一封信，我說我快畢業了，趕快讓我過來談一談，他們說中國沒有夜生活、沒有很多樣吃的東西、工作也很累在那邊。不過我說沒關係，我還是想去。所以我 1977 年 6 月底去北京，在北京週報當外國專家。

然後我到了中國以後，我發現我在書面資料了解中國的情況跟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住的那個所在是比較隔離的地方，就是那個友誼賓館，北京的友誼賓館，作那個外國專家，大概當時有六百多人都住友誼賓館。有一大批人是各個國家的一些革命份子，比如說有印度尼西亞的

共產黨、馬來西亞共產黨的主席，很多這樣的左派。我跟那個北京週報德文組，30 多個中國人，工作方面的情況，我跟三個中國人分一個辦公室，問他們有關社會問題他們是不允許回答的，比如說我問一個女士，你的兒子在學校怎樣的時候，他就說你去找領導，跟他們談一談。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我還是應該回去，沒意思，晚上出去也沒有餐館，也沒有多樣東西吃。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了解這個社會文化。所以我一共待了四年到 81 年。從 78 年鄧小平被平反以後，慢慢有了變化。原來，那個周恩來有一個文件，替我們講話，他說那個外國專家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那我們百分之十是甚麼人（笑）。但這個講話是重新被發表了，然後我們的情況慢慢的就改變了。原來中國人不允許進友誼賓館，不過願意進友誼賓館必須要有他們單位的介紹信，要不然進不去，這個被取消了。但是那個監督性還是很大，你進來的時候還是要登記，進來三次他就會通知你的單位，說這個人已經三次來友誼賓館找外國人，然後那個單位就要找有關方面的人談一談，了解你為甚麼到那個地方去找外國人。原來很多的人不害怕，特別是有工人、有藝術家他們不害怕，所以我們的朋友也來的多，每個週末我們跟中國人有交流，介紹德國的近況他們介紹他們的情況進行交流，很有意思。

81 年我們離開中國回德國，回德國以後我先有一個研究課題，關於四川涼山少數民族發展政治。我們在四川涼山待兩個月，這是我離開中國以前，當時我的單位北京週報通過國家民委的批准，所以我們到四川涼山去。九月份回德國，我接到了一個課題我寫了一本書，關於那個少數民族政治跟民族地區發展政治。然後到 81 年 82 年，82 年我得到一個翻

譯工作，當時有一個台灣的餐館老闆，有一個黑社會勒索他。有一天晚上有人把他與他的夫人打得很厲害，因為他不懂德語，所以請我當他們的翻譯，一起到警局去報案。警局說這樣的情況在最近在德國很頻繁，已經有六十多個人受害。他們找我當翻譯，所以我大概有一年搞這個工作，到各個地方去給他們翻譯。83 到 85 年去不萊梅海外博物館，也可說是民族博物館，我在這成立一個中國館。管理很多這邊的產品，明代的清代的清以後的，但沒有中國參加，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中國館。這個工作一直到 85 年。

然後 86 年到 88 年，我在不萊梅大學有一個課題，寫那個教授論文，關於那個個體經濟。我 86 年一共六個月、87 年四個月在中國六個城市考察，挨家挨戶訪問那個個體戶。一共是一千五百多戶三千多人。因為原來這樣一個個人情況，長期以來有很窮的人，我沒有遇到各個社會階層的人，了解這樣一個個體經濟，之後我就寫了我的教授論文關於這個個體經濟。86 年我採訪了共產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跟他採訪了四個小時，一部分是他關於個體的私營企業的情況。去年有一個大陸的胡耀邦研究所，他的兒子是名譽所長，他們找我跟我說 86 年我採訪的內容在國內找不到，要我發給他們。他們今年三月份邀請我過去一下，他的兒子在問他的父親對於個體經濟有甚麼觀點，他說這個資料在國內沒有，要我跟他們講一講。他們很高興現在了解他，他支持私營企業和那個個體經濟。87 年我重新去了那六個城市，看一看那一年裡面有甚麼變化，不是把所有個體戶重新採訪還是有調整，每個城市大概採訪有一百多個。

從 88 年到 91 年，我是這裡杜伊斯堡大學的代理教授，教政治學。當時 88 年布萊梅大學在考教授，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德國大學的系統？在德國要當教授還是要通過考試，我們叫做 *habilitation*，這是一個像博士論文一樣但是水平必須更高。然後你是任講師，不是教授，你必須要教書。88 年到 91 年在這裡教授政治學。然後我 91 年被任命為布萊梅科技大學中國經濟學教授。那邊有一個新的學科，叫做是經濟漢學。不僅是漢學，他們還有經濟阿拉伯學等等，經濟日語。我在這待了一年半，然後被任命為特里爾大學政治學東亞政治教授。92 年冬季在那裏開學，93 年搬到特里爾。在特里爾大學待了六年多。98 年被任命為杜伊斯堡大學東亞政治所政治學一樣是東亞政治教授。

因為在特里爾大學沒有很大的東亞研究所，但是在這裡是德國大學當中關於現代東亞方面最大的研究所，就是中國日本包括韓國。我們這裡沒有漢學，就東亞經濟、中國經濟、日本經濟和東亞政治學、東亞社會學和東亞語言社會學，我從 98 年以後一直在這。關於那個課題來說，在 93 年 94 年，我和一個布萊梅大學地理學教授我們一共六個月，考察八個鄉鎮在七個省，所研究的範圍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教育財政，德文的書在 98 年發表的，英文是比較晚的。

然後 96 到 97 年有一個課題是關於私營企業家的社會和政治的作用，我們用社會學方面的戰略性的戰略群體的理論，分析企業家的問題。在中國三個省搞調研，這有德文的也有英文中文的，這是越南和中國，中文的不包括越南在內。但英文的是有越南和中國。然後 99 年到 02 年有一個課題關於知

識分子的概念怎麼換政治，我們在中國大陸包括馬來西亞、越南和日本，在中國北京和上海採訪了大概有六十多個知識分子。這有德文也有英文的，英文的是國際研討會的，德文的是我們自己的有關方面的國際研討會。03 到 04 年我有一個課題主要是關於基層選舉，我分兩個組，一組在農村、一組在城市。我在城市，我們主要考察社區。我們很快就發現居民對選舉不感興趣，總的來說可說這是一個社會學方面在社區作用的一些的分析和研究。那個德文的去年也出來了，英文的和德文的不一樣。《Contemporary China》有一個文章關於社區問題的，還有香港的《China Review》12 月份也有一個文章關於社區的一些分析。同時從 99 年到 02 年有一個大課題是關於四川涼山彝族企業家，本來我曾經講過 81 年我第一次去涼山考察，然後 94 年美國的一個學者 Steven Harrell 可能你不知道的，你搞社會人類學還是？

筠：我學的是政治學。

T：Steven Harrell 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社會人類學教授，他 95 年搞一個國際彝學研討會，因為我從 81 年以後我沒有研究過彝族，我也是研究政治學。他邀請我參加那個會議，因為在國外學彝學的專家很少，大概有四五個外國人，其他的都是大陸的，大部分是彝族的。以後我說我們每兩三年搞一個國際的研討會，我自己 98 年在特里爾大學搞第二次彝族國際研討會，參加的人三十多個，然後我們在特里爾開的時候，有兩個彝族學者他問過我，可不可以搞一個彝族在關於涼山私營企業家的課題，也沒有人研究過，我說這個不太有意思，因為當時有一個彝族成都的人，他有一個報告關於那個涼山

的私營企業家，我說如果分少數民族彝族和漢族的話就沒意思，如果我們搞彝族爲主的一個課題我同意。我在大眾基金會申請經費，中方得到汽車、電腦等設備，還有所有的考察的費用，也可以派彝族的人到這裡來進駐一個月。這個課題是從 99 年到 02 年，一共在十個縣調研，這個對我的研究來說是最累的，最大的問題是喝酒，如果你不喝酒他們就不跟你合作。你去一個部門就要先喝酒，不喝的話就不給數據，這個特別累，以後我身體不好，我夫人說不要再到農村去到城市去。這方面沒有德文的書，有中文的還有英文的。還有一個事情，因爲你搞政治學，本來我主要的是社會人類學。那我寫教授論文的時候，我從中國回來的時候，我在科隆大學教社會人類學的那個教授，我說我要寫一個教授論文，他說要看你的資料，第一他說中國現在不屬於社會人類學，因爲他沒有文字，早期德國有這樣一個觀點，但是現在沒有了。他說這樣你是到另外一個專業了，那麼我去那個政治學，我的論文是政治學的教授論文。但是有一個特點是我用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分析中國的問題。

我搞彝族的課題當中，在美姑縣他們問我可不可以到德國找一些經費搞一個民族學校，因爲我看到他們的一些學校情況很糟糕特別困難，老師孩子們都是很困難的。我在德國籌了二十五萬馬克，在當時算是不少了。我們在美姑搞了一個希望小學，也不容易，以後我發現可能有一部分被貪污了，我很失望，所以以後我不再搞這些，因爲控制不了。然後 03 年 04 年有一個課題，我剛講過是關於選舉，我們在中國三個地方深圳、瀋陽、重慶，搞一共有四個月的那個調研，是跟人民大學合作的一個課題。現在的課題是 08 到 09 年我還

在看能不能夠延長一年，這是關於農村縣和鄉鎮幹部的作用，也是用那個戰略群體的理論分析地方幹部的作用。而怎麼分析呢？我們選擇了一個政治領域，社會主義行動中建制，當中政治部分，幹部有甚麼表現與舉止。我們去年分兩個組，和杜賓根大學一個教授合作，我們去山東一個縣和四川一個縣……

筠：是和 Gunter Schubert 嗎？

T：對對對，我們關係很好，我們長期合作。你認識他嗎？

筠：他有來過我們學校。

T：對，他有一個台灣研究政治中心。

筠：他有跟我們學校談合作。

T：我們周末才剛聚在一起，因為我們在德國有和 Heilmann 教授成立了一個社會學中國研究學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學會，一年一次有開會。從社會角度來分析中國情況，這是研究方面的情況。除了這研究以外，我去年在歐共體有一個 Europe-China Academic Network 有一個 Advisory Board，一共有五個人，包括我在內，以後可能有一個新的機構。

筠：那教授您博士的論文是寫哪一個方面的？

T：關於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有說共產黨主要的政治和方法是用那個群眾路線，我們是兩個人寫的。

筠：那是因為受到 68 年的學生運動影響才寫這個？

T：對。

筠：那像寫這種題目，在當時冷戰的氛圍下，你們國家不會有干預嗎？

T：沒有。因為這是學術上面的，國家不允許也不可能干涉。

筠：因為在我們國家，在那個時候是不允許提到馬列思想的。

T：不干涉，因為完全是學術的研究，所以國家不干涉。

筠：那跟你一起寫博士論文的這位同學，他之後的發展你知道嗎？

T：他原來是我的第一個夫人，他也是搞漢學，但是我們離婚以後，沒有很多來往。他現在是自己翻譯中國文學。

筠：那您當時選擇少數民族研究時，為什麼要選擇彝族？

T：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發現社會屬於共產主義是錯誤的道路，以後 82 年我退黨，這個黨也在 82 年解散了。之後我不再加入任何一個黨，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政治組織的成員，在你的頭腦裡會有一個剪子。怎麼選擇彝族？我到了北京的時候，我在圖書館，因為我搞社會人類學，所以我對少數民族特別有興趣。我在我們外間局的圖書館找一些資料，很少，大部分是 50 年代 60 年代資料。看了那個資料以後，我比較感興趣的一個是彝族、佯族，一個是景頗族。我偶然在圖書館找到一本 50 年代書，是一個英國的記者他寫的，他 57 和 58 年去四川和雲南三個地方，四川涼山，還有佯族和景頗族的地方。看過這本書以後，我覺得我特別的感興趣。因為我也有一些資料，但是他的資料比較豐富。

然後我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我通過我的單位跟他們聯繫

說，我要採訪兩個彝族、兩個景頗族、兩個佤族。他說沒有景頗族，只有兩個彝族、一個佤族。然後我覺得彝族的故事最有意思，然後我決定去那個四川涼山，到那邊去考察。因為當時佤族和景頗族是在緬甸的邊界，他們說不好安排。所以涼山不在邊界，比較好安排，所以也是比較偶然的。但是去了以後，我覺得彝族區特別有意思。因為在 50 年代以來，沒有外人去過那邊看看還是作調研，因此大部分的人沒有見過外國人。因為當時還不是完全開放的，他們不是有信那個薩滿教。你知道嗎？薩滿教。我從資料當作看過那個薩滿真的還存在。當時是一個他們不願意提出來這個問題，我還是說我要採訪兩個薩滿。我的陪同和翻譯，跟我說，那時我是跟我的夫人一塊去的，他們說如果你是中國的朋友的話就不要提出來這個問題，我還是提出來這個問題，以後他們給我準備兩個那個薩滿。之後完全不一樣，以後這個彝族研討會，在 00 年在哈佛大學搞一次，然後兩次在中國，一次在石林縣彝族自治縣，那是 01 年，然後 05 年在美姑縣的國際研討會，在當時這個規模很大。現在那個薩滿還有薩滿協會，有薩滿旅遊、薩滿跳舞甚麼都有。所以這是我挑彝族的主要原因。

筠：那像您剛才說，您去募款，我記得是不是那個 Volkswagen Foundation 贊助的嗎，那當時您是如何讓他們贊助你們的這些活動？

T：不是，德國最大的基金會是這個德國研究基金會（DFG），都是國家的，大部分我的課題是他們支持的，但是那大眾汽車基金會他有主要課題，比如說他們當時有一個課題是經濟

學方面的課題，關於那個亞洲不光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企業家的發展這樣一個重點課題。我打電話跟他們說，我有機會到四川涼山去調研那個彝族企業家的發展，他說這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搞過，但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是他說那你申請吧，不是經濟學家也沒關係，要評價申請書內容的品質，之後他們就批准了。他們的一個優點是因為我說中方是一個四川地方少數民族研究所，他們甚麼都沒有，因為這研究所沒有交通工具要做田野調查很難做，所以項目包括申請一輛汽車、所有設備所有路費他們都提供。他們說要支持地方的研究所，民族研究所是一個地的研究所，沒有資源甚麼都沒有，對他們來說有好處。

最後我們在杜伊斯堡歷史博物館也搞了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彝族展覽會，這也是一個結果。

筠：這也是由 Volkswagen 贊助的嗎？

T：不是不是。我在涼山的時候，我自己蒐集很多老的產品，另外，我在四川的時候，我聽到有一個德國攝影師，他的爺爺從 1911 年到 1914 年他也去過涼山，當時有很多涼山的照片和產品，在柏林和慕尼黑的民族博物館，所以我把這個資料和我的資料放在一塊。另外他的孫女，他去涼山帶照片去問那個地方人這個地方在甚麼地方，之後就有老的圖片跟新的圖片都有，這個很有意思。

筠：所以我比較感興趣的是你在 1968 年參加學生運動，要不要多談一下這部分？

T：當時在法蘭克福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是一個中間的大學，除

了柏林以外，法蘭克福的活動也很多。當時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 Adorno、哈伯瑪斯他們都在法蘭克福，他們是猶太人，二戰以後從美國回來的。他們提出萊德國應該搞社會主義，他們在法蘭克福的影響很大。以後學生開始要搞革命，然後他們就開始反對，然後有衝突。我當時也是 Adorno 的一個學生。他好像是 68 到 69 年去世的。就在法蘭克福開頭，我主動的搞工作是在哥廷根大學。當時我們在社會人類學有自己的學生組織，我們研究社會人類學的歷史和有問題的歷史，比如那個 19 世紀還有 20 世紀初期很多那個德國的社會人類學家他們的這個殖民主義的觀點，我們批評這個，另外一個方面還有帝國主義。還有那個 Wittfogel，Wittfogel 本來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人，是共產黨，也搞漢學。他 30 年代初期的時候寫了一本書，中國經濟社會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這個人然後去美國就完全改變了。50 年代他寫了一本書叫 *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totaler Macht*，然後他說不光是中國，俄國、印度、阿拉伯等國家，他們的水力特殊情況，他們都是獨裁。那本書我覺得不錯，幾年前我又重新評價了他的書，從利弊關係來分析這本書。我們都研究這方面的書，然後我們的教授，他有一個講座，關於那個塔斯馬利亞那個海島，他介紹塔斯馬利亞人的社會情況。我們問他為什麼沒有說塔斯馬尼亞人已經一百多年被幹掉了，然後我們把那個研究所分了，一部分給學生。教授不進去，一部分給他，我們也不允許進去，都沒有課，只有我們自己的課。我覺得這個沒有意思，所以我離開哥廷根大學。然後我去 Mainz，Mainz 也有活動，

學生組織這個社會人類學，我們主要在外面，我們用那個集體宿舍，然後我們搞大學外的政治活動。組織那個學生和學徒工，都是搞這樣的活動。德國學生運動以後分了好幾部分，有一部分是那個社會民主黨要長期搞政治活動，一部分是靠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一部分是少部分的恐怖分子，一部分是靠中國的幾個組織，有三四個組織，都比較小。

筠：你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指導教授對您有何影響？

T：我的博士論文乃啓發於 Charles Bettelheim 的理論，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任教於 Sorbonne University in Paris 並擔任 Centre d'études des modes d'industrialisation 主任。在毛澤東群眾路線的概念影響之下，他發展出一個理論，也就是在特定國家中，發展中的革命黨角色，其群眾路線的重要作用。我的論文便是從這個概念開始展開，並且驗證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群眾路線的發展。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清楚的學術議題，儘管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著手。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也是布萊梅大學法律學教授，Manfred Hinz，他也是支持這個主題的一個左派。因為當時我的觀點還是受馬列影響很大，所以當時他如果沒同意的話，我肯定找另外一個教授搞那個指導工作。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觀點是完全對的，其他的人是完全錯的。我覺得我的博士論文是一個歷史方面的過程的論文，我的論文便是從這個概念開始展開，並且驗證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群眾路線的發展。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個清楚的學術議題，儘管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著手。時至今日，或許會被質疑這種論文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深刻的影響，儘管如此，這在當

時卻是一種潮流。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也是不萊梅大學法律學教授，Manfred Hinz，他也是支持這個主題的一個左派。有時候有學生來找我說，我看過你的博士論文，我說怎麼樣？看當時你怎麼想的，我說當時是當時。當時有不少漢學家，有關他們的情況，所以是這樣子的。

筠：你離開大學以後，如何再增進您的知識與研究呢？

T：我離開大學是在 1977 年，我離開海德堡大學以後，寫博士論文是比較自由的。除了導師以外沒人管你，也有一個獎學金。所以一部分搞大學外的政治活動，一部分寫博士論文。

筠：那可以談談您在杜伊斯堡大學這邊的研究團隊，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嗎？

T：我們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還是？

筠：整個 team。

T：這個很大，我們有六個教授，一個搞中國經濟，一個搞日本經濟，一個搞東亞社會學，一個搞東亞地理學，一個搞東亞語言社會學，還有大概三十多個工作人員。我們最記得到德國最高級的博士生項目，德國研究基金會給我們幾百多萬，每一年可以，這是國際方面的，英語的不是德語的，每一年可以接收五個人，日本和中國方面的社會科學。我自己有兩個助手，一個搞日本政治，一個搞中國政治。現在中國政治這個位子空著，因為這個助手剛走了。他突破他的博士學位，現在到瑞典去了。現在我還在找人。另外有一個課題當中，也有一個位子，是一個人他寫他的博士論文，關於中國大陸的土地問題，土地和權力這個問題。

筠：那麼在德國的漢學研究，他們所設計的課程或所選擇的教材你有甚麼看法？

T：關於德國的研究，德國應該分清楚大部分的人是在搞漢學，大概有一半的人他說德國的人口來說，漢學教授最多。我們大概有三十幾個人。另外這幾年出來了新的方面的教授，比如說政治學方面我們有五個位子，在德國，經濟學中國經濟方面我們有兩個位子，社會學只有一個，地理學有一個。所以我們跟其他的漢學研究所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是現代為主和社會科學為主，比如說我的位子是在政治學研究所，搞東亞社會學他的位子就在社會學研究所，搞日本和中國經濟的，他們的位子就在經濟學研究所。但我們還是在一個地方，我們聚在一塊。這是一個跟其他的大學很大的區別。我們說如果離開我們的專業，比如說我離開我的政治學，就跟研究東亞方面的學者在一塊，這會影響我們的發展，所以我們的觀念還是我們的位子應該要在我們的專業。

筠：所以您認為現代中國應該跟傳統漢學分開嗎？

T：是分開的。

筠：可是這樣子的話，不會想說當我們要了解中國學的時候一定會讀到他們過去的文化歷史等等的。

T：那當然有，但是我們的主題不是文化和歷史，我們也有課，比如中國的政治文化這方面。中國的政治歷史是從 19 世紀開始，不是那個古代的歷史，因為我們沒那麼多人，也沒那麼多時間，我們只有 MA 還沒有 BA，明年才開始有。所以時間不夠。因為在一方面他們學理論，學方法論，這是跟漢

學不一樣的，他們沒有理論也沒有方法論。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很重要，學方法論學政治理論。

筠：那就方法論而言，以你們研究所為例，走的也是 Fairbank 的 program 嗎？

T：沒有。我們是另外一種方式。我們的方法論是政治學社會學方法論。在一方面是定型和定量的。因為我本人經常出去搞調研田野調查，而我的博士生也是，大部分都要出去搞調研、調查。這是我在這裡的一個特點。這一方面我覺得我影響也不少，德國的東亞政治和漢學的一些學者。原來那個 Schubert 在國內沒有搞調研，以後他找我說我們合作這一方面，一塊到農村去搞調研。因為他們覺得說你真正想了解中國發展那個現代的情況來說，你必須到下面去搞調研，要不然你不了解。就跟你光到北京上海去，這跟西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很多人他們去一個星期，到中國的北京上海，我認為你必須到最貧困的地方去，不要待一天，待幾個星期，慢慢的就了解中國真正的情況。這是我的一個哲學。

筠：那是不是就會牽扯到之後還要做追蹤這類問題？

T：主要我是訂兩個定型的方法論，連在一起。然而我在涼山的時候，最後一個縣我們有發生了一個問題。因為當時我們去統計局，統計局局長他打電話給安全局，然後安全局的人就過來。這個中方的民族研究所在涼山他沒有作申請，所以這個課題他沒有報達到上級，沒有報達到公安局。因為在大陸他有一個規定，如果你發這個問卷，必須通過安全部批准。我根本不知道，然後他把我們扔出去，然後警察就找我，審

查我，所以以後我決定就不用問卷了，就那個定型的方法論，而是那個 strategy interview，腦裡有一個知道要問甚麼的，甚麼問題這樣分析一個情況。

T：我覺得這是一部分。我覺得在大陸主要的一個部分是需要比較有權力的一個合作夥伴，找一個大學是不夠的，因為大學在全國是沒有權力給你安排組織一個工作。那個社群研究來說是不同，因為在涼山以後我在人民大學有一個搞社會學的教授，他很會講很會發展關係。我們通過他的一個博士生還有一個博士生的父母，自己連繫到下面去考察，他很注意到不要發問卷，另外不要對外報導。有時候我碰到一個記者要採訪我，我說不可以我不要。因為外面知道的話會發生問題。通過這個知道，我們在社區方面，去的時候他問你來幾天，我說來兩三天，他說兩三天是吧，還不夠。我們大概有一個星期，他說也不夠。因為他們習慣了問都不問就發展關係。關係好的話，跟那個居民聯會他甚麼都跟你安排。他也不問你甚麼時候走，他喜歡你跟你關係好，一班的這種作法我覺得在社區方面是最理想的。沒有通過官員安排，我旁邊沒有官員，我完全是自由的。因為有那個居民聯會，透過這層關係，他們跟當地講，有一個人民大學長期訪問的教授，說我是人民大學的，人們就不懷疑，這麼一個情況。

筠：教授您有提到說，您從法律跳到社會人類學，那時候您怎麼會突然對社會人類學有興趣？

T：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我有一個表弟，他從軍隊回來，開始在法蘭克福上大學。我跟他談一談說，我本來對法律就不太感興趣。他說他自己現在學社會人類學，他說你去一趟

跟他們商量一下。然後我去那個研究所，他說現在你來，我們一共七個人。他說我們很放鬆，有時候在教授家裡談學術方面的問題喝喝葡萄酒作交流。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另外還有百分之一的博士生在國外不回來，留在他們的部落，我覺得這個有意思。是這麼一個情況。然後學生運動的時候，我覺得搞社會人類學的人，最好去發展中國家參加游擊隊，這麼一個觀點。

筠：所以您對中國感興趣並不是從小就開始的囉？

T：從小就開始了。我小的時候，我母親送給我很多的地理方面的一些書。Karl May 一個德國人，19 世紀的時候寫了六十多本書，都是關於到國外去的旅遊冒險。但這些都不是他自己虛構的。他在德國很有名，但在國外不一定。以後我看一看哪個地區我比較感興趣，在當時還是小孩的時候我覺得，對東亞洲、中國這些地方興趣最多。

筠：所以您那個時候就一直想要做中國的東西了？

T：對。

筠：那父母也是支持的嗎？

T：不是。我的母親無所謂，但是我的父親不支持。他說這個我學民族學沒有希望，這個找不到工作。因為他覺得最好當官員、國家的工作人員，學法律以後當法官就能把工作問題解決了。以後我改到社會人類學，但是主要我參加學生運動的時候，他氣死了，之後我們的關係一直不好。

筠：那麼您去中國的時候，那個時候他們不是跟東德的關係比較好，那身為西德學者的您？

T：不是。那時候中國跟東德的關係並不好，因為不是從 60 年代初期以來，俄國和東歐那些華沙條約的國家的關係特別不好。所以他們比我們還不受歡迎。這個問題不大。另外當時這個工作的條件很差，我們暖氣很少，只有 11 月份到 2 月份有暖氣，要不然辦公室裡面特別冷。我們在北京周報有兩個德國人，一個原來我不認識的，也是一個左派。那我們到的時候我們要求，說那個中國人的工資只有四十塊錢，就是一個月四十元人民幣。而我們有五百，我說我們不同意有五百，我們要四十。以後領導給我們做工作，說為什麼不行，他說有規定，另外你們會受不了，因為妳們在友誼賓館的價格也高。以後我們也同意了，因為我們也不好意思，每個星期領導到辦公室來給那些同事四十塊錢，給我們五百，我感到不好意思。

筠：明年呢？明年有考慮到我們學校看看嗎？因為我們石老師跟你的關係也不錯，希望您能夠來看看。

T：會。我們關係很好。我 06 年在長春開會，他和我還有另一個吉林大學的在一塊待了幾天。他也來過我們這裡開會，開國際研討會。

筠：他好像是去海德堡是不是。

T：對。

筠：Gunter Schubert 他來台灣談 ERCCT 的。

T：Gunter Schubert 他本來是在台灣留學的，他原來主要研究台灣問題。

筠：那您和 Prof. Gunter Schubert 是怎麼認識的？

T：我們經常開會，因為搞那個中國政治研究，我們都關係比較好。另一方面我剛講過，我們那個社會科學那個研究中國問題協會。另外我們剛被批准了德國科研部有一個德國 Competence Network “Governing in China” 五個人：Gunter Schubert (University of Tuebingen)、Sebastian Heilmann (University of Trier)、Björn Alpermann (University of Wuerzburg)、Heike Holbig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和我。我們這個周末剛在法蘭克福開會。組織安排我們統一的課題。另外在德國的漢學，他們有自己的學會，漢學學會，但是搞社會學搞社會科學的人，我們在亞洲研究學會，這個規模比較大，Schubert 在那個學會，我也是。

筠：所以在德國，漢學和現代中國學界線分的很清楚？

T：對。

筠：那你曾經指導過哪些論文主題？你所指導的學生所作的題目都是跟中國相關的嗎？

T：不一定。因為在德國國際關係和政治學是不分開的，所以我有很多博士生的論文是關於國際關係的。我有兩個博士生的論文是關於日本的國際關係的，有的時候也有關於韓國的國際關係。碩士論文有的關於東南亞的也有，有的是政治學，有的同時在政治學，有的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也有，但大部分是關於中國。

筠：那在你們所上有必須要修漢語課程嗎？

T：對。我們東亞研究所的 MA 都要學漢語。

筠：那有必須要通過漢語的檢測才能畢業嗎？

T：對。

筠：所以有人會用漢語寫論文嗎？還是大部分都是用德文寫？

T：沒有。英文的，因為我們 MA Program 是英文的，所以都是以英文寫得較多。我們從明年有一個 BA 是德文的，但 MA 是英文的。另外我在，比如說我的課一半是在政治學，我們有一個 M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他沒有包括一個地區的一部分，一個是東亞洲，一個是非洲，一個是歐洲，這方面我有講課。我們有一種課，在冬季的時候，學生必須到大學外面的部門，給他們提供諮詢。我們去年有德國的環保部。環保部他提出來六個問題，學生應該給他們一些諮詢，建議他們在這方面應該怎麼辦。他們派人到課裡面介紹交流，然後學生分組。他們一個學期在我的指導下，搞好這個回答這個問題。然後我們今年 2 月初去到這個環保部，去介紹一下這個情況。然後有書面資料給他們，現在有一個伯爾基金會，現在在跟學生談這個題目的內容。主要不是搞東亞學的學生。

筠：那您的學生畢業後的發展，也都是從事和論文相關的研究嗎？

T：現在大部分的學生不願意在大學工作，他們在各方面，經濟部門，大部分在中國工作。不光是在政治方面，在經濟方面，在基金會方面，在國際組織方面都有。現在為止要找工作好找。

筠：所以現在漢學在中國學方面在德國算是流行的？

T：對，是流行的。

筠：那也是因為中國的崛起影響的嗎？

T：對。現在問很多學生為什麼學這個東亞學，很多學生說因為他們的父親說現在東亞很重要，特別是中國。因為學日本學的比學中國學的少，因為中國很大，更重要。另外，我覺得中國的變化很快，很大，有意思。日本沒甚麼大變化。

筠：那為什麼沒有想要比較台灣跟中國大陸？

T：這也有。

筠：因為就我們的感覺，大陸現在的發展，就好像是我們台灣60、70年代的時候，他們的模式跟我們的模式很像，那我們想說，他們會不會也像我們一樣，發展到一種程度以後就發展不下去了，經濟就停滯了。那大陸要是到時候走到這一步了，那他們該怎麼辦？

T：我們課堂中，台灣也有作用。比如說我跟我的一個助手，他本來也是台灣留學的，他也有課關於民主化、民主的過程，從台灣韓國。不能說沒有，部是主要部分。課堂中應該討論台灣那條道路，這很重要的。但我認為，台灣當中，對大陸而言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榜樣。因為台灣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海島。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太複雜了，各個地方都不一樣。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我說中國有一千多個中國，人家說一國兩制，我說在中國有一國一千制。各個地方都不一樣，你去一個縣一個鄉鎮就覺得全中

國都是這樣子，那是一個不對的一個結論。因為你去另外一個縣的情況又完全不一樣，各個地方不一樣，這個國家太複雜了，不好了解。所以有的時候我說在中國很多人有很多影響德國反對中國，我說不是這個意思，他們不了解，不是反對，是不了解。因為要了解中國各個地方的情況太難了。所以我自己有這種哲學，每一年去看看，一年不去的話我就已經不了解了。因為每一年有變化，我們去年查到了，我們去年和今年去同一兩個縣，今年比去年情況又變化更大，還是不一樣，這個有意思。在一方面，不過老有變化的話也有意思。如果沒有變化，像日本變化少，我覺得五年去一次就夠了。

筠：我覺得這會不會是因為中國仍處於開發中的國家，有很多地方還沒有開發？所以一直在變化中，然後像日本、德國、台灣這些，都已經開發好久了，所以就一直停滯在那邊，不知道怎麼往前走。所以這次遇到金融風暴之後大家就被嚇到了。

T：我認為，我願意了解現在中國的過程，應該讀一下那個 Samuel Huntington 的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這本書介紹的過程，在中國大部分都有。因為如果你長期在中國，你就會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希望。很多知識分子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回德國以後，看一些比較籠統的資料，就知道這是一種過程。那 Huntington 就說如果國家有一個很大的轉換，貪污腐敗還有鬧事的都有，因為人不滿意，不了解，有價值觀的變化。所以我覺得看了 Huntington 以後，我更了解這個過程。因為我現在研究中國問題四十多年，剛開始很

多人說中國很快就會倒台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不過從我那個時候到中國工作到現在，整個變化非常大。所以到現在為止，我覺得不會很快就垮台。

筠：那是不是因為現在他們的經濟還有辦法維持住？

T：不光是一個經濟的問題，我覺得現在一個主要的部分，是因為大部分的中國人害怕如果有政治制度的變化，不知道以後情況如何。因為那個文化大革命那個階段，對大部份的人還是一個教訓，一個很不好的經驗。就怕以後再亂的話，中國的情況會如何。有可能以後在中國有一個軍法的制度，這有可能，如果太亂的話，現在那個前途都很難說。這次我在中國的時候，有這個環球時報發一個電子郵件說，我應該寫一篇文章叫作「中國以後六十年情況如何」。以後我回答，你找一個算命的，不要找一個學者。因為這是不可想像的，六十年以後的中國如何，現在很難說，因為政治制度是一種危機，政治制度怎麼發展，現在說不清楚。

筠：那您要不要細談一下，您在中國研究方面的 program，還有你的 research methodology。

T：原來我講過，我把那個定型定量的方法放在一起，但以後我發現發問卷是比較麻煩的事情。現在主要是定型的一些方法論，我自己有一個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我自己考慮一下問甚麼呢，有一個結構性的採訪。光採訪人也不夠，因為不光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地方幹部很多事情不告訴你，所以有很多一些非政治的政治，所以我看很多的資料，另外跟學者談一談。這個關於地方幹部的作用，我偶然的找

到一本書。關於縣地區的地方幹部的工作，這是鄭州大學一位女士寫的，他很詳細的介紹黨委書記怎麼回答，怎麼談他自己的情況，還有這個農村的賄選情況，都有很詳細的介紹一下。之後我給他發一個電子郵件，我看過你一本書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們可不可以合作，然後我在青島的時候他過來，談一談。這是很重要，你看資料，知道其他學者有甚麼經驗，特別在農村方面，大陸有很多學者他有比較詳細和具體的介紹一些非政治的一些情況。比如說貪污腐敗我查不出來，不過另外一個學者也查不出來，所以你要是有個人的關係的話，還是你的家鄉，這個資料就會不一樣，但我們在這個方面有侷限。

筠：所以像我看到很多關於中國研究的，他們好像都是循著 Fairbank 他所提出來的 program 在走，所以我想要了解教授你的，你自己的研究方法跟 Fairbank 有甚麼不一樣？就是他認為應該要融合漢語教學等等的和田野調查來做中國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中國。

T：Fairbank 是搞歷史學，和我們不一樣。歷史學第一方面不是很敏感的，因為研究過去的事情，這個問題不大。但我們研究政治方面的問題，有的時候是民族方面的問題，都是敏感的，民族是敏感的，政治也是敏感的。所以平時我們不說我們搞政治，而是說我們搞社會。平時我說我想知道農村的發展，所以他們地方幹部會接受，如果我說我想知道地方幹部的表現和舉止，那當然他們就會害怕了不知道我幹甚麼的。所以我們情況不一樣，第一方面你應該採訪不同的人，另外你要跟他們發關係。如果你去七天，但是大陸的學者只去兩

三天就走了，因為他們受不了。那我們一般都去個幾個星期，跟他們地方的陪同或者是幹部慢慢的交流、吃飯、喝點酒培養關係，慢慢的談就發展信任，然後他們就會告訴你一些情況和事情，這是一個。另外我的那個中國的合作夥伴主要是有權力的機構，我們現在大概有十年跟那個中國政治經濟研究中心合作，俞可平，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這個名字？他是中國最有名的一個學者，幹政治學的。他們給我們安排地點，那他們找自己有關係的地點，不過沒有任何人，人也不接待你。所以你需要一些地方的關係，大學平時在本城裡面有，但城外他沒有。所以我需要在中央有一個比較專業的合作夥伴，這是方法論的一部分。另外必須懂中文，如果外國人不懂中文，那他就真的不可了解這個情況。因為找翻譯，有些比較敏感的他就不翻譯，他會自己考慮和有條件式的給你翻譯。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自己讀中文。

有的地方我們也有困難，你去浙江的農村不同話也不管用，他們說地方話，到湖南，你從北京來的陪同也不一定聽的懂。我們有地方的一些學者，他給你記錄，把中文資料給你，如果你有一部分沒完全聽懂的話，可以看那個資料，這也是方法論的一部分。另外，如果你到下面去搞調研，你必須咬已經了解全國的一些情況，在這方面有甚麼問題。比如說你考察那個農村的選舉，如果你甚麼都不知道，你可能從農村回來會覺得沒有甚麼問題，非常好，都是很民主的。但是如果你看中國其他別的地方的資料，你更了解有甚麼問題。現在我們的觀點是農村選舉基本上是失敗的，因為賄選，農民根本沒有興趣參加選舉。這個你應該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不可以問這個問題，是不是。因為你應該很清楚到下面去，

不光是一個外國人，還是一個中國人還是上級他們都給你介紹這個理想的情況。通過自己看一看，你在採訪的時候，你在你聽到的，能信任你聽到的，就可以慢慢的了解有關方面的問題。比如說我們今年 2、3 月份就有一個課題關於農村環保資歷。在一個縣裡，他們說沒有一個村莊有垃圾箱。我們說能不能夠看一個，我們開車開了一個多小時，就去一個村落看一個垃圾箱。那如果每一個村都有的話，我們五分鐘就可以看到了。開一個小時，就在一個村有，別的村沒有。但是我們去的那個村還是一蹋糊塗，垃圾在垃圾箱旁邊。所以一方面看一看，一方面作一些非正式的交流談話，一方面別的地方的資料也是很重要。

筠：所以你說到要跟他們打關係，那是不是多少都要送禮？

T：不用。可能你中國人的話要，但是對我們沒有這個要求。因為大部分地區來外國人的話，老給你照相，可以表演、宣傳，你看我們去的地方，我看網路上播放照片在網路上，某一個外國人到這裡來考察工作，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好事。那外國人為什麼來呢？那肯定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榜樣，我們是很理想的工作，他們利用你搞宣傳，不用送禮。但是，不是對我們，對中方那個安排工作，是對他們有要求，對我們沒有。我也拒絕，我知道有些外國的學者採訪會給他們錢，每一個採訪的人給他們五十塊錢一百塊錢，但這個我拒絕。因為如果你給錢的話，以後不知道他們要說些甚麼來騙你。我搞社會人類學的時候，我的老師他說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社會人類學有一個印第安納的部落，那個部落他們自己考量說明年有一個美國學者要來，他給我們那麼多錢，我們要怎麼

跟他講，就是在考慮他要聽甚麼，他們就要跟他說甚麼。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應該要拒絕。

筠：那像您的資金方面，除了 DFG, Foundation 跟 Volkswagen Foundation 以外，中方有沒有提供甚麼研究資金給你？

T：中方不給。可能將來有，現在還沒有，不過將來有的話，裡面還是會有很多問題。如果中方給錢的話，他也有他的要求。他的要求不一定是學術方面的要求，很多政治方面的要求。所以最好在這裡找錢。到目前為止 DFG, Volkswagen Foundation 在中方這邊所需路費、經費，他們德方全部都提供，這個以後可能會改變。以後他們可能會要求中方出中方的路費和經費，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這個情況。

筠：除了涼山這個事件以外，還有沒有其他令你印象深刻的？

T：還有我最討厭的是喝酒，我年輕的時候問題還沒那麼大，但年紀大了，老追你喝酒，有時候我就會發牢騷，雖說這不應該，但是原來我是最年輕的，但是現在我是年紀最大的，其他全部比我年輕。他們老催我喝酒，但我不願意喝，我幾次發牢騷。當然這對研究不好，有人因此就生氣。我覺得這是在研究方面最大的問題。特別是在農村的喝酒，你不喝的話，他會認為你看不起他。所以不管你覺得舒不舒服，病了或是沒病，都必須要喝酒。我覺得這個對研究來說是一個障礙。另外一方面，我可以理解。因為這次在四川的時候有一個局長，他不是對我，他對在座的其他人說我最害怕在吃飯的時候不喝酒，氣氛不好。因為我們三個人開始的時候我不願意喝酒，我和北京的陪同和博士生都不願意喝酒，他們嚇死了，

之後我們說好，然後就慢慢的喝一杯。但他們說氣氛不好的話以後跟他們合作也不很好，他不願意跟你合作，不過你跟他們喝酒，第二天他們的態度就不一樣了。有的時候爲了研究學術方面的結果，你必須要跟他們喝酒，這是我覺得的一個難點。

吃飯也是一個問題，因爲老吃飯，中國的晚餐我們也受不了，你吃的少他們就會覺得你不喜歡。不舒服，你老必須吃。我們在山東的時候，比如說氣氛不好，今年在中國的氣氛就很緊張，因爲有國慶節和新疆的事情。所以很多部門不一定願意接待，也不願意給你一些訊息和數據。我跟我的那個陪同說，我很不滿意，因爲什麼都不給，以後他覺得他們在北京的那個研究所副所長比較熟悉，他發一個電子郵件說希望跟北京這方面的合作。電子郵件以後，他馬上來電話說你們在哪？我說我們在一個縣。說馬上下去，他說所有的資料都安排好了。以後馬上有變化，不過如果沒有這種情況的話，有的時候你的調研就算是失敗的。你需要有關單位的一些關係，這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還是關係還有一個了解的問題，我覺得方法論是一部分，光有方法論，沒有關係也不好辦。

筠：所以你因此寫了一些文章關於中國的「關係」。

T：對。這個怎麼發展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論。一方面如果你不懂中文的話，你跟中國人的感情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從早以來學了不少成語，就是古代的一些說話。他們聽這個就會覺得，「唉呦～這外國人真了解中國」，這很有意思。以後真個信任就更好，就跟他交流，他們應該就知道應該了

解你跟中國這方面很熟悉。我們的陪同原來也是學政治學的一個博士，他也比較了解。他說有的時候會跟他們說這個人也是共產黨，他們就會覺得這也是我們的人，這樣一來他們又更信任了。原來採訪胡耀邦四個多小時，他一方面覺得這樣的人可以信任。所以這個關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怎麼搞關係是方法論的一部分。

筠：剛剛您有談到在山東的氣氛較緊張，是因為新疆動亂的關係。那麼您要不要談談新疆動亂和西藏問題？

T：我在地方我根本不談政治問題，因為你開始談政治的問題他們完全不了解你的觀點。所以這個方面的問題我在德國談，我會跟學者談一談，但是在地方幹部我不談這個問題。

筠：那這次的新疆動亂，漢族和維吾爾族的衝突是不是中國的政策錯誤所導致的？

T：我覺得在一個方面是社會問題。因為不光是在新疆，在少數民族地區，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少數民族的收入方面、找工作方面都是被歧視的。另外一方面，很多少數民族認為從 50 年代以來進來的漢族太多了。原來的新疆在 40 年代的時候 48 到 49 年的時候，這個少數民族百分之九十多，現在少數民族大概有百分之五十五，漢族百分之四十五。他們在這方面不滿意。另外一方面是資源，中央把資源拿走，但是地方新疆西藏沒甚麼好處，我覺得這個民族問題是一個國內的問題，不是國際的問題，因為中央老說西藏是達賴喇嘛，在新疆是熱比婭都是從國外來的。這個跟學者好談。

就像毛澤東說的，你分析一個矛盾，應該先分析矛盾的內因，

後來分析矛盾的外因。我覺得新疆和去年的西藏問題還是不一樣，那學者還是討論這個問題，不是個別的情況、不是達賴喇嘛的情況，是跟國內的民族政治有關係。我相信在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的自治是一種軟的範疇。的確，是有一個自治法，但是，卻沒有一個憲法法庭，也沒有行政法庭。因此，這個法律很難被執行。所以我們明年在伯爾基金會跟中央編譯局說好了明年 3 月份搞一個研討會，關於民族政治，關於自治問題。他們邀請我去，這樣一個學術方面，我可以說我自己的觀點。

筠：達賴喇嘛總有一天也是會過世，那您覺得西藏問題會不會隨著達賴喇嘛的過世而落幕？

T：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好解決。因為一方面中央不需要解決，沒有很大的壓力，國外的壓力也少，因為德國的總理接待達賴喇嘛，不是為了國際的原因，而是為了德國國內的原因。這根本不感興趣，接待達賴喇嘛也不解決甚麼問題。所以總的來說國外的壓力小，那國內根本沒有壓力。因為大陸的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認為西藏從早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給他們那麼多的資金和經費還不滿意，這是大部分人的觀點。這是主要的問題，國內國外壓力小，不用解決這個問題。達賴喇嘛去世以後，有兩個，一個是國內的，一個是國外的。

不知道你有看過嗎，我去年翻譯過發表的〈怎麼挑選活佛的條例〉，你看過嗎？中央回到乾隆的一個條例，不過把三四個名字條子放在花瓶裡面，中央派一個人參加，然後西藏人自己拿出來一個條子，這樣選出達賴喇嘛跟班禪喇嘛。這樣表現中央代表在的時候還是中央說了算，最後中央決定說好

我們同意。所以達賴喇嘛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是從早以來說這個自治要包括所有的歷史方面的藏族的地區，藏族的地區是中國領土的四方之一，這個中央根本不可能同意，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此外，我認為達賴喇嘛沒有與中國政府溝通北京方面的構想，便宣布已故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的決定，北京當局認為這是對抗中央的行為。這個結果導致北京勸西藏僧侶再去尋找一個新的轉世靈童。後來找到的這位最終獲得中國政府的背書成為新的班禪喇嘛。在這方面梵諦岡就較為靈活點，其接受中國政府所指定的中國主教的決定。最後，中國政府所做的指定再由教宗作確認。打從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皇帝以及後來的國民黨政府到今日的共產黨都是要求西藏最高的權貴要經過中國中央政府的背書。這在現在的情況當中，可能是比較靈活的一個辦法。

筠：那我們剛才一直談到都是你跟中國政府的關係，那你在這邊跟德國政府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T：因為我不是某一黨的黨員，我跟所有的黨都可以合作，這是一個好處。平時我有的時候比較尖銳提意見，比如說我們 07 年那個基督教民主黨在議會有一個聯邦議院黨團的亞洲戰略題綱“council paper”，這個觀點是應該外交政治應概有個價值，應該跟民主的國家合作，日本和印度，應該反對權威型的國家，權威型國家的模式我們應該反對。我很早提意見說，這樣的外交政策對德國沒有利。因為如果你說你要鼓勵中國，我們要跟日本印度這類民主型國家合作，那對亞洲關係的發展不是很好。我批評他，現在這個事項已經取消淘汰了。這個我提意見，因為如果有不對的話我會提意見。因為我自

己認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任務，如果你覺得有一個國家的政策錯誤的話你會提意見。有時候我的意見或我的觀點也不對，這也可能，但還是應該提意見。但是兩個星期以後，我們的州長他派一個代表團到中國去，他州政府的辦公廳讓我參加這個代表團，他們還是希望有關方面的人。

筠：這次德國大選的結果會對於您以後的研究有甚麼影響嗎？或者是他們對於中國的政策有甚麼影響？

T：他們主要的結論是要跟中國、日本和印度合作，還是應該支持亞洲國家的公民社會參與的發展，這個很好，我支持。這個應該這樣做。歐共體也有這個觀點，在中國應該發展一些公民社會的結構，這個應該支持。但是我懷疑是否管用，沒那麼容易，沒那麼簡單。因為在中國在對參與的觀念，對歐洲，對台灣的，是不一樣的。參與是應該限制參與，共產黨領導的參與，不是自己自由的參與，所以這方面我還是有疑問。

筠：那麼德國政府會因為現在中國話題熱門，因此增加大學系所的經費嗎？

T：那不一定。因為去年德國的科技部，有一個新的項目支持新的研究，不光是對中國，包括非洲和南美還有東歐都包括在內。但是如果你搞中國研究的話，在各個基金會找經費是比較容易的。可以這樣說，沒有增加，但還是有一種中國研究熱，在有的基金會裡。不過你有一個好的項目的話，比如說環保是一個熱點，還是公民社會是一個熱點，不光在德國，也在歐共體，需要經費很好找。

筠：所以你的學生所學的漢語是簡體字還是繁體字？還是說兩者都有？

T：簡體字。我本來學過是繁體字，但現在是簡體字，因為課本是從大陸帶回來的。這方面跟博士在德國交流協會的一些，聘那個學生到東亞所去的委員會的委員，我發現這幾年去台灣留學的學生越來越多，這有意思。我去年提出來這個問題是甚麼原因，有的覺得在台灣學漢語比在大陸學漢語有效，這個很可能。有的大學大部分的學生去台灣，不是去大陸，這個有意思。

筠：因為有些人說只有繁體字才能真正表現出中國文化。

T：現在學漢學的大學有的還是學繁體字。

筠：那我們來談談您那一本涼山彝族那本書，我看了以後我發現裡面你有提到涼山彝族有一種排他性，他們對自己人比較好，你對這點有甚麼看法？

T：彝族大的問題是認同意識的問題。因為從歷史方面，他們分家族，家族是主要的，民族是次要的，主要問題是哪個家族，不是哪個民族。這個家族性影響他們的認同意識。但是我覺得 49 年以後有點變化，因為彝族總的來說是一個人少的一個範疇，49 年以前沒有彝族，只有諾魯族還是薩尼族一共六十多個民族，以後才被劃分為一個彝族。很多人說是毛澤東提出來的，但很難說是從哪出來的。但原來彝族沒有彝族，是一個人造的範疇。因為在現在成為了一個民族，所以有的時候認同意識是增加的。但是對涼山的彝族和雲南貴州的彝族還是不一樣的。在雲南和貴州有不少是被同化的，在涼山

大部分的彝族還會說彝語，這可能是不同的情況。但那個家族還是家族為主，所以我的觀點是，是否通過私營企業家的發展，家族的觀點被弱勢了，然後民族的觀點被加強了，是這麼一個觀點。我覺得是被加強了。因為現在企業家和企業家跨家族，有來往也有關係，有交流。現在很多彝族的幹部，他們一同在黨校，省的黨校，所以他們的認同意識是黨內的認同意識，我們都是黨院的，他們不談家族，所以那個家族就慢慢的…。另外是那個遷移的農民工，這也是薄弱家族，民族性被加強了，家族性被削弱了。

另外一方面我介紹了那個家族協會，有關方面的人說不管你在北京成都哪個地方，你是我們的家族，我們需要幫助，比如說在成都去需要幫忙我們找你，你有一個主任在那邊，應該接待我們幫助我們找工作，還有找房子也要幫忙。有這麼一個情況，可說是現代的家族，保留了一些歷史的作用。因為那個家族的社會作用是互相幫忙的，不存在社會福利體系方面，家族的成員會互相幫忙。現在主要在經濟方面他們互相幫忙，舉例來說，有一間小工廠製造某一個產品，然後另外一個部分，他有一個運輸公司把這個產品送到省會。第三個部分他們在省會有商店，他們賣掉這個產品，都是一個家族。這可說是一個家族的現代化，或者是家族的現代功能作用。現在，我們面臨了一個矛盾的情況：一方面家支以一個社會組織的型態繼續運作著，提供社會安全、彼此相互支援以及個人認同；另一方面，根據許多企業家的觀點，家支系統仍然妨礙（或限制）涼山彝族之間一個共有的族群意識的形成。直至今日，家支利益仍然優先於以彝族做為一個民族的利益。

我的論點是經由新一波的企業家，一個超越家支的意識正在形成，至少在最初的階段。隨著經過社會變遷與社會經濟化所產生的道德經濟的不穩定，認同意識變得破碎。與此趨勢平行的，家支發展成有點像是家支價值協會的形式。在一個案例中，一位企業家讓這樣子的協會進入生活中，而該協會必須包含一些在州縣，甚至省級擔任官員的家支成員。他說明，像這類的協會已經顯示出在家支中的義務比起對黨是更具約束力的。最重要的是，他強調這些關係要基於平等，也就是所有家支成員都要具有平等的權利。這指出經由企業家的概念，使得家支團結有越趨減弱的傾向。後者同時提供經濟選擇，這個選擇能夠幫助消除不安全感，假使並盡其所能的經由這種方式，經濟發展將受到推動，工作機會增加以及民族企業的自信也就跟著增加。企業家社會意識層次的形成將能夠照顧到社會義務，而這些義務是家支越來越無法見著的。經由這些新企業家，一個超越家支的意識正在發展中。另一部分，我的研究證明了一點，至少在許多涼山彝族企業家的想法中，家支逐漸地不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多數人不將支持家支視為一個生活目標，而且只有相對低百分比的人表示想要去支持家支，至少在口頭上是如此。多達三分之一的人明確經歷了這些負擔，而這些負擔是藉由社會組織而產生，並且當作彝族企業家落後的理由。

筠：那他們的所有的活動都在家族中，這樣會不會導致他們沒有甚麼競爭力？假如把他們的家族拿去跟中國其他人像漢人來做比較，那他們的競爭力是不是就較小？

T：有競爭。但是這個競爭不光是對彝族的企業家，主要是跟漢

族的。因為他們的規模有限，一般的彝族企業他們的市場是某一個縣或鄉鎮的市場，很少超過縣或鄉鎮的市場。漢族的有不少的比較大，涼山的勞動力便宜，在涼山生產，然後把商品運到別的地方銷售，所以競爭大。那現在來說，我感興趣的觀點是彝族企業家如何改變彝族的社會結構和觀點，因為我發現彝族的企業家對漢族企業家主要的不同，是漢族不用把家族考慮進去，但彝族不一樣，我們有家族親戚和朋友，所以我們有道德，漢族的企業家沒有道德。另外有採訪涼山彝族企業家，他們說到願意發展他們的故鄉涼山，這是一個很大的動力，外面漢族的企業家沒有這個動力。另外彝族企業家主要雇用彝族，漢族的企業家主要雇用漢族。因為我剛講過民族問題也是一種社會問題，如果少數民族找不到工作的話他們會不滿意，很多年輕人離開家鄉去省會，東部的大城市，因為這邊找不到工作，有犯罪的情況都有。所以民族企業家也幫助解決社會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功能跟作用。

筠：彝族有分白彝黑彝，白彝是屬於奴隸階層，那白彝形成一個企業體系了，這樣對他們的傳統會有甚麼影響呢？

T：這個白彝和黑彝的問題一直存在著，我 81 年去的時候還存在。但是這五十年來，政府說取消了，沒有黑彝白彝，但實際上還是存在的，人還考慮跟誰結婚。應該跟黑彝結婚，不要跟白彝結婚這還在。另外我發現，比較大的有影響的企業家是黑彝，因為不是 57 年有個叛亂的時候，在涼山死了不少人。很多有影響的企業家是叛亂的黑彝頭人的孩子。以後沒有找工作沒有上學被欺負被歧視的，沒有其他的出路而當

企業家，這故事有意思。因為他們現在有出路，原來沒有工作不能入黨，不能上大學，現在有出路，他們有錢，他們特別重視他們的孩子要上大學。不少有錢的彝族企業家將他們的孩子送到成都一個貴族學校上學。另外有一個故事是那個企業家怎麼評價彝族的歷史，不知道你看過沒有。包括學者以內，有的學者說彝族比漢族歷史長，所以在文字上漢族是模仿彝族的文字。彝族的文字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漢族的有三千多年歷史。所以通過彝族的文字可以知道，最古老的文字還是在中國，不是在今天的伊拉克。而且他們說老子孔子原來都是彝族，不是漢族（笑）。另有一說印第安納人、日本人、漢人都是彝族的後代，認為彝族最古老。因為社會方面他們受欺負和歧視，他們說我們是老大，我們是歷史最長的，我們是最重要的，比你們漢族還要重要，這是這麼一個對話。

筠：那你說比較有影響力的都是黑彝？

T：不能說全部，只能算一部分，有影響力的企業家有一大部分人還是屬於上級階層。

筠：那會不會影到過去他們的奴隸制度，因此白彝或別人減少對他們的歧視？

T：這個奴隸制度已經不存在了，現在也不能回復。但是他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觀念，因為每個人有他們的家譜。他們說原來這個人是我們家的娃子他們都很清楚這一方面的，他們有的人有家支，他們知道本來你是黑彝，本來你是高層人員，我不一定是白彝，我是娃子，我是低層人員，這個現在還有。

但是還有一部分他們原來被偷走了，原來是漢族小孩的時候被偷走了。這個人也不少，他們也受欺負的。他們是漢族，但是從小以來是彝族培養的，受彝族影響，而這一部分的人也有一些成了企業家。

筠：那您對彝族的總體評價是如何？

T：我覺得雲南、貴州、涼山的還是不一樣的。因為從同化角度來分析，涼山彝族的同化是最少。一個問題是他們語言他們的文字，現在在縣鎮裡幹部的孩子、知識份子的孩子不會說彝語，他們的父母也不願意讓他們上彝族的學校學彝文，他們願意學漢字，上漢族的學校，學漢語，要不然他們沒有工作方面的希望。這是一個問題。他們自己開會的時候說不夠重視我們自己的文字、我們自己的語文。但是總的來說，他們自己把他們的孩子送到漢族學校去，這是一個問題。所以這個彝族的歷史、未來這個很難說。

筠：那您覺得您接下來的研究會遇到甚麼問題或瓶頸？

T：接下來我對行動者感興趣，原來是少數民族的行動者，個體戶、私營企業家、知識分子，城市居民在這個農村幹部都是行動者，他們怎麼行動，怎麼表現他們甚麼觀點，這是我主要想了解的。第二方面是制度 institutions。制度改變怎麼引起行動者 actors 的改變，也就是所謂的 actor-centred institutionalism。關於那個地方幹部，有不少文章在西方分析這個地方的幹部結構，地方幹部的舉止表現。但我們從那個戰略群體的理論來分析，我們更可以了解他們的計畫，還有他們的目標還有他們的未來。如果你老說地方幹部是地方

幹部，你需要一個範疇，分析他們的行動群體，他們戰略群體的理論在這方面管用。

T：我覺得現在漢學和中國學分的很清楚，漢學的部分包括文學歷史還有哲學。第二方面是社會科學這方面的，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學和地理學這方面，這個現在分的很清楚。我覺得現在一個問題是社會科學的人培養的太少了，我們缺乏人才，我們上個周末開會的時候，他們都找人，我現在有三個位子，找一些政治學方面，作中國方面問題的，連一個都找不到。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更需要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我們跟美國也不一樣，美國有一個研究所他有七十多人，這是在德國不可能。因為沒那麼多經費，也不需要。所以有的漢學研究所只有一個教授。一方面我覺得德國的研究所在漢學及中國學方面太多了。你看我們到波鴻大學是四十公里，有六個教授關於中國方面的，科隆大學離這六十公里，有四個教授，波恩大學離這八十公里，有三個教授，太多了。我們找科研部寫了一封信，說應該搞一個很大的研究所。但是沒有成功，這很難，因為科研部找一個大學說，你們派一兩個到杜伊斯堡去還是到科隆去不好辦。不過將來要搞好中國研究，應該成立幾個比較大的研究中心，但是德國我覺得沒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歐共體。歐共體現在也考慮將來怎麼搞中國研究，怎麼跟美國搞競爭。因為不能說歐洲沒有好的學者，只有美國有好的學者。他們的機會不一樣，他們的經費不一樣，作用也不一樣。在我們每一個大學有一個人研究中國問題，但是這個太少，在歐洲需要幾個比較大的研究中心，然後有希望。

筠：最後一個問題是說，你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一個簡單的想法。

T：我剛講過，不能說中國 20、30 年後如何，這個我說不出來。因為一個問題是我覺得政治式的制度，政治怎麼發展，現在面對很多挑戰，那將來挑戰怎麼解決，是否共產黨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我說不出來。貪污腐敗可能是最大的問題之一，一黨制我認為可能不能解決貪污腐敗的問題。要少一點貪污腐敗，我認為還是需要一點公共監督，通過報紙媒體，當然 Internet 現在開始有一些監督功能和作用。但這只有一部分，這個貪污腐敗是一大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現在下面很多的地方幹部只有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不考慮居民的利益，這也是一大問題。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覺得這個中央還是有合法性。因為現在我們採訪的時候，大部份人還是認為中央搞得很好，但是地方幹部我們根本沒有信任，這長期來說對政治制度是一種危險。我在浙江大學講課的時候，有一個教授他說，這跟原來的蘇聯一樣，給個例子他說幾個工人找赫魯雪夫，60 年代當蘇聯共產黨的主席。赫魯雪夫說有是來找我，然後有一天他們去他的家找他，他在門口有一個很危險很大的狗，工人說赫魯雪夫好，但狗不好。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人覺得中央的觀點與目的是好的，提供社會福利，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地方幹部他們不一定反對中央，但是不一定落實這個政策。現在中國的未來很難說。

筠：那你會認為貧富差距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嗎？

T：這也是一個問題，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但是 Huntington 他說從過程的轉化，比如說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化當中，

所有的差距、貪污腐敗都會出來的，人們的價值觀就越來越軟化，新的價值觀便出現，最後就好了。一到發達的時候就好了。現在很難說。但是總的來說，我覺得收入差距個個國家都有，我們也有，但是我們有比較好的一個福利制度。現在我們在農村考察的時候，大部分的縣已經開展合作醫療，農民也很歡迎。最後也只有提供百分之四十的收費，百分之六十他們還是要自己拿出來。長期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動手術，一個手術要十萬塊，給你四萬你自己拿出來六萬，那問題很大。百分之十的縣有農民的養老金，這也是一個新的變化。總的來說，中央在有的地方明白了，他一方面有一個很大的轉換，另一方面需要一個社會福利體系。所以下面的居民說，觀念中央的目的好，但怎麼落實是一大問題。我剛講過俞可平，他 05 到 06 年出版了一本書，今年是英文的出來了，“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俞可平認為民主是所有政治系統中最好的，但是重要的議題是如何去實行它。我同意一個穩定的民主需要特別的先決條件，像平等發展的公民社會、一個獨立的法律系統以及我所說的文明性的能力（*civilizational competence*）。文明性的能力包含了以下特色：對社會相關議題的關心以及公共精神的出現和公民責任的觀念；接納不同意見與國家和民眾兩者所提出的批評；和平解決衝突的模式，換言之就是衝突管理，這也是要藉由國家及其人民；最後則是同理心，也就是去了解其他人的感觸、想法和行爲。文明性的能力和人民的想法相關，並非只有和制度有關而已。文明性能力（*civilizational competence*）需要公民意識，需要一個民主意識。沒有公民意識、沒有法律意識，就考慮你自己的問題，不考慮社會的問題，那這個民主不穩定。這

雙方面，文明性能力一方面對政府，政府和居民應該接受不同觀點和意見，你說一我說二，我們不可能對話，不同意沒關係。但是政府說一，我說二，那麼政府把你關起來，那不行。不要用暴力解決社會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所以我認為文明性的能力在中國還不存在，公民意識根本不存在。現在我的觀點是，民主的基礎還沒有出來，還不存在。如果你現在在這個條件當中搞民主，這個民主肯定不穩定。我同意應該要慢慢的發展。不只民主制度必須要被建立。還需要的是一個民主思維的發展與民主政治文化。否則，一個新建立的民主體制將迅速地失敗或瓦解。

筠：您覺得那些人在您思想上的影響最大？

T：各個階段也是不同，你指的是老師還是有關方面的書？Adorno（社會學家）的影響，還有 Wolfgang Taubmann 是一個地理學家是我的教授論文導師，還有 Roderick Macfarquhar、Samuel Huntington 他的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James Scott 的 *Weapons of the Weak*、Vaclav Havel 的 *Living in Truth*、Samuel Eisenstadt、Norbert Elias、Karl August Wittfogel、Richard Wilhelm、Lin Yu-tang，還有很多，一時想不起來，每個階段有兩三本書影響我。

筠：那要不要詳細的談一談呢？

T：那不同，不一定跟我的課題有關。因為一方面我覺得了解在中國的農民的情況是比較重要的，中國大陸還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還是大多數。還有 Albert Camus 法國的哲學家，他批評宗教方面的，我特別感興趣。特別的是，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啓發了我在政治、社會科與方法論的思維。舉例來說，根據 Bourdieu 的觀點，階級不僅是在經濟及政治上所定義的分組（如同 Marx 與 Lenin 所做的），還有對其他事物作分組，其中包含更長遠的、在價值觀與意見範疇中的廣泛大眾、消費行爲或者是藉由另一個團體來標記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一些分組。他超越了純粹的經濟要素，而且置這些階級於一個建構的社會空間中，其中包含了不同的資本類型，而這些資本類型共同形成了資本總額。他所謂的階級就是在一個基於經濟與社會分化的差異空間中，多個個體其整體的同質性客觀地構成一個群組，並且循著經濟與社會線作區分。這個資本結果就分成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因為關係與團體成員而來的資源），以及象徵性資本（不同形態資本的理解形式）。Bourdieu 說明了在社會空間中，具有相似地位的人會在一個總資本內，並顯示出相同傾向與行爲方式。這些理論上的階級（對自己的分類）沒有表示，然而，真正的階級是說他們（身爲一種階級）自動的在一起行動、是自覺的以及有目標的（爲自己分類）。在社會空間中相似的情形仍然尚未建立，根據 Bourdieu 的觀點，一個自動的單位使得他只能論及一個群體組成的傾向是來自於「可能的階級」（probable class）。簡而言之就是他認爲階級是一種領域，領域有幾個資本，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所以在這四種資本方面，他們有比較接近的，那就是一個階級。這個馬克思和其他的階級觀點完全不一樣。但我覺得用這個方面分析一些階層階級真管用，這個具有彈性的概念激發我的戰略群體理論概念，也是我後來用來分析中國私營企業和地方幹部角色的理論概念。這幾年我比較感

興趣 M. Foucault, 「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是關於一個政府一個國家怎麼控制和影響一個個人的和群體的思維, 這是一種 tool of government 治理的工具, 這方面我很感興趣。Jean Baudrillard 他怎麼看宣傳工具之間有影響。Amitai Etzioni 提到的 communitarism 社群主義, 我分析社區的時候, 我提出來 Amitai Etzioni 說的社群主義是民主國家的社群主義, 但在中國大陸, 我估計是一個權威性的社群主義, 自上而下。還有 J. S. Migdal, 他關於國家理論的一些, 怎麼分析國家理論。J. J. Linz 是個西班牙的政治學家。他分析了權威主義, 分析集權主義不同的情況, 現代化有不同的現代性, 這個比較重要。James Scott 的著作, 「軟弱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 以及其初始的研究「農民的道德經濟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s)」對於我在中國農村地區的研究有極大的影響。Samuel Eisenstadt 造就了我對於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理解。Norbert Elias 則是使我了解文明發展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的概念。我特別感謝 Vaclav Havel 其著作《活在真理 (Living in Truth)》。其提供具有價值的見解, 說明知識分子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之下應該以何種方式思考及行動, 這些見解使我大開眼界。此外, 中國學者與政治家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與毛澤東的著作也充實了我對於政治以及政治思想的理解, 特別是在中國方面。

這些人對於我的影響有的在方法論上, 有的是理論, 有的是他的思維。因為有的時候你不要只看關於自己專業的書, 我很喜歡看哲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等比較廣面的。因為光看政治學, 政治學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方法論, 這個方法論還是社會學的方法論。社會學方法論和社會人類學方法論還有

哲學的方法論又不同，有的時候你看哲學方面的書，你可以得到不少有利的因素。所以我經常看各個不同專業的資料。

筠：那是甚麼原因使你偏向左派的思想？

T：對於我為何會成為 1969 年代德國學生運動中的激進份子（activist），這有很多原因。很多我這個世代的人，對於政治與知識菁英以及我們的父母親在處理 Hitler 時期和二次大戰的方式上感到極度的不滿。戰後，許多國家社會主義的激進擁護者在德國仍然掌握著高位，德國聯邦總理曾經也是 Hitler 黨中的一員。而且，我們的父母親也說明他們不知道在猶太人身上發生過甚麼事，以及哪些人民反對納粹（Nazi）體制，他們甚至有時後還會回憶在那個時期的正面特色（positive features）。在社會上、學校及大學內，這種威權結構與氣氛仍然盛行，家庭教育還是基於這種威權價值觀念。越戰展現出了美國在國際政治，還有在企圖去控制國際關係以及防止人民與國家的獨立上，扮演的是一個負面角色。此外，我們爲了個人的自我實現（self-fulfilment）而努力。我們找尋政治與社會去替代前蘇聯與東歐國家的那種陳腐的社會體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表面上在中國反對共產黨的官僚主義中，我們感到這是可能的選擇。因此，在 1973 年西德共產主義聯盟成立，而我成爲了其早期的成員之一。

我當然在期間學習到了許多，特別是在一個新社會和政治實體不能建立在單方面的意識形態基礎上這個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現代社會沒有給予任何選項，特別是在歐洲。這也是我在這個期間得到的主要觀點之一，那就是民主是一個傑出的想法，而我們大多數變成了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我再

次研究了毛澤東思想和毛的政治行爲，並在這個主題上組織了一場研討會和編輯了一本相關書籍。此外，我再次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及重新思考與重新評價中國歷史和 20 世紀的中國共產黨。

時至今日，已經被我淘汰了所謂的左派思想，可以說在社會方面我是一個進步人士，但我不是原來共產黨的那種思維。你有一個極權的思想，有一個固定的思維，你的頭腦裡有一個剪子，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我在共產黨的時候，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那個剪子。因爲你分析這是符合我們馬列主義思維，這個個不符合，所以這個就是對的，這個就是錯的。用這樣一個方法挑選社會因素這完全是偏見，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參加共產黨也有好的地方，一方面分析社會問題，怎麼分析社會問題這是我在這邊學習的比較好。另外國際關係這方面，國際關係是重要的。有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談的一面，我覺得是過時的。有的理論方面，分析資本主義，分析的不一定管用。資本主義現在發展得很快，發展也有變化，當時馬克思主義不一定完全可以解釋和分析這個資本主義。另外，原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時候，我認爲以爲社會主義是一個比較理想，但到中國的時候，我 60 年代已經去過很多的國家，羅馬尼亞、匈牙利、俄國、波蘭這些我都去過了，這個我絕對不喜歡。但是到中國的時候，我覺得文化大革命，通過文化大革命，中國找一個不同的一條路。但是以後在中國工作過了四年，我發現這個也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社會。最好通過歷史分析一下中國 19 世紀、20 世紀的發展，不一定跟馬列主義。我覺得馬列主義不是特別的，主要還是歷史方面的一些要素和影響。

因此，這種分類方式是過時的。過去我們有分成右派與左派。然而，這種二元論已經分崩離析了，現在的政黨企圖去吸引中產階級，也因此轉向中間社會。我比較喜歡將自己歸類為公共知識分子。在之後所提到的知識份子對於公共事務批判性地干預，以及面對政治與社會發展採取一種批判態度，這就是對於一個政治實體展現良知的一些方式。我比較喜歡描繪我的社會地位為一個先進的公共知識分子。我並非只有待在一座象牙塔裡工作，作為一個學者不僅只有熱衷於自己狹隘的學術工作，還得關心政治與社會發展上的議題。

筠：那當時參加學生運動的同學有對你產生甚麼影響嗎？

T：當時我剛開學的時候，有的學生已經學了四五年，當然有影響，因為他們都是已經了解，而我不是特別了解。當然在我前面的一些同學，我向他們學習不少東西。我們在社會人類學那個研究所，在法蘭克福、哥廷根、Mainz 大學，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基礎理論。我們分析了我們專業的歷史，有好的，有不好的方面。也看過一些跟社會人類學有關係的資料，比如說關於中國這方面 Wittfogel 他分析了中國的經濟、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個很有用。另外看列寧的帝國主義這本書，原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方面我在左派的理論方面了解了不少東西，這是比我在前面的老學生有一些影響。

筠：那你的學長之後的發展呢？也有繼續走他們想要的路線嗎？

T：以後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淘汰了馬列主義，他們在不同的各個領域工作。有的在高校，有的在 NGO，有的在國際組織都有。不能說只有一條路，有好幾條路，有幾個也是當教授的。

筠：那有哪一些是在臺面上，比較熟悉的？

T：我覺得在一方面我的學生，畢業生不管當不當教授。他們主要學習是到中國去搞調研，田野調查。因為原來我是德國唯一的人搞這樣的活動，然後有別人看我的書，看我的資料。我的學生我有這個要求寫博士論文必須到中國去調研，要不然你不是很了解，所以我的博士生平時都到外面去，都到中國去了。也有一部分是研究日本的問題，那個情況可能就不是完全一樣。這方面影響可能最大，怎麼作田野調查，必須到國外去搞田野調查，這個是我覺得影響比較大的。

筠：那他們去從事田野調查的時候，在系所上有提供任何資金的協助嗎？還是其他的協助？

T：一般我會幫助他們找基金會提供資金，那個德國交流協會他也可以提供我們到國外研究的資金。有的是在從外面找經費，有這個課題，我雇用他們。比如說我雇用博士生，到新農村政策這個項目，他跟我一塊到中國去調研，這方面也有。因為如果你在德國搞一個課題，平時你找一兩個助手。要不然我自己搞，沒那麼多時間，我工作很緊湊。

筠：那這些學生都是德國人還是世界各地都有？

T：大部分都是德國的，也有中國的，但大部分都是德國的。因為現在我們英文的碩士，所以現在學生也不一樣，原來是德文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德國人。

筠：謝謝您的回答。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資料

從紅色憧憬到田野現實－王海 (Thomas Heberer) 與德國中國研究的轉型 / 洪雅筠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大政治系中國中心，民 102.01

ISBN 978-986-03-5944-2 (平裝)

1. 王海 (Heberer, Thomas) 2. 學術思想 3. 中國研究

574.1

102000878

從紅色憧憬到田野現實 — 王海 (Thomas Heberer) 與德國中國研究的轉型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 者 / 洪雅筠

出 版 者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
教學與研究中心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2351-9641#337

傳真：(02)2341-2806

E-mail:politics@ntu.edu.tw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

印 刷 者 / 翰蘆出版社 • 金華排版打字行

電話：(02)2382-1120 • 2382-1169

<http://www.hanlu.com.tw>

初版日期 / 102 年 1 月

非賣品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